

馬克思論文選譯

社會科學研究會出版

聚豐書店

北京東安市場丹桂商場甲14號電話(5)0372

書名

第中2015 號基價 30

馬克思論文選譯

李 一 氓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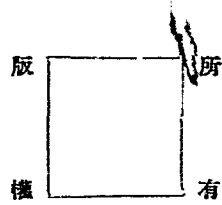
也 也 校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會 出 版

經 售 處 滬 濱 書 局

1930. 2. 初版

1—2000 册



實價大洋九角

目 錄

馬克思主義引論(代序)

- 1、哥達綱領批評
- 2、工錢勞動與資本
- 3、經濟批評導言
- 4、資本積蓄的歷史傾向
- 5、蒲魯東
- 6、法蘭西的唯物論
- 7、中國革命與歐洲
- 8、六月的日子
- 9、1848年革命與無產階級

365884

馬克思主義引論

V. I. Ulianov

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北京 上海



馬克思主義引論

V. I. Ulianov

馬克思繼承了并燦爛的完成了十九世紀的三種主要思潮，即湧流在三個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中的思潮：那就是古典的德國哲學；古典的英國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的社會主義。甚至於他的反對者，也承認他的觀念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在未解說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之前，不妨先把他的哲學的形勢，作一個簡略的研究。



哲學的唯物論

從1844年和1845年來，馬克思的意見已經明

確的形成了，那時他是一個唯物論者，尤其是一個費爾巴黑 (Feuerbach) 的追隨者，然而時代愈前進，他也就發現了那位思想家的弱點——就是費爾巴黑的唯物論不是可以一致地適用，而且在其範圍中也不是普遍的。在馬克思，費爾巴黑的世界歷史的及其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是有賴於他決然從黑格爾的唯心論分裂出來，而宣揚唯物論，唯物論“在十八世紀(尤其是在法國)就已經同各種形式的形而上學起了鬥爭”(見“神聖家庭”及“遺稿”)。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上寫着：“在黑格爾，思想過程(他甚至於以‘觀念’這個名詞把牠轉形為一個獨立的主題)是現實的創造者。……但是在我，恰恰相反，觀念不過是被移植於人類的頭腦中而在那裏轉化了的物質。”恩格斯完全遵照馬克思的唯物哲學而解釋之，曾在“反杜林”(Anti-Dühring)中寫着：“世界的統一性不是成於其存在……而是成於其物質性……這是由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長期辛勤的發展過程所證明的

……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從來沒有，也不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或沒有物質的運動’……假如我們問……思想與意識是甚麼，牠們從何而來，我們就可以說，牠們是人類腦筋的產物，而人自身又是‘自然’的產物，是發展於一已知的自然環境中而與之共同發展的‘自然’的產物。所以，很顯然的，人類腦筋的產物，在最後的分析，即是‘自然’的產物；牠們並不與‘自然’的絲延相衝突，而是與之相調協的。”又說：“黑格爾是一個唯心論者：那就是說，由他看來，在我們的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真實的物體與過程的抽象的反映；而恰好相反，在黑格爾，物體與過程是在世界的創造之前即已存在着的觀念的反映。”恩格斯在其“費爾巴黑論”中（在這部書中，恩格斯解釋他自己同馬克思對於費爾巴黑的哲學的意見，而且，這部書是他重讀黑格爾，費爾巴黑及由他與馬克思在1845年同1846年所寫下的唯物史觀等著作的原稿之後送去付印的）寫着：“對於每種哲學，尤其是一種新哲學的根

本問題，是思想與存在之間……精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是誰在誰之先的問題；精神先於自然，還是自然先於精神的問題。依照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的方法，哲學家就被分成兩大營壘。宣稱‘精神在自然之先就存在着’的人們，到後來又臆斷‘世界是被創造的’的人們，屬於唯心論的營壘。認定自然在先，思想其次的人們，屬於唯物論的營壘。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當注意馬克思的關於‘自由’與‘必然’的意見。“‘必然’是盲目的當牠還未成爲有意識的時候。‘自由’是‘必然’的意識”（恩格斯，“反杜林”）——這是一個自然規律的客觀統制的承認，把‘必然’辯證地轉化爲‘自由’的承認〔全相似於把未知的但是能知的“在自之物”（“Thing-in-itself”）轉化爲“爲我們之物”（“Thing-for-us”），轉化爲“物之實體”，轉化爲“現象”〕。馬克思同恩格斯的早期的唯物論（包括費爾巴黑的唯物論，更不待言，還包括布哈勒——Buchner，佛格特——Vogt，與穆勒左爾特——Molescholt的“庸俗的”

唯物論在內)的根本缺點是由於下列的幾點:(1)牠是“太過於機械的”,對於近代的化學與生物學之發展未予以應予的重視;(2)牠是非歷史的,非辯證的(在反辯證的意義上說來,即是形而上學的),而且不會系統地採取一種四面發展的形勢;(3)牠抽象地觀察“人類性質”,而不是把牠視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綜合”(具體地,歷史地決定的)——所以僅僅“解釋”了世界,而沒有企圖着去變革世界,忽視了實際革命活動的重大意義。

辯 證 法

馬克思與恩格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是內容很豐富的,認為對於思想,對於發展的理論都是一種多方面的深刻的貢獻;把牠認為是古典德國哲學的最有價值的產物。一切其他發展原則與進化理論的表式,對於他們,好像只是一方面的,內容很貧乏的,(有時候由於突飛的跳躍,或由於不必有的大變與革命)而曲解并毀傷了自然與社會

的發展的實際進程。恩格斯云：“馬克思與我殆為從事於從唯心論（黑格爾的唯心論并未除外）的廢墟中，救出理性的辯證法而把牠轉化為‘自然’的唯物概念之唯一兩人，……‘自然’即是辯證法的一個實證；近代的科學，以非常廣大，日日增加的材料——即證明，在最後的分析，‘物’在‘自然’中存在着，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這一事實的材料，供給這個實證。”

恩格斯又說：“一種根本思想，以為世界不是由於許多完全純粹形式的物體所組成的，牠不過是一種許多過程的集合體，在這些過程中，那些物體，表面看來，好像是不變的，實在是與由牠們反映入於頭腦中的牠們的副本（概念），同樣地是在經受着不斷的變化，這裏起來了，那裏又消滅了——這種根本思想，從黑格爾時代以來，在一般的意識上，傳佈得非常寬廣，所以對牠的一般意義，幾乎沒有一個人敢於去爭辯。但是以言語來接受這種思想是一事，把牠在每個可能的機會中，在每個

研究的範圍中，見諸實行，又另是一事。”又說：“在辯證的哲學看來，從來沒有甚麼事是永久成立的，絕對的，神聖的。牠在每一事物上都看見一種不能避免的崩潰的印跡，一切事物都烙上這種印跡，除開組織與破壞之不斷的過程，或從低而高的無終極的進步之不斷的過程。那種哲學自身不過是一種過程之簡單的反映，——種在‘能思想’的腦筋中的反映。”因此，辯證法，照馬克思看來，是“在外部世界與在人類腦筋中的運動之一般規律的科學。”

馬克思採用了并發展了黑格爾哲學的這一革命的方面。辯證法的唯物論“不需要一種基於其他科學的哲學。”於從前的一些哲學中，還存留着“思想科學及其規律，即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但是辯證法，照馬克思使用這個名辭的意義（同於黑格爾的使用法）說，包括現在所謂認識的理論（Theory of Cognition），或認識論（Epistemology），或知識學（Gnosiology），或知識的科學（Science of Understanding），這種科學必須以同樣的方法來思考

其主題內容——就是從歷史上說，研究并概括認識的起源與發展，從無意識到意識的變革。

唯 物 史 觀

馬克思曉得了舊唯物論的矛盾，不備和偏頗，就看到有把社會科學與物質基礎融和起來，而且照着這個基礎去改造牠的必要。假若，一般的說來，唯物論解釋意識是存在的結果，而不是解釋存在是意識的結果；那嗎把這個學說特別應用到人類的“社會生活”，唯物論就必然要解釋“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寫着：“工藝學揭示了人與自然間的活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但還可以說，牠也揭示了人的生活的社會條件與由這些條件所生出的精神產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馬克思給出了一個唯物論的根本內容的完整表式，應用於人類社會及其歷史。這裏就是他的話：“人類在其生活着的社會生產內，走入於一定的必然地離

開其意志而獨立的各種關係，即適應於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這就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在其上發展和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真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之一般性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恰恰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社會意識。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即和牠們以前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或(用法律名辭來表示)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以前曾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的，現在變成了生產的桎梏。社會革命的時代於是就開始了。全部巨大的上層建築，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或急或徐地變革。當考察這種變革時，我們要把兩件事劃分明白：一方面是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中的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能用自然科學所固有的精密去觀察和記載的；另一方面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

態（一言以蔽之，社會意識形態），在這些形態中，人們漸漸意識着這種衝突而與之奮鬥到底。正如我們不能照着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就形成對於他的意見，所以我們也不能照着革命時代自身的意識去評價那個革命時代；因為我們必須把這個意識解釋為是物質生活的矛盾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的衝突的結果。一切生產力在社會組織中尚有發展的餘地時，社會組織的典型是不會破滅的；新的更高的生產力，其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中還未成熟以前，也是不會出現於舞台的。那就是為甚麼人類絕不能担負起他所還不能執行的任何工作；因為當我們精密地觀察事物的時候，我們常常看到，新事業的要求，只有當使牠成功地執行的物質存在條件成熟或者至少是開始成熟的時候，纔能發生。在大體的輪廓上，我們可以描寫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同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是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的進步的時代。資

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敵對的形式。”

唯物史觀，或(更精密地說)擴張於社會現象的領域中的唯物論，彌補了早期歷史學說的兩個主要缺憾。因為，第一，就是這樣學說的最好的，也僅只注意到人類歷史活動的意識形態的動機，牠們絕不會企圖着去發現這些意識形態動機的起源，或者去把握在社會關係的體系發展中的規律的客觀的一致，或者去辨識在物質生產的發展程級中的各種社會關係的根柢。第二，早期的歷史學說忽視了人口中的勞動羣衆，而歷史的唯物論首先使以科學的精確去研究勞動羣衆的社會生活條件及追跡這些條件的變遷成爲可能。前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只是收集許多零碎材料，成爲一堆乾燥的事實；供給一種歷史過程的孤立形態的敘述。馬克思指出了宏大地，無所不包地研究社會經濟構造的發生，發展與沒落的過程的方法；指示了一切反對的趨勢如何能夠結合起

來，如何能與在社會各階級中生活方式與生產方法的精確的決定條件發生關係；在顯明的“主要”觀念的選擇中，或在這些觀念的解釋中摒棄了主觀主義與自由意志；指明了一切觀念一切趨勢（沒有例外），在各種生產力的條件中怎樣都有牠們的根據。人們怎樣造成他們自己的歷史；甚麼東西決定他們的動機或者是整個羣衆的動機；甚麼東西引起對立觀念對立努力的衝突；甚麼東西是在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甚麼東西是形成人類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生產條件（生活的物質條件）；甚麼東西是這些條件發展的規律——所有這些方面，馬克思都注意到了，他指出歷史之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統一的循着規律的過程雖然牠（歷史）也有顯著的繁複性與矛盾性。

在每一社會中，有些人的願望與別人的願望相衝突；社會生活是充滿着矛盾；歷史揭示給我們以在各民族與各社會中的鬥爭，也在每個民族與每個社會中，表現着在和平時代與戰爭時代之間

的循環，在革命時代與反動時代之間的循環，進步或退化的促進與停滯的循環——這些事實都是一般所曉得的。馬克思供給了一個線索，使我們能夠在這個形似的紛紜，這個顯然的凌亂中，發現規律的統制。他的線索即是階級鬥爭的理論。除開研究某一特定社會或一羣社會的一切分子的動力的總和，絕不能達到這些動力的結果之科學的決定。因為動力的矛盾依於分割社會的階級的生活條件的歧異。

“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在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寫着。（在後來版本的一個附註中，恩格斯指出原始共產主義對於這個概括是一個例外。）“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貧民，地主與農奴，店商與學徒——總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彼此是站在極端反對的地位。他們進行着永久的鬥爭，有時是遮掩的，有時是公開承認的；但是這鬥爭必然要終結於一個全社會結構的革命變革或者是一

切階級的共同摧毀……從封建社會廢址上建立起來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牠沒有把階級的對立終止。牠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鬥爭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可是我們這資產階級時代，牠的特點是把階級的對立簡單化。全社會已漸次分化為兩大對抗的陣營，兩大直接敵視的階級，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在今日當前於資產階級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真是革命的。因為大工業的發展，其他階級都歸於沒落與淘汰，只有無產階級是產業之最顯著的產物。較下的中間階級，如小工業者，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業小作者，一個一個的都同資產階級作戰，以希望維持其中間階級的存在。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還可以說，甚至於他們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想把歷史的車輪來開倒車。就是他們變成革命的，也只因為他們怕落入無產階級的陣營；他們不是擁護他們目前的利益，是在擁護將來的利益，他們拋棄自己的立場以

便取得無產階級的立場。”

自從法國大革命時代以來，階級鬥爭之為歷史的主要動力，在歐洲一切國家中更比平常表顯得格外明白。在法蘭西的王政復古時代，已經有幾個歷史家（例如柴厘——Thierry，桂若提——Guizot，——柴爾斯——Thiers）不得不承認階級鬥爭是瞭解法蘭西全部歷史的鎖鑰。在近代——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時代，有代議制，有擴張的（但不是普遍的）選舉，有低廉而銷路廣大的日報，有工人與僱主的強大組織等等的時代——階級鬥爭，雖然有時候是和平合法的形式，而牠自己表現出來更明顯地仍然是一切事變的總動力。馬克思在許多歷史著作中，根據唯物史觀，給出歷史研究的深切明著的範例，包含着每個個別階級地位的分析，而且有時候包含着在一階級中的各組各層的地位的分析，很清楚地證明為甚麼與怎麼樣“每個階級鬥爭都是一種政治鬥爭。”他揭示了社會現象的網狀結構，顯出在這一階級與另一階級之間，

在過去與將來之間，的過渡階段，而且畫出了終結歷史進化的決算表 (Balance sheet of result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即是前面的理論之更深切的更多方面的更詳細的實證與應用。

經 濟 學 說

“這部著作的最後目的在宣露近代社會(那就是說，資本家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上寫的。研究一定的歷史決定的社會之生產關係及其發生，其發展，其沒落——這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在資本家社會中，主要的形勢是“商品”的生產，所以馬克思的分析也就從商品的分析開始。

商品，首先，是一件滿足人類需要的東西，其次是一件同他物交換的東西。物的效用給牠以“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者簡單說，就是價值)其自身首先呈現出來為一種比例 即一定數量的某種

使用價值與一定數量的他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比例。日常經驗告訴我們，一切一切的使用價值，在其自身是千差萬別，不能相互比較的，而由於無慮千萬的這樣的交換，終究彼此相互平均下來。那嗎，現在可以問，甚麼是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無數品物中的共通性質——即使牠們在一定的社會關係體系中能夠相互衡量的共通原素？對牠們有一點共通的，就是牠們都是“勞動生產物”。在交換生產物時，人們衡量彼此各不相同的勞動。商品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各個生產者生產各種各色的生產物（社會的分工），而且在這種體系中，一切這些生產物都於交換時彼此平衡起來。所以，對一切商品的主要共通點，不是在一定生產部門中的具體勞動，不是一種特殊的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一定社會的一切勞動力，在其總和中代表一切商品的價值的，即是這同一人類勞動力。有無慮數千萬的交換事實證明這一點。所以，每一特殊商品，

僅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已知部分。價值的總量是為社會必要勞動的總量所決定，或者說是為生產一定商品，即生產一定使用價值之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所決定。

“人們當互相交換不同的生產物的時候，即是交換其不同的勞動。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是在這樣做，但事實上他們是在這樣做着。”如一個早期的經濟學者說，價值是兩個人間的一種關係；要說明這一句話，他應該更加一句說，牠是掩藏在物質物的摺疊之下的一種關係。我們要想理解甚麼是價值，只有從一種特殊典型社會中的社會關係的體系的形勢去考察牠；更進一步說，即是自身呈現在一種多方面的形式中的社會關係的體系，這樣，交換的機會才有千萬次的反覆。“像價值一樣，商品也不過是凝結的勞動時間之一定量。”馬克思既已做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的詳細分析之後，又進而分析“價值與貨幣的形式”。那末，他的主要任務即是研究價值的貨幣形式的“起源”，研

究交換發展的“歷史過程”，始於孤立的偶然的交換行爲（“簡單的，孤立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某種一定量的商品交換另一種一定量的商品），進而及於價值的普遍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多數不同的商品交換一種特殊的商品——黃金於是變成了普遍的等價物。因為貨幣是交換與商品生產之發展的最後產物，所以牠就掩蔽了個人勞動的社會性質，遮掩了集合在市場中的各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馬克思分析了貨幣的職務；而且很重要的是要指出，（如一般在‘資本論’開始的幾章）凡是表面看來好像是一種抽象的有時候是純粹演繹的解釋方式的，實際上都是交換和商品生產的進化歷史的一些事實的龐大集合的產物：“貨幣的前提是要有商品交換的一定發展。貨幣的各種形式（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工具，或支付工具，金銀積蓄，國際貨幣）畢竟是指示社會生產過程的極其不同的程級的，雖然應着這些形式中的或甲或乙比較佔優勢，因而甲種或乙種的

職務的應用範圍也有所不同。（“資本論”第一卷）

在商品生產的發展之特殊階段，貨幣就漸漸轉化為資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C——M——C（商品——貨幣——商品）；這就是說，賣去甲商品，為的是要買乙商品。但資本的一般公式是M——C——M（貨幣——商品——貨幣）；買為的是要賣——目的在獲得利潤。“剩餘價值”這個名子是馬克思給與那放在流通過程中的貨幣的原始價值的增加部分的。在資本家社會中，貨幣的“生長”這種事實，是大家所習知的。實際上，那是“生長”，牠把貨幣轉化為資本，那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出來，因為這不過代表等價物的交換而已；牠也不能從價格的增加中產生出來，因為買者與賣者的相互得失終究要使相互均等；而且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並不是各個人的情形，而是羣衆的，或平均的，或社會的現象。貨幣所有人因為要能取得剩餘價值，“他必須在市場中找得一種商品。這種

商品，牠自己的使用價值在其自身就包含有價值的創造源泉”——這樣一種商品，牠的使用過程同時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這樣的商品是存在着的。那就是人類勞動力。牠的使用是勞動，勞動創造價值。貨幣所有人按照價值購買勞動力，這種價值，也如其他每種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其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那就是說，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用費）。貨幣所有人既已買進勞動力，他就有全權去使用牠，那就是要牠去做一整天——假定十二小時的工作。於是，在六小時的行程中（“必要的”勞動時間），勞動者所生產的已經足以付回其自己的維持生存的用費；在其餘六小時的行程中（“剩餘的”勞動時間）；他生產了剩餘生產物，對於這一部分的生產物，資本並未支付他——即是說，生產了剩餘價值。所以，從生產過程的形勢看來，我們必須要把資本分作兩部分：第一，不變資本，投用在生產機關（機器，器具，原料，等等）上的，這一種資本的價值，是一次或分期，轉

移到完成的生產物上面去的；第二，可變資本，投用在勞動力上的。這後一種資本的價值不是經常的，而是在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要表現勞動力被資本掠奪的程度，我們就必須要比較剩餘價值，但不是與全部資本相比較，而是單與可變資本相比較。因此，譬如在剛纔所舉的例中，剩餘價值率（用馬克思自己的名詞）就是 $6:6=100\%$ 。

資本的發生必然有兩個歷史的先備條件。第一，必須要在生活於商品生產的較高發展的條件下的各種人的手中，有一種龐大數目的貨幣的蓄積。第二，必須要有“自由的”勞動。勞動者“自由”這個名詞是有兩種意義的。就是在他出賣他的勞動力這一點上，必然沒有甚麼勉強或限制加之於他。就是，他必須要不受土地的及一般生產工具的約束；他必須是一個無主的人，是一個“無產者”，他除了出賣其勞動力外，再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獲取生活手段。

剩餘價值之能增加，有兩種基本方法：增加工作日（“絕對剩餘價值”）；減少“必要的”工作日（“相對剩餘價值”）。分析第一個方法，馬克思給出了一幅勞動階級為縮短時間而鬪爭的深刻印畫，以及政府首先（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為延長工作日，隨後（十九世紀的工廠立法）才縮短了工作日所施行的干涉的深刻印畫。自此以往，所有各國的勞動階級運動，如“資本論”之所顯示者，處處都供給了豐富的新事實來擴大這一幅印畫。

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產生，馬克思研究了資本所由增加勞動生產力的過程的三個根本階段：1.簡單的合作；2.分工與手工業；3.機械與大規模工業。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三個根本形態，其意義是何等的深遠，可由俄國所謂“卡斯他爾”（“kustar”）工業（小規模工業，手藝，家庭工業）的研究，供給了很豐富的材料，印證這前兩個階段，這一事實，可以證明。但是在近五十年中，1866年時，馬克思已經注意到大規模機器生產的

革命影響，這些影響在許多“新興”國家如俄國，日本中，一天一天的增加顯著。

再繼續說吧。那極端重要而且具見創作天才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蓄積”的分析；那就是說，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是專用於增加生產，而不是用以供給資本家的需要或滿足資本家的慾望。馬克思指出了早期政治經濟學者（古典經濟學者，從亞丹斯密以下）所作下的錯誤，他們以為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全部都成了可變資本。事實上，剩餘價值雖然分配給與可變資本，也分配給與“生產工具”。不變資本的總量比之可變資本，生長得更為激急，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在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資本蓄積，加速了以機械代替勞動者的過程，一方面創造了財富，另一方面創造了貧困，這就發生了所謂“勞動預備軍”，發生了“相對的勞動缺乏”，發生了“資本家的人口過剩”。這是取着極其

變化紛歧的形式，而且使資本能夠非常的加速生產過程。加速生產的可能性（結合着非常便利的信用制度，結合着在生產工具中的資本蓄積）供給我們以理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週期發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的鎖鑰——始而平均差不多每十年一次，隨後就次數更多而週期更短。從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資本蓄積，我們必須區別出所稱做“原始蓄積”的：強迫勞動者與生產機關分離，驅迫農民離開土地，佔領公有土地，殖民制度，國家公債，保護關稅，諸如此類。“原始蓄積”在一端創造了“自由的無產者”，在他端創造了貨幣所有人，——資本家。

“資本蓄積的歷史傾向”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這樣的敘述着：“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削是以極殘酷的蠻行來厲行着的，且是在極醜極惡，極鄙極賤的慾念的刺戟之下厲行着的。自食其力的私有財產，即那可以視為基於孤立的，個別的和獨立的勞動者結合着他的勞動條件的基礎上的私

有財產，現在被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擠出去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靠掠奪他人的勞動而存在的，但是這種勞動在表面的意義上是“自由的”。及到這種轉化過程已經充分地把舊社會瓦解了，已經徹底地把牠解體了的時候；及到勞動者已被轉變成無產者，他們的工作條件已被轉化成資本的時候；及到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能夠站穩自己的腳步的時候——於是勞動之進一步的社會化，以及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之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掠奪的（即是說公共的）生產工具（這種生產工具含有私有主之進一步的被剝削的意思）的這一過程，就取着一種新的形式。現在被掠奪的不復是為自己而工作的勞動者，而是掠奪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這種被剝削是由資本家生產之內在規律的作用所完成的，即由資本集中的作用所完成的。一個資本家擠落他許多同流的資本家。跟着這種集中，跟着多數資本家的被少數資本家所剝削，勞動過程的合作形式就以激增的程度發展着；於是我們就

看見一種有目的的應用科學來改進技術的發展的趨勢；土地是更有方法地來耕種；勞動工具傾向於取着只有用聯合的力量纔能使用的形式；生產工具只有由聯合的使用，由社會化的使用才更經濟；全世界的民族都被陷入於世界市場的網中，因此，資本主義統治就一天一天的取着一種國際性質。資本家（他篡奪了並獨佔了這轉化過程中的一切利益）的數目繼續不斷地減少，與之相應而生的就是廣大羣衆的貧困，壓迫，奴役。墮落繼續不斷地增加，但同時却有了勞動階級的憤怒之堅絕的深刻化——這一階級，其人數是逐漸加多，且即由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機械而紀律化，統一化，組織化。生產方法是隨着資本家獨佔且是在資本家獨佔之下而繁榮的，現在這資本家獨佔反成了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工具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現在達到了證明牠們已經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不相適合之一點了。這個外殼於是爆裂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資本主義

和生產隨着無情的自然規律而產生了牠自己的否定。”

此外，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新穎的是馬克思的整個社會資本複生產的分析（“資本論”第二卷）。在這裏，馬克思不是討論的個別的現象，而是討論的集體的現象；不是討論的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討論的社會經濟的總體。已經糾正了前所述的古典經濟學者的錯誤，馬克思又把全部社會生產分爲兩大部分：第一，生產工具的生產；第二，消費品的生產。他詳細地研究了（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整個社會資本的流通——牠的在其以前的比例中的複生產及牠的蓄積。

“資本論”第三卷（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解決了“平均利潤率”的轉化問題。在經濟學中的一個偉大的進步，即是，在我們現在所考查的事件中，馬克思是從集體現象的形勢，社會經濟總和的形勢去進行他的分析，而不是從個別的形勢情況或純然膚淺的競爭形態的形勢去進行他的分析——

這種膚淺的競爭形態論是在那庸俗的經濟學者及同時代的“邊際效用說”的辯護者中所常遇着的一種狹隘見解。馬克思開始分析了剩餘價值的起源，又進而考察其轉化為利潤，利息及地租的轉化過程。“利潤”是在剩餘價值與投在企業中的全部資本的一種比率。“高級有機組織”的資本（那就是說，包含着不變資本比之可變資本在平均比例以上的資本）產生一種在平均率以下的利潤；“低級有機組織”的資本產生一種在平均率以上的利潤。在自由地把資本從這一生產部門移轉到別一生產部門的資本家中的競爭，在這兩種情勢上，常把時而低落到平均以下，時而提高到平均以上的利潤率引致於常規地位。在一定社會中的全部商品價值的總和常是與全部商品價格的總和相符合的；但是在個別的企業，在個別的生產部門，商品的售賣，不是照着牠們的价值，而是照着牠們的生產價格的，這種生產價格是等於已支用之資本加上平均利潤的。

價格與價值不同，利潤要漸漸平均化，像這一類習知的，無可爭辯的事實，都是被馬克思照着價值規律這樣地解釋的；因為全部商品價值的總和是與全部價格的總和相符合的。但是要使價值（一般的事象）適合於價格（個別的事象）不是由一種簡單的直捷的道路進行的。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自然，在一種由各個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而僅經由市場聯繫起來的社會中，“與規律相符合”的這件事只能是一種滿盤計算的均數，一種一般的表明，一種集體的現象，而濟之以個別的與相互補償的偏左偏右的離軌現象。

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使不變資本比之可變資本更激急地生長。但是因為剩餘價值只是從可變資本的作用來的，那末，利潤率（剩餘價值的比率是對全部資本的，不是單獨對全部資本的可變資本的）之有低落的趨勢，自是很顯然的事。馬克思對於這個趨勢，及傾於有利或不利於這個趨勢的情勢作過一番詳細的分析。

“資本論”第三卷中的非常有趣的幾部分，即那專論殖利資本，商業資本，貨幣資本的幾部分，現在不停留於這幾部分的敘述，我將轉到一個極重要的題目，即“地租”論。農產物的生產價格（因為可耕種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可耕種的土地全被私人所佔有）是由生產費決定的，但不是平均土質的土地上的生產費，而是最劣的土地上的生產費；再就是由運送貨物到市場的成本決定的，不是在平均的條件下的成本，而是在最壞的條件下的成本。在最劣的土地的生產費與最優的土地的生產費之間的差額（還有在最壞的條件下與最好的條件下運送貨物到市場的成本之間的差額）就產生了“差別地租”。詳細地分析了地租，並指示了牠是怎樣起於地質優劣之不同，怎樣起於應用到土地上的資本大小之不同，馬克思充分地暴露了李嘉圖的錯誤（參看第三卷的剩餘價值論，尤其是對 Rodbertus 的批評），李嘉圖以為地租所代表的不過是在最優土地與最劣土

地的農業生產費之間的差額。農業技術的進步，城市的發展等等，可以把土地從這一範疇轉入另一範疇；若照那有名的“報酬漸減法則”所解釋的去解釋——以不足，有限，與資本主義之矛盾歸罪於自然，那是很大的錯誤。一切工業農業部門的利潤的平均化，是以完全的自由競爭，資本從這一部門到那一部門的自由移轉性，爲其先備條件的。但是土地的私有，創造了獨佔，因此阻礙了這種自由移轉性。也就由於獨佔，農產物（農業中，是“低級有機組織”的資本盛行着的，那就是說，可變資本的比例較之不變資本的比例爲高，因此，就能得着較高的利潤率）不會被暴露於利潤率完全自由平均化的過程中。地主是一個獨佔者，能夠保持他的生產物的價格在平均以上，而這種獨佔價格即是“絕對地租”的泉源。差別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是不能廢除的；但絕對地租即在資本主義之下也能廢除——譬如施行土地國有，使全部土地成爲國家財產，用這種方法即可廢除牠。土地國有可

以消滅私有地主的獨佔，其結果將是自由競爭一致地，充分地應用到農業領域中來。那就是爲甚麼急進的資產階級，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曾經一再要求土地國有。在1862年八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把他的平均利潤說與絕對地租說給了一個通俗簡明的解釋。（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錄第三卷；還有本卷中的1862年八月九日的信。）研究地租史的學者應當使自己熟悉馬克思在這問題上的分析，這是很重要的。他指示了以勞役（差役——Corvée，當農民還是農奴的時候，必須在其主人的土地上工作，以創造剩餘生產物）支付的地租，怎樣轉化爲以土物或貢物支付的地租（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物，而把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在非經濟的壓迫下，送給地主），隨後又怎樣轉化爲貨幣地租（這是貢物地租的等額貨幣，如舊俄的“obrok”，由於商品生產的發展，貨幣就代替了土物），最後又怎樣轉化爲資本主義地租，這時候農民的地位被那藉助於工錢勞動以耕種土

地的農業企業者（佃農——The tenant farmer）所代替了。關於“資本主義地租的發生”的分析，我們必須要考察馬克思的“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進化”的深刻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論到那盛行於落後國家如俄國的一些情勢）。在“資本論”第三卷上，馬克思寫着：“貢物地租轉化到貨幣地租的這一轉化過程，不僅是被伴隨着，甚至於被先行着，無產的‘日工勞動者’階級的形成過程，這種無產者的日工勞動者是為獲得工錢而租出他們自己。在開端的時期，那時這一階級的份子還只形成一種分散的現象，這種習俗必然要在比較富裕的為自己利益而掠奪農業勞動者的付租農人間發展着，恰如封建時代的富裕的農奴，他們自己常常也養農奴一樣。這樣他們就漸次能積蓄一定量的財富，在相當的行程中，他們甚且能使自己轉化為資本家。舊時的農民，耕種自己的土地的，這樣就變成了‘資本家佃農’的養成地（Nursery）。其發展率是由那一國家的非鄉村區域中的資本家生產的一般發展

的速率決定的。”“資本論”上又云：“鄉村人口部分的被剝削及其被驅離土地，不僅有使勞動者從其生活手段及其工具“解放”（“setting free”）出來的效果——為工業資本的目的而解放他們；也且有創造一國內市場的效果。”

農業人口的貧困與衰頹又轉而為資本形成一種勞動預備軍。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鄉村人口的一部分總是不斷的轉化為城市的，或工廠的（也許是鄉村的，但不是農業的）人口。這種相對剩餘人口的泉源絕不會涸竭。鄉村勞動者的工錢非常低微，他常常總有一隻腳踏在貧困的泥沼中。（見資本論第一卷。）小規模生產的基礎是，農民——小所有者，佔有其所耕種的土地。因為有這一種“小所有制”，小生產才在農業中繁榮起來，即在那裏獲得其古典形式。但是這樣的小生產僅適合於窄狹的原始的生產典型，適合於窄狹的原始的社會組織。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之被掠奪，與產業無產階級之被掠奪，所不同的，只是形式的一

點上，掠奪者是一樣的——即資本家。各個資本家以典質或其他重利盤剝的方法，掠奪各個農民；整個資本家階級以國家賦稅的方法掠奪整個農民階級。”——“農民農業，小所有制，僅僅是一種使資本家能夠從土地榨取利潤，利息與地租的便利手段，而使農民所有主自己盡其力之所及以酬償其自己的工錢而已。”通常農民總是把其自己的勞動工錢的一部分交給資本家社會，即資本家階級，“自己則被降低到納苛酷地租的愛爾蘭佃農的地位，而只保持着外表好像是農民所有者的地位。”爲甚麼“在許多農業的小所有制佔優勢的國家中，小麥的價格，總是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國家中低些呢？”這個答覆即是，農民把其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作爲自由的（無償的）贈品送給社會（資本家社會）了。因此，小麥價格的低落，“是農業生產者的貧窮的結果，無論如何絕不是農民勞動的例外的生產力的結果。”農民所有制，——小所有制，是小生產的通常形式的，在資本主義之下衰落

了，枯萎了，破滅了。

社 會 主 義

由上文看來，很顯然的是，馬克思是完全由近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推演出從資本主義社會轉化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性。社會主義到來的必然性的主要物質基礎是在多種形態中的勞動社會化，自從馬克思死後的半世紀以來，這種社會化的過程進步得非常迅速，非常顯明——尤其明顯的是，大規模生產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卡特爾，辛底加，托刺斯的發展；還有是財政資本的範圍與權力的巨大的增加。這一轉化之智識的和道德的推動力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即由資本主義本身而“被紀律化，統一化，組織化”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取着各種形式，這些形式不斷地生長着豐富的內容，因而這種鬥爭必然地要成爲一種志在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生產的社會化必然地要達到使生產工具轉移

爲社會所有，達到“剝削者被剝削”。勞動生產力的巨大的增加；勞動時間的減少；無用廢物的擴清；微小的，原始的，個人的生產，由於集團的完美的勞動之發展，而陷於破滅——這些將是這一轉化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捶斷了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聯繫；但在同時，在其發展的行程中，牠却又爲此二者之間的關係的建立，準備下了新的要素，即把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連合建立在應用科學於勞動的聯合及人口的再分配的基礎上（即在同時消滅了鄉村的離塵絕俗，非社交性粗野墜陋等狀態，并消滅了大城市中的廣大人口的不自然的集中）。一種新家庭生活，婦女地位與教養兒童的改變，即是近代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形式的結果；婦女勞動，兒童勞動，族長制的家庭之被資本主義所破壞，必然要在現代社會中取着最可怕最不幸的形式。可是，大規模生產使婦女與兩性的青年及兒童，在這離開家庭中心而走向生產之社會組織的過程中，負起一種重要任務，這又爲家庭的較高形態，以及兩

性間相互關係的較高形態，創造下了經濟的基礎。若假定以為純粹的基督教式的家庭，條頓式的家庭，古希臘式的或古羅馬式的家庭，東方式的（這樣以為這是構成彼此之間的一種聯鎖的形式）是代表一串歷史的統一的發展的徑路，那自然是謬妄的。很顯然的是，兩性及不同的年齡的聯合勞動集體之形成——雖然在現在，這種聯合勞動的集體還是初步的，未成熟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勞動者是為生產過程而存在，還不是生產過程為勞動者而存在，所以牠還是墮落與奴隸之毒害的泉源——在相當的行程中，將要成為人類發展的一個要素（“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末）。工廠制度“是未來的教育制度之胚胎形式，那時生產勞動之結合對於一切在一定年齡以上的兒童，不僅是一種增加社會生產的手段，而且也是完成一種多方面發展的唯一方法”（同書）。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立在同一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民族與國家的問題，但不是懷着投放光明於過去的惟一觀念，而

是懷着勇敢地逆觀未來，勇敢地去工作以求完成牠的實現的觀念。民族是在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時代中的必要的產物，必然的形式。勞動階級，除非在民族的範圍中組織自己，除非是“民族的”（雖然這個字的意義與資產階級所瞭解的不同），不能生長強壯，不能團結牠的勢力。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天一天地傾向着打破那隔離民族的牆壁，消滅民族的孤立主義，以階級的對立，代替民族的對立。所以，在更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真的是，“工人無祖國”，而且“統一的行動（至少在文明國家中）是工人解放所必需的第一條件”（“共產黨宣言”）。國家是權力的組織。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必然要出現，因為那時社會已被分裂為利益不相容的幾個階級，而且若沒有一種似乎是高出於社會之上，且在某種程度還要離開社會而個性化的“權力”，國家就不能維持其存在。國家已經在這個由對立階級組成的社會中起來之後，就變成了“最強者的，即經濟上佔優越勢力的階級的國

家，這種經濟上佔優越勢力的階級，憑藉國家的權力，使牠自己成爲政治上佔優越勢力的階級，因此又得着了征服並掠奪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古代世界的國家最先最先就是奴隸所有者的國家，那時國家之存在是爲的保持奴隸於屈服隸屬的地位；封建時代的國家是封建貴族用以保持農奴於屈服隸屬地位的工具；近代的立基於‘代議制政府’的國家，是促進資本家對於工錢勞動者的掠奪的一種便利手段”（參看恩格思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著者在這部書中說明他同馬克思對於這三者的意見）。事實的這種情形即在最自由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共和國中，也固執着；不過只有一種形式的改變，政府與股票市場相結合，官廳與新聞都爲直接或間接的手段所變化。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因而也將要消滅國家。恩格思在“反杜林”中云：“國家成爲整個社會的代表，即是爲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佔有生產工具的這第一幕，也將是其所以爲國家的最後的獨立的一

幕。國家權力之在社會關係中的干涉將成爲贅瘤，而且在繼此而後的統治中，這種干涉將不再繼續了。‘人’的治理將要轉化爲‘物’的處理，與‘生產過程’的管理。國家不是將要取消，而是將要‘死滅’（‘die out’）。”再引一點恩格思的話（“家族的起源”）：“一種把生產組織在生產者的自由平等的聯合的基礎上的社會，將把國家安放在牠所應安放的地方——即放在古物博物院中的紡織機輪與銅斧的旁邊。”

最後，假若我們想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於較小農民階級（這種較小農民階級即在剝削者被剝削的時代將仍然繼續存在下去）的態度，我們必須再轉到恩格思對於馬克思的意見的解釋。我從登載在“Neue Zeit”上的一篇論“西方土地問題”的文章中引一段如下：“當我們奪取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將絕不要夢想着沒收貧苦農民，小所有者（不論有無報償），如我們必須沒收大地主一樣。我們對小所有者的任務只是注意到使他

們的個人生產與個人佔有，轉化為共同生產與共同佔有，但是這種轉變必不可強制執行。我們必須作模範給他們看，以這個目的給他們以社會的幫助。那時我們將有方法把這個轉變的一切利益顯示給貧苦的農民看——就是現在，我們也能把這些利益顯示給那些小所有者。”

階級鬥爭的策略

遠在1844年或1845年，馬克思就看到了早期唯物論的最大缺點是牠不懂得或不認識實際革命活動的條件與重要。所以，在他的後半生，他不以僅在純粹理論的範圍中工作為滿足，他還積極地注意勞動階級鬥爭的策略問題。馬克思的一切著作，都證明這個事實，關於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1913年印行的他與恩格斯的四卷通信（“Briefwechsel zwischen Engels und Marx”）。其他關於這些實際活動的許多材料還待收集，註釋與經營。這裏我只簡單地敘述此事就夠了；特別着重一點，就

是馬克思（有很好的理由）認為唯物論要是沒有“這一方面”，那不過是一種模稜之論，是一種半死不活的東西。無產階級策略的根本路線是由馬克思嚴格地遵照其唯物辯證法的形勢的一般原則定下來的。唯有一定社會的一切階級的一切相互關係的總和的客觀估計，隨後就是這一社會的發展的客觀階段的估計以及在這一社會與其他各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估計——除此以外再也沒有甚麼能夠扶持那形成前衛的階級的正確策略。再進一步說，就是，不要“靜地”去看一切階級，而要“動地”去看牠們；不要把牠們看為是不動的，而要把牠們看為是在“動”之中的（牠們的動的規律是由每一階級的存在經濟條件決定的）。轉過來說，對於這個運動，不僅是從‘注視着牠的過去上’去觀察牠，也且要從‘注視着牠的將來上’去觀察牠；不僅是要照“經濟學者”的普通概念去觀察牠——經濟學者僅只看到舒緩的變動——尤其要辯證地去觀察牠。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有云：“在偉

大歷史的過程中，二十年不過如一日——以後來臨的日子，才是這二十年的集中的本質”（“通信錄”第三卷。）在每一發展的階段上，時時刻刻，無產階級的策略必須要確切地顧及到人類歷史的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辯證。有時候（在政治停滯的狀態時，一切事件都是以蝸牛的步驟轉動着，即是所謂“世界”進化的時代），必須大大地注意於鼓勵階級意識，促進最進步階級的力量和戰鬥能力；在另一時候（在大時代中，即所謂“二十年的集中的本質的日子”），我們必須要為那特殊階級的“最後目的”把捉機會，而且我們必須要培植牠的材力，使能擔任這大任務的實際扮演。在這方面，馬克思的兩個論辯是特別重要的，一在“哲學的貧困”中，是關於無產階級的產業鬭爭與產業組織的；一在“共產黨宣言”中，是關於勞動者的政治活動的。

前一個論辯是這樣說的：“大規模生產把許多從前彼此不相識的人們引致到一個地方來了。競爭分裂了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工資率的防衛給了

他們以聯合的利益來對抗他們的僱主，而把他們引出於孤立之外，把他們結合成爲集團。爲‘抵抗’的一般觀念所鼓舞，他們乃組織工會。這些工會，起初是各自孤立的，後來不得不自己聯合起來，以爲對抗僱主的防衛手段，僱主方面是強固地聯合起他們的力量來進攻的。有時候，防衛工會，對於工人們，好像比防衛他們的工錢還要重要些……在鬭爭(內戰的既存形式)中，聯合了並發展了正在來到的總交戰的一切分子。既已達到這一點，這種結合就要取着一種政治的性質。”這裏，馬克思，在數十年前，就把勞動者在長時期中準備“這正在來到的總交戰”(“The coming general engagement”)的產業鬥爭與工會運動的綱領與策略畫出一個輪廓來了。我們在這裏必須還要把馬克思在通信中寫給恩格思的話摘述幾點。譬如(“通信錄”第一卷)講到英國的勞動階級的運動時，馬克思說，產業是在一種發榮的狀態，於是就有“收買工人”的企圖出來，要把他們從鬥爭引誘出去，並說，

一般說來，長期的繁榮“已經腐化了工人”（“通信錄”第二卷），所以英國的工人是走到了資產階級的陣營。他說（“通信錄”第二卷）：各國資產階級的最後目的好像是要建立一種資產階級的貴族政治同一種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並存起來。”又說（“通信錄”第三卷），英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力”已經滲漏完了；說，必須要等待一個很大的時間，“英國的工人才能搖落他們的資產階級的惡症”；說，英國的運動“缺乏舊時大憲運動派的精神”；說（“通信錄”第四卷），賀里約克（Holyoake），勞動階級的領袖，是“一個在急進的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中介人。”1881年八月十一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說：“英國工人現在不會再前進了；他必要被產業獨佔的失敗震出於他的軌迹之外。”產業鬥爭的策略和工人階級運動的現在的行程與可能的將來，在這些信中，都是從一種廣大的，多方面的，辯證的，真正革命的形勢去考察的。

第二個論辯，關於政治鬭爭的，是寫在“共產

黨宣言”的最後一章上的，即是：“共產主義者爲勞動階級的直接目的和直接利益而奮鬥，但在牠們的現在的運動中，他們也擁護那個運動的將來。”那就是爲甚麼在1848年時，馬克思也援助那主張土地革命的波蘭黨——“即在1846年發動克拉考(Cracow)的暴動的黨。”在德國，在1848同1849年中，他也贊助了革命民主黨的左翼，即後來在策略問題上，他也常常沒有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他認爲德國的資產階級“開始就有出買人民利益的傾向”（除與農民聯盟外，再也沒有甚麼能使資產階級完成牠的目的），“而且有與社會舊制度的戴着皇冠的顯着人物們妥協的傾向。”讀讀馬克思對於德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態度的總估計——那真是一篇唯物的分析的傑作，那是考察着在運動中的社會，不僅是看着面對着“落後”的那一部分的運動。這裏就是他1848年在“萊茵新聞”上所寫着的（見“遺文集”第三卷）：“不信仰自己，不信仰羣衆；對着上面的人們怨謗，對着下面的人

們發抖……對着泛濫世界的騷動戰慄恐懼；沒有甚麼地方表現着能力，惟有處處表現着剽竊抄襲……；沒有一點獨創的天才……一個可憐的老人，命運注定了要去指導一個無經驗的而精力瀰滿的人的第一次的青年衝動，但是爲着他自己的老耄衰朽的利益而給以錯誤的指導。”約在二十年以後，1865年二月十一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思的信（“通信錄”第三卷）說，1848年的革命失敗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寧願有奴隸似的和平，而不願爲自由的前途奮鬥。當1848到1849年的革命時代過去了的時候，馬克思堅決地反對任何人玩弄革命（沙伯爾——Shapper與威理希——Willich及與他們爭辯的人們），堅決地主張必須在新的情形下建立工作，其時新的革命正在創造中——所謂和平只是彷彿有這麼一回事而已。馬克思要使工作繼續進行的這種精神，由他對於德國在反動最厲害的時候所處地位的估計表顯得很明白。1856年他說（“通信錄”第二卷）：“德國所完全依賴的是由一種第二版的

農民戰爭援助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馬克思以爲，直到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那些在德國指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策略的人們應該集中注意於發展農民階級的民主精神。他以爲拉薩爾，客觀地看來，“是把整個勞動階級運動出賣給普魯士人了”（“通信錄”第三卷），又說，拉薩爾“太放縱了普魯士的貴族黨與普魯士的國家主義。”恩格思在1865年二月五日寫給馬克思的信，說及關於他倆正在起草的一篇論文或小冊子，曾說（同上書）：“假若我們能夠，我們必須要暗示出這一事實，即在農業佔非常優勢的國家如普魯士中，完全以產業無產階級的名義攻擊資產階級，而對於封建王侯之對鄉村無產階級實行族長式剝削的樺杖鞭笞方法，緘口不說一句話，這是非常荒謬的。”在從1864到1870年的時代（在這時代中，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已經發揮盡致了，而且在這時代中，普魯士與奧大利的被掠奪階級想以這種方法或那種方法“從上面”完成革命的這種鬥爭，

已經走到盡頭——失敗了)，馬克思不僅痛罵拉薩爾之向俾士馬克賣弄風情，也且責備李卜克內西之墮入於 Austrophilism 及擁護 Particularism。馬克思堅決地主張要無情地對俾士馬克與 Austrophils 奮鬥，這一個革命策略不僅不投合於“勝利者”(普魯士的貴族黨)的願望，而且實際上不久還要引達於在由普魯士軍事勝利所創造的政網上與他奮鬥的鬥爭的復活。(“通信錄”第三卷)。在1870年九月九日由國際工人協會所發表的有名的演詞中，馬克思曾以未成熟的暴動警告法國的無產階級；但在1871年，當暴動實際發生了的時候，馬克思以非常的熱情慶祝羣衆的革命的創造精神，在一封給 Kugelmann 的信中說他們是“轟動了天堂”。在此情勢，也如在其他許多情勢一樣，革命進攻的失敗，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的總行程，固然是一種不幸，但這種不幸，由馬克思看來（從辯證的唯物論的形勢看來），比之從所已佔據的地位退下，比之不戰而降，好像還要小一點。這樣的投降

是會腐化勞動者的，是會使勞動者脫離鬥爭的。馬克思完全承認在政治的停滯期間而且資產階級自身是以立憲的在工作的時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的，立憲的鬥爭手段的重要。在1877年同1878年，當反對社會主義者的例外立法在德國通過了的時候，他強烈地責罵那些“口頭革命”(revolutionary phrase-making)的人。但他也相等地，或者更激烈些地，反對有一季節流行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的機會主義，那些領袖們缺乏堅毅果決的精神，不敢從事於以非憲法的鬥爭去答覆那反社會主義者的條例。(見“通信錄”第四卷，及1879年九月十日致 Sorge 的一封信。)

—

哥達綱領批評

- 一，恩格斯序言
- 二，致白拉克書
- 三，德國勞動黨綱領旁批

哥達綱領批評

一，恩格斯序言

這現在方才印行的手稿和致白拉克(Bracke)的書信，是馬克思在1875年離哥達聯合會議(註一)之期已沒有多少時候，寄給白拉克的。哥達綱領既要在哈勒會議(註二)上重新討論，我覺得若再把這個重要文件壓下，不與發表，那麼過就在我了。

手稿當有更大的意義。馬克思對納薩爾在勞動運動中所引起的傾向，取何種態度，在這裏第一次明白的，堅決的表示出來，馬克思對於納薩爾之經濟學說和其策略所要說的話，盡在於此。

解剖綱領之嚴刻，發表其分析底結果，暴露綱領草案之缺點的刻薄，過了十五年已不至再傷任何人的感情。德國現在沒有真實的納薩爾主義者。在哈勒會議上，就是參加起草哥達綱領的人，也因為牠的全不適用而不要牠了。

但是文句太過火的地方，我把牠刪去，只要不損及原意。刪去的地方，都以點為記。馬克思若在，要發表這手稿時，也必然如此。然則他在1875年的時候，為甚麼用詞這樣過火呢？那時有兩個條件，使他如此：第一，馬克思和我對於德國勞動運動，比對他國勞動運動，較為密切熟習；一看見德國勞動黨綱領的草案，有這樣明顯的退化，當然就忍不住要動氣。第二，那時去海牙國際會議，才不過二年，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黨——他們把德國勞動運動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責任，都歸在我們身上——的劇烈鬥爭還沒有止息，我們自然會以為別人要把我們看作哥達綱領草案之祕密父親。現在是時勢轉移，那些過火的地方，自然就好刪去

了。

有幾處又是因出版法的關係而刪去的；有幾處我代以較溫和的字句，以括符爲記。此外，一仍其舊。

1891年一月六日，恩格斯序於倫敦。

二，致白拉克書

親愛的白拉克：

附上綱領旁批，請你看完後，就拿給該伯（Gelb），奧爾（Auer），倍倍爾（Bebel）李布克奈西（Liebknecht）看。我的事情很忙，實已多過醫生所許可的。我本沒有興會來寫這樣長的議論，但是要使黨內同志對於我在將來所取的步驟，不致發生誤解，所以才不得不這樣冗長的表示我的意見……

……這是不能容許的，因爲在德國以外的我們的敵人，很奇妙的說我們從倫敦祕密指導愛孫納黨（註三）的活動——其實是完全錯誤的見解。譬

如巴枯寧，他就在近刊的俄文書中，……把愛孫納黨所有綱領中各種責任，都歸在我的身上。……

而且，我有避去默認這我所視為不善的，且使我黨墮落的綱領之義務。

實際活動之每一步驟，比一打綱領還要重要。所以若不能勝過愛孫納綱領（註四）——實在，那時候的情形，使得不能有這樣的進步——那嗎，只要對抗禦共同敵人的行動，有一簡單協定，也就行了。若要作一涉及原理的綱領——不等聯合活動經過一定時期，才定綱領，作為聯合活動的效果——即是在全世界之前，樹立測量我黨運動的範圍的界石。納薩爾派的首領，因受環境壓迫，才來與我們聯合。我們若起初對他們說：對於原理，是不能有所爭論的，那嗎，他們迫於形勢，也只好以得一行動綱領或一聯合行動之組織計劃為滿足。但我們并未如此，卻讓他們受他們黨的訓令來出席，再承認他們的訓令為有效，就至於無條件降服這比我們差得多的勢力。甚至，納薩爾派在開妥協

會議之前，自己先開一次會議；而我卻等到妥協會議終會之後，才召集自己的大會。……我們都知僅聯合此事實，就使工人滿意，但我們若以為這暫時成功之代價并不甚大，那就錯了。

這綱領對於納薩爾以外的人，完全是沒有價值的。……

祝你好！

你的馬克思

三， 德國勞動黨綱領旁批

一

一，“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明之源，且以只在社會內，和只依社會，人才能做有用的工作，所以社會中人人都有領有其勞動生產品之全部的平等權利。”（註五）

這一條的第一段是，“勞動是一切財富和文明之源”。

一切財富之源，不只是勞動。自然也是使用價值——物質的財富，就是使用價值所組織成功的——之源。且勞動自身，也不過是自然力——人類勞動力——之表現。兒童讀本，都有勞動是一切財富之源這麼一句話。這句話若是說“要有適當的材料和手段，才能工作”這個意思是沒有寫出來，留待人自己去理會，那嗎，還對。但社會黨的綱領，不應該用這種資產階級的話法；不應該毫不提及那句話的意義所依的條件。人要有了自然，——一切勞動工具和勞動材料之初源——他的勞動，才生產使用價值，財富。資產階級好稱勞動具有超自然的創造力。這是甚麼原故？因勞動雖具有超自然的創造力，但一定要憑藉自然，才能有所作為。勞動既然是靠自然，那嗎，除自己的勞動力之外，沒有一點別的東西的人，不論社會與文明在何種狀態，總是要為擁有物質資料——沒有這些資料，就無所用其勞動——者的奴隸。無產者只能工作，所以只能過痛苦的生活。

這原則是否正確，暫且不提。現試問從這原則，應該釋出甚麼結論？顯然是：

“勞動既為一切財富之源，那嗎，社會中不論何人，若不勞動以取其生產品，就不能取有財富。所以不勞動的人，都是依他人的勞動而生活，所享受的文明，係犧牲他人的勞動而得的。”

但綱領並不從第一原則演繹出這結論，卻用“且以”這接續詞，引出第二原則來，然後再從之以演繹結論。

此條第二段：“只在社會內和只依社會，人才能做有用的工作。”

照第一原則，勞動既為一切財富和一切文明之源，那嗎，沒有勞動，就沒有社會了；現在卻反說沒有社會，就沒有有用的工作。

可是，別人也可以跟着這樣子說：只在社會內，無用的工作，和甚至有害的工作，方能在工業中占一地位；只在社會內，人方能不做工而生活；換言之，可以把盧梭的學說，再全述一遍。

而且，甚麼是“有用的”工作？這名詞之意義，只說那種工作是具有一切所欲的有用的目的。然而才從猿類進化出來的野蠻人，拿石頭打死動物，伸手摘取果實，也就是做了有用的工作。

這下，把牠的結論研究一下：“且以只在社會內和只依社會，人才能做有用的工作，所以，社會中人人都有領有其勞動生產品之全部的平等權利。”

好個結論！若是人只在社會內和只依社會，才能做有用的工作，那嗎，勞動的生產品就屬於社會；而所有的生產品，除去維持工作“條件”，即社會的所需之後，剩餘的方才歸工人。

擁護現代制度的人，就常這樣主張。他們說，第一要維持政府及其一切機關，因“政府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工具”。其次要維持各種私有財產，因“各種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基礎”。此外還有許多。可知這類空洞的說話，是可以任意顛倒的。

此條第一段第二段，要有合理的關聯，則應當

這樣解釋：

“勞動僅為社會的勞動，或只在社會內及只依社會，才成為財富和文明之源。”

這個原則是不錯的。有適當物質條件的孤獨的勞動，雖能生產使用價值，但不能創出財富與文明。

下面這原則，也是很對的：

“勞動經社會而發展成為財富和文明之源，在工人方面，就跟續發展貧乏和悲苦，在非工人方面，才跟續發展財富和文明。”

這是歷史以來不變的法則。所以，與其白說一般的勞動怎樣，一般的社會怎樣，何如明明白白地證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終局要怎樣發生出許多物質條件及其他條件，使工人有所藉口來詛咒現代社會，而且使工人不得不詛咒現代社會。

綜觀全條，在外觀上，在內容上，都有許多缺點。然則為甚麼要採用呢？其目的完全是在以納薩爾派“勞動全收權”這口號為勞動黨的標語。至於

“勞動生產品”，“平等權利”這類話，後面還要引述，那時再說。

二，“在現代社會中，勞動機關爲資本家階級所獨占。所以，勞動階級一定要依靠着資本家階級。勞動階級之貧乏，之爲人奴役，原因即在於他們不得不依靠資本家階級。”（註六）

這本是抄自國際的規約，然因修改而陷於錯誤。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機關爲地主與資本家所獨占，——土地獨占，實爲資本獨占的基礎。這一段國際規約，並沒有說出獨占勞動機關是那階級，只說“勞動機關即生活泉源之獨占”。但“生活泉源”這幾個字，已夠表示土地也包含在勞動機關之內了。

修改之原因，是納薩爾只攻擊資本家而不攻擊地主。英國資本家很少有自有其廠地的。

三，“勞動之解放，最要是收勞動機關爲社會共有財產，協同管理全社會的勞動，公正分配勞動

生產品。”(註七)

甚麼是“勞動生產品”?是生產品實物呢?還是生產品的價值呢?若是生產品的價值,那嗎,是其全價值呢?還是勞動所添加的價值呢?

“勞動生產品”這名詞,是納薩爾以曖昧的概念來代替經濟上另一明確的概念。

甚麼是“公正分配”?

資產階級對於現代的分配方法,不是很滿意而認為“公正”的嗎?而且在現代生產方法基礎上,這種分配方法,豈不是事實上為唯一的“公正”方法嗎?經濟的條件為立法的條件所支配呢?還是立法的條件,為經濟的條件的結果呢?再,社會主義各派,對於“公正”分配,意見豈不是頂複雜的嗎?

我們若要懂得“公正分配”這名詞是甚麼意義,就要把第一條與第三條的話,對照一下。第三條說,“收勞動機關為社會共有財產協同管理全社會的勞動”。而第一條說,“社會人人都有領有其勞

動生產品之全部的平等權利”。

“社會人人”怎樣講？是不是包含非工人在內？若然，則“勞動全收權”怎樣講？還指社會內做工的人？若然，則“社會人人都有平等權利”又怎樣講？

所謂“社會人人”，所謂“平等權利”，顯然都不過是裝飾之詞；其本意是說：在這共產主義的社會，每個工人都一定要取得納薩爾所主張的“勞動生產品之全部”。

“勞動生產品”這名詞，現若解釋為生產品實物，那嗎，協作勞動所生產出來的物品，就全部是社會生產品。

這社會生產品應拿出一部分來：

第一，補充生產機關之消耗。

第二，擴張生產。

第三，準備天災地異危及生產時之用。

在經濟上看來，從“勞動生產品的全部”提出這一部分為上列之用，是必要的。至於應提多少，

是按照各種情形而定。預測全社會勞動而生產物品若干，再預測第一，第二，第三各項所需若干，然後算定。但是計算時絲毫沒有“公正”的觀念。

剩下的生產品，才是用於消費的。

但在分配給個人之前，還要拿出一部分來：

第一，屬於生產之一般行政用費——非生產工作所必需的直接用費。所費比現代社會要少，且隨新社會之發展而繼續減少。

第二，滿足某種共同要求——如教育，公共衛生等，所費比現代社會要多，且隨新社會之發展而繼續增加。

第三，維持不能工作者之生活，即等於現在所謂“貧民救濟費”。

然後才談得到綱領——因納薩爾派之影響而致觀念狹隘——所注視的分配。才談得到如何處置要分給工人的消費物品。

生產者的勞動生產品，有一部分提去作為社會公共之用。雖然從社會直接，間接取償回來，但

“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已顯然減為“勞動生產品之一部”了。

“勞動生產品之全部”這句話，一加分析，就不能存在。“勞動生產品”這名詞也是如此，若再分析，也不能存在。

建築在生產機關共有之上的協作社會內，生產者不以自己勞動的生產品互相交換。製造某一生產品所費的勞動，也不作那生產品的價值，即不為那生產品所具的一種物質的品質。因那時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情形不同，勞動者個人的勞動，已不間接存在，而只直接為構成全社會的勞動之一了。所以“勞動生產品”這名詞，毫無意義，就是現在，也已因其意義曖昧而受人反對了。

這裏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是從自己獨立的基礎發長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生長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智識各方面上，都尚殘存有舊社會的缺點。每一生產者為社會所做的工作，除提出一部分為社會公

用之外，都從社會取償回來。他所給社會的，是他的勞動量。社會各個工人所做的工作時間，合起來就成為社會的工作時間。每一生產者個人的工作時間，就是他在社會的工作時間中所占的那一部分。他領得一張券，證明他做了那麼多的工作（減去為社會公用所做的工作）。然後到公店，將這證券換取等量的消費品。他為社會所做的工作量，也以別一形式，取償回來。

這是相等價值的交換，故也為商品交換，同一道理；不過是因為社會的各種條件已經改變，除自己的工作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可給別人，且除自己的消費品之外，沒有別的東西能為己有，交換的內容和形式，就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了。所以生產間互相交換其消費物品，與價值相等的商品之互相交換，其理實一，即以此形式的工作量，交換得他形式的工作量。

社會還是以權利（資產階級的權利）平等為原則，不過理論與實際已合而為一，價值相等的商品

之交換，是普通方法，而非個別方法。

這比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雖已進步許多，然尚未跳出資產階級的範圍。生產者所得的權利，與他所做的勞動成正比例。所謂平等，即是以一標準，即勞動，來繩社會全體。

然身體有強弱，資質有聰鈍，強者，智者，其一時間的工作，效果必多於弱者，鈍者；且強者定能比弱者繼續多做幾小時工作。若以勞動為準繩，那嗎，對於勞動的效率，勞動的長短，自在應該顧慮之列；蓋因不如此，就不能成為標準。所以，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的工作，得不平等的權利。社會雖人人為工人，沒有甚麼階級的區別，但既默認不平等的天資，和不平等的能力，那嗎，天資能力過人的人，就有過人的權利了。所以平等權利，實際上是不平等的。

權利在本質上，僅為使用一律的標準。然而要以平等標準來繩不平等的個人——其所以不平等，不過因為他們不是一個人——那嗎，只能從同

一角度去觀察不平等的個人，單看他們之某一方面。把他們都一律視為簡單的工人，別的品質，一概不管。工人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有的無子，有的多子。假如做等量的工作，得等量的消費，則在實際上一定有人比他人獲得多，有人比他人充裕。若要免去這些弊害，權利就不應為平等的，而應為不平等的。

然而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這些弊害是不能避免的；只因爲共產主義剛才從資本主義社會生出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和因之而生的社會文化的發展，達到何處，權利亦就只能達到該處，不能踰越分毫。

在共產主義的較高階段，工人在分工下所受的奴隸束縛，是消滅了，因之勞心與勞力沒有區別；勞動不單爲謀生的手段，而且爲生命的第一欲求；社會生產力之增大，與社會的個人在各方面之發展成正比例，然後，我們才能跳出狹小的資產階級的眼界，然後，社會才能在牠的旗幟上寫起“各

盡所能，各取所需”。

我對於“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平等權利”，及“公正分配”說了這許多話，目的是要指出，第一，強以過時的，毫無意義的學說，爲我黨之信條；第二，企圖拔去堅植於我黨黨員腦中的現實觀念，而代以權利，平等等空想（權利，平等都是民主黨及法國社會民主黨所最喜歡說的）。都是重視分配過於其他問題，實極錯誤。

不論在甚麼時候，消費品的分配，不過是那時代的生產機關之分配的結果。生產機關之分配，又爲那時代的生產方法的特質。試以資本家的生產制度爲例。牠的基礎爲：生產的物的條件，在非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裏，而平民所有的，爲生產的人的條件——勞動力。生產要素既如此分配，自然就生出現在這種消費品的分配制度。假如生產的物的條件爲工人的共有財產，那嗎，消費品的分配制度，就一定不會同現在一樣了。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謂分配問題，可離生產方法而獨立研

究，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奉之爲天經地義。有一部分民主黨員，又再從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抄去，就此推斷說社會主義是專重討論分配問題的。然生產與分配之關係，其實質早就既顯且明，我們何必再跟他方一樣呢？

四，“勞動之解放，應是勞動階級自身的事業。與勞動階級對峙的其他一切階級，合成爲一反動派。”

此條前段係抄自國際規約的首句而加以修改。國際規約的原文是“勞動階級之解放，應是勞動者自己的事業”。可是綱領中的修改句子怎麼樣？勞動階級要解放——甚麼？勞動。這只有他了解，誰也不懂得。

前半雖壞，但後半更糟。後半就是納薩爾派自己的話：“與勞動階級對峙的其他一切階級，合成爲一反動派”。

共產黨宣言中有一段說：“現在與資產階對峙的各階級中，只有這無產階級，才算得真正的革

命階級。別的階級都隨着大工業之發展而衰落，而消滅，唯有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特產。”

資產階級是大工業的擁護者，為與封建貴族及中等階級——他們要維持為古代生產方法之產物的社會地位——對峙的革命階級。所以封建貴族及中等階級，並不與資產階級合成為一反動派。

無產階級為與資產階級對峙的革命階級，發長於大工業之上，努力要將生產所具的資本主義的特質除去；而資產階級卻欲維持那種特質。但共產黨宣言又說，“中等階級若覺得自己將墮入無產階級時，也會革命”。

這樣看起來，斷定中等階級將與資產階級，封建貴族“合成為一反動派”來與勞動階級相對峙，也是謬誤的。

近來選舉競爭的時候，我們嘗對獨立的手工業者，小製造家，及農民說：“你們將與資產階級，封建貴族，合成為一反革命派，來與我們相對峙

嗎？”

但納薩爾是很懂得共產黨宣言的，有如納薩爾信徒之懂得納薩爾自己之聖神著作一樣。他之所以塗改共產黨宣言，是爲要掩飾他與專制主義者，封建貴族之聯盟——他的對抗資產階級的聯盟。

往下又生硬的加上納薩爾式的說話，此種話斷然不會不合於畢士馬克的口味的……

五，“勞動階級應先在現代國家之範圍內努力活動，以謀自身之解放。各文明國的工人，都這樣努力。同時，覺到這種努力的必然效果，一定爲世界人類的親愛。”（註八）

納薩爾從最狹隘的國家主義的立場，去考慮勞動運動。這實在遠於共產黨宣言與以前的社會主義所照示者。

勞動階級要鬥爭，一定要先把本國的勞動者團結做一個階級，而在本國進行階級鬥爭。在這種意義上，階級鬥爭是國家的。但是這並不是說階級

鬥爭的實質是國家的，而不過如共產黨宣言所說，在形式上為國家的而已。且“現代國家之範圍”，如德意志，牠自身在經濟上，是在世界市場範圍之內；在政治上，是在國際團體範圍之內。就是德國商人，也知德國的商業，同時為國際的商業。畢士馬克之偉大，即在於他的政策之帶國際性。

德國勞動黨的國際性，至此而墮落到承認“努力的必然效果，一定為世界人類的親愛”。德國勞動黨從資產階級的和平與自由聯盟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 抄了這句話，要牠來代替國際勞動階級在共同對統治階級及其政府作戰時的親愛。至於德國勞動黨在國際上的任務，卻一字不提，這就是德國勞動黨攻擊本國資產階級與畢士馬克的國際陰謀政策所採取的態度！但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已與他國的資產階級，很密切的聯合起來攻擊工人了！可見德國勞動黨的國際意識遠遠不如德國資產階級！

德國勞動黨綱領之國際主義的意識，實在比

自由黨還差得多。自由黨不是也說“世界人類的親愛”爲他們努力的目的嗎？而且實際上牠確曾盡力去把商業改進爲國際的；決未嘗滿意於各國僅在自己國內進行商業。

勞動階級之國際的活動，決不是在有了國際（譯者按即指國際工人協會）之後，國際之成立，不過是各國勞動者第一次企圖建立一中央機關，以指導國際的活動而已。國際雖隨法國共社之失敗而消滅，但創建國際時所起的刺戟，卻產出永久的效果。

畢士馬克在“北德新聞”上，說德國勞動黨在新綱領中已捨棄國際，真是不錯呵！

二

“依據這些原理，德國勞動黨以一切合法的手段，努力創造一自由的國家，建設一社會主義的社會；努力推翻工錢制度及其工錢鐵則，推翻一切的掠奪；努力廢除各種社會的，政治的不平

等。”(註九)

關於“自由的國家”一問題，我以後批評。

德國勞動黨從今以後就應信奉納薩爾的“工錢鐵則”了！綱領說甚麼“推翻工錢制度及其工錢鐵則”，(其實工錢制度應說為工錢勞動制度)這有甚麼意義呢？設如我們廢除工錢勞動，工錢定則自然也就廢除去了，不管那定則是鐵的，或是海綿的。然而納薩爾對於工錢勞動的攻擊，卻完全在於工錢鐵則。綱領上說推翻工錢制度及其工錢鐵則，——不是不及其工錢鐵則，可知納薩爾派是勝利了。

納薩爾的工錢鐵則，這個鐵字，係仿自哥德的“永劫的大鐵則”。這“鐵”字成爲一種標記，凡用這個字，就是正教徒。我們若信納薩爾的工錢鐵則，就應該還要信這鐵則所依據的基礎。這基礎是甚麼？納薩爾死後，有一人口論信徒朗格(註十)說工錢鐵則的基礎，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對的，那麼，就是我們拚命要廢除工

錢勞動，也不能推翻這工錢法則；因為此種法則所支配的不單是工錢勞動制度，而是一切社會制度。這五十餘年來的經濟學者，都常站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立場，來證明貧窮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社會主義并不能除去貧窮，僅把貧窮普遍於衆人，把全社會都陷於貧窮而已。

上面所說的，并非主要地方。綱領字裏行間的巨大退步，不在納薩爾這錯誤的定律，而在於——

納薩爾死後，我們黨內有一種科學的信仰，謂勞動的工錢，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勞動的價格，而只是勞動力之價值或價格的假形。工錢勞動者必要以一部分時間，來做有利於資本家或其他消費剩餘價值的人，而毫不關己的工作，然後才能爲他自己的生活的，即謀生活而勞動。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全部都靠着在擴大這種無報酬的工作。擴大的方法，或爲延長工作時間，或爲增加生產力。所以，工錢勞動這制度，是一樣奴隸制度。奴隸制度之

殘刻，與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成正比例，不管勞動者所得的報酬是增加還是減少。此種事實，現在很顯然的。所以從前對於勞動工錢之一切資產階級的學說及其批評，都全部推翻，此種科學的信仰，現方疾速的得我黨黨員之深信，而我們為何卻反退後接受納薩爾的學說。納薩爾顯然不知勞動工錢，實為何物，唯跟着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把工錢的外表，當作工錢的實質。

這好比：有一羣奴隸，後來了解奴隸制度的意義，就起來革命。其中有一個奴隸，他的思想，尚為從前的觀念所支配，在革命的綱領上寫下：奴隸制度非廢去不可，因在奴隸制度中，奴隸的價錢總是少得可憐呵！

我黨的代表，訂出來的妥協綱領，其主張竟與黨員的一般意見，距離極遠，這證明他們在起草的時候，是如何的輕薄！

此條以“廢除各種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作結，其實何得說這樣空洞的話，應該說廢除階級差

別，從這些差別上生出來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就自然隨之消滅了。

三

“德國勞動黨要求由國家資助，設立生產合作社，而在勞動民衆的德謨克拉西支配之下，以謀社會問題的解決。在工業與農業中，應興辦許多生產合作社，爲將來‘集體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之基礎。”（註十一）

在工錢鐵則之後，就隨着這預言家納薩爾的萬應散！不說“現代的階級鬥爭”，而說爲“社會問題”。又“謀”“社會問題”之“解決”。集體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不是發生於社會推移之革命進程，而是發生於設備生產合作社的“國家資助”。合作社之設立又不由工人，而由國家。納薩爾以爲用政府公款來建築一新社會制度，與用政府公款來建築一條新鐵路，是一樣的容易。納薩爾這種觀念是如何的幻想呵。

這種“國家資助”，又要放於“勞動民衆”的德謨克拉西的支配之下，那真……其可恥孰有甚於此者。

第一，德國的“勞動民衆”，農民是多於無產階級(工人)。

第二，“德謨克拉西”德語作“人民統治”。但“勞動民衆的人民統治之支配”是甚麼意思？這種勞動民衆，看他們要求國家資助，就知道他們沒有統治的能力，而獲得統治權的時機還沒有成熟！

路易·菲利浦時代，“步社”(Buehez)派起草一個違反於法國社會主義者之一般願望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案，爲那些辦“工場”(註十二)的反動工人所採用。這裏用不着批評牠。而且我們所反對的，不在綱領採進了這一萬應散；而在於牠一般的錯誤，即是由階級運動的立場，退至分派運動的立場。

我們說工人要把合作生產的條件，創立在社

會基礎上，先於在國家基礎上，是說他們努力改變現代的生產制度，決沒有一點同於由國家資助設立合作社為基礎。就將現在的合作社來說，其所以有價值，完全因牠們是為勞動階級所獨自創造的，而不因為其為政府所保障，資產階級所愛護。

四

現在論及德謨克拉西部分。

A. “國家的自由的基礎”。(註十三)

第二節謂德國勞動黨的目的，是在於建立“自由國家”。

自由國家——甚麼東西？

脫却狹隘觀念的勞動者，他們決不會以使國家自由為目的。德國國家差不多與俄國國家，一樣的自由。而且，自由是把國家由支配社會的機關，變作被社會所支配的機關。今日的國家形式，是否自由，完全看社會限制“國家的自由”是否成功。

德國勞動黨採用這種綱領，可知他們決不把現代社會，看為現代國家的基礎（換言之，不視將來社會，為將來國家的基礎），而把國家看為一獨立的東西，有牠自己之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

“現代國家”“現代社會”這兩個名詞，都遭誤用。但更大的錯誤，是牠對於國家——綱領向國家有許多要求——之觀察。我們現在從新研究一下：

“現代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各文明國都行資本主義制度，脫離中世紀的混雜物，都受牠的特殊歷史的發展的影響而變狀，不過其發展之程度不同而已。但現代國家卻就——不同，德國異於瑞士，英國異於美國，所以“現代國家”，簡直是一杜撰的名詞。

各文明國家，形態上雖極差異，然有一共通要素，即：都建築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之上，不論其資本主義之發展程度如何。所以牠們具有許多共

通的根本特質。在這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國家制度”，以別於將來的國家制度，即資產階級社會（現代國家之基礎）死滅之後的國家組織。

因此，發生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內，國家制度將如何變革，換言之，在共產主義社會內，還有甚麼類於現代國家的機能？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有應用科學方法，不是只把人民與國家說之千遍，所能解決。

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從前者推移到後者之革命的轉化時期。政治上也相應的有這樣一個過渡時期，這過渡期的國家，只能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獨裁制。

然而綱領對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獨裁制及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國家組織，卻毫末提及。

政治上的要求，不過是些德謨克拉西的常談，普通選舉，直接立法，國民權利，國民軍役等，完全雷同資產階級政黨，和平與自由同盟之要求。這些

單純的要求，都已實現；不過實現的地方，不是德國，而是瑞士，美國等而已。這種“將來國家”，那知才是“現代國家”，不過不在德意志帝國範圍之內耳。

而且忽視一點。德國勞動黨既公然宣言牠是在“現代國家範圍內”努力活動，則所謂現代國家是指本國德意志而言，若不是指本國，所提出的要求便無意義，因為別處已經實行，無所用其要求了；那嗎，就不該忽視一重要點，即是這些要求，是基於人民主權，所以，只在德謨克拉西共和國才能實現。

法國工人在路易·菲利浦及拿破侖第三專制政治之下，要求德謨克拉西共和國，結果如何，我們是看見的。所以，要求時應十分留心。有許多東西，在德謨克拉西共和國中才能求得到，那嗎，最好不要對一軍閥專政的國家，虛偽的提出這些要求。警察所護衛的，官僚所組合的，雖還剩有封建殘餘，但已為資產階級勢力所轉移，議會制度所掩

飾的軍閥專政的國家。

有些人視德謨克拉西共和國爲人類的黃金時代，而從沒有認識階級鬥爭只在這最後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形態中，才作決定的鬥爭。就是這陳腐的德謨克拉西，比那跳不出警察統治的圈子，在理論上也爲不可能的德謨克拉西高出萬萬了。

綱領中又說甚麼“德國勞動黨要求以單一累進所得稅，爲國家的經濟基礎，”可知起草綱領的人，說“國家”時，實是指的政府機關或“因分工而與社會分離所成的特殊機體”的國家了。租稅只爲政府機關的基礎，而不能爲國家的經濟基礎。且所謂將來的國家，如現在的瑞士，此種要求，已大部分實行。但所得稅是先假定收入的泉源，爲社會各階級所私有，即先假定那社會是資本家社會。所以，無惑乎利物浦財政改良會 (Financial Reformers of Liverpool) 格蘭士頓 (W. E. Gladstone) 的兄弟 Roderston Gladstone 所領導的資產階級國體，其所提出的要求，竟與德國勞動黨的綱領無二

致。

B. “德國勞動黨，提出下列的要求，為國家之精神的，及道德的基礎。”(註十四)

(1) “國家設備一般平等的國民教育，一般的義務教育，免費教育。”

平等的國民教育？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在現代社會，一切的階級教育，我們相信其能平等嗎？抑或這個要求，是強制上層階級只能得小學程度的普通教育，只能得適合於農民和工錢勞動者的經濟能力之農民工人的教育？

“一般的義務教育，免費教育。”義務教育在德國早已實行，免費教育在瑞士同美國的初等教育，也已存在。假使美國有幾省的中高等教育，也是免費，但究竟是上層階級的利益，不過其教育費出諸公衆而已。在A之第(5)項所要求的“免費審判”，也不過是一回事。刑事的審判，不論何處都是免費的；民事的審判則殆全為財產訴訟，所以只是資產階級的事。此類要求，是否要資產階級的訴訟費，也

來由公衆担任？

關於教育這一段，至少也應要求專門學校(理論的及實際的)與初等學校，同樣免費。

我們應斷然拒絕“國家設備國民教育”。規定國民小學用費，規定教員資格，編制課程，派視學員查看學校是否遵守國家教令——執行這種職權，與以國家爲人民之教育者，是完全不同！政府與教會都應與教育分離。且德意志這國家，反有受人民的教育之必要呢。

網領全部，除了說些德謨克拉西之高叫外，復深受“納薩爾派對於國家的信仰”之毒，再壞的是復與德謨克拉西的荒唐信仰，合而爲一。這兩種荒唐信仰，都與真實的社會主義距離八萬九千里。

“科學的自由”，這是普魯士憲法條文之一，我們在這裏還用得着甚麼攻擊呢！

“良心的自由”！假如現在是反抗天主教會的權力的時候，就好把自由黨的舊口號重新提出來，要這樣說才有力，宗教的事，應隨各人所“欲”而

行，警察不應干涉。勞動黨應利用這個時機發表牠的意見，謂資產階級之“良心的自由”，不過是容許多種良心的宗教的自由，而勞動黨的目的卻在於使人類的思想，從一切宗教幽靈解放出來。可是這起草綱領的人，卻沒有越出“資產階級”的水平線。

我的批評，現將完畢，因其餘諸點，皆非重要者，略附論之如次。

(2) “標準勞動時間。”

除了德國的勞動黨之外，沒有一國的要求是這樣的空洞。別國的勞動黨，都提出一定的勞動時間的長度，為牠所視為在現代情形之下的標準時間。

(3) “限制婦女勞動，禁止兒童勞動。”

規定標準的勞動時間，就包括限制婦女勞動的工作時間。若“限制婦女勞動”的意思不止此，而要解釋作禁止婦女從事於妨礙婦女健康，危害婦女道德的工業，若起草綱領的人，是有這意思，就

應該明白說出來。

“禁止兒童勞動”！要指出年齡的限制，這是絕對必要的。

全然禁止兒童勞動，這為大工業所不許，所以這不過是一個憑空的希望。

就令能實行，全然禁止兒童勞動，也是反動的。蓋各種年齡的工人之工作時間，若經嚴密規定，再採用保護兒童勞動的適當方法，使工人少年時即從事生產工作，輔之以教育；此為變革現代社會最有力的手段。

(4)“國家監督工廠，工場，及家庭工業。”

我們對於德國的國家，應明確的要求：監督者之罷免須依法律的規定；監督若失職，工人有權告發；監督者應具有醫生的資格。

(5)“規定監獄勞動。”

在一般的勞動綱領中，這是瑣細的要求。不論如何，勞動黨應明白地說：勞動黨不欲見普通的犯人，被人當牲畜待遇，尤不欲見改善犯罪者之唯一

手段的生產工具，被人奪去。此為我們能從社會主義者期望得的最小限度。

(6) “有效的雇主責任法。”

“有效的”雇主責任法是甚麼，應再說明確些。

起草綱領的人，當論及標準勞動時間的問題時，把工廠法之關於工廠衛生，傷害保護等部分，都忽略過去，但雇主責任法，僅在雇主違犯了上述那些規定的時候，方才適用。……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n (予言已畢，保護了我的良心)。

(註一)哥達聯合會議 (Gotha Unification Congress) 開於哥達，時期是1875年五月22至27。目的在合併納薩爾派與社會民主黨，使德國工人聯合起來，組成一抵抗政府壓迫之更有力的戰線。

(註二)哈勒會議 (Halle Congress) 是1891年召集的，其任務在修改勞動黨的綱領。同年十月，又開歐福特會議 (Erfurt Congress)。

(註三)德國勞動階級團體聯盟 (League of German Work-

ing Class Association)於1869年在愛孫納(Eisenach)開會,改組為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馬克思派分子最占優勢,故綱領具最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

(註四)要須要妥協,以便與納薩爾派諒解,致大會不能採用一純粹馬克思主義的綱領。

(註五)哥達會議所採用的原文為:“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明之源,且只依社會,人才能做一般有用的工作。所以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屬於社會,即社會全體。人人有滿足其正當需求的平等權利,人人也一律有勞動之義務。”

(註六)此條哥達會議所採用的,即草案原文。

(註七)哥達會議所採用的原文為:“謀勞動者之解放,最要為:收勞動機關為社會共有財產,勞同管理全社會的勞動,為共同利益使用,或公正分配勞動生產品。”

(註八)哥達會議修改這一條為:“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雖先在國家範圍內活動,而很知道勞動運動之階級性質,決定工人所負的一切義務,以促人類親愛之實現。”

(註九)哥達會議所採用的是:“依據這些原理,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以一切合法手段,努力創造一自由的國家,創造一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努力廢除工錢勞動制以毀滅工錢鐵則,以及廢除多種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

(註十)朗格著有“唯物論史”(The History of Materia-

lism)。

(註十一) 哥達會議曾把爲首一句改爲“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

(註十二)“工場”爲非利蒲代末年在巴黎出版自稱爲“完全由工人編輯的勞動階級的特殊言論機關”的刊物，擁護步社的主張。

(註十三)此處A項，馬克思先批評“國家的自由的基礎”然，後其次B項，批評“國家的精神的，道德的基礎，”分析極爲顯豁。

(註十四) B項，即爲對“國家的精神的道德的基礎”之批評。

二

工錢勞動與資本

- 一，恩格斯原序
- 二，甚麼是工錢？並且如何決定的？
- 三，商品價格如何決定的？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 恩格斯原序

本篇乃馬克思於一八四九年四月四日起連載於“新萊茵新聞”之論文，係根據他一八四七年在不律塞德國工人俱樂部之講演稿而成，這些文章當初還不過是一些斷片。在新聞第二百六十九期注明“待續”，也因為當時急轉直下的事件，結果沒有續下去。當時有俄國侵入匈牙利事件，有巴拉丁的緞士登，愛司倫，愛柏爾菲德及巴登事件，新聞自身也因之於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被壓迫禁止。在馬克思的遺稿中也沒有發見關於此問題之續稿手

蹟。

“工錢勞動與資本”已以單行本小冊子發行數版，最近版爲一八八四年瑞士之西里克本。從來各版，均爲原論文之翻印。但是用作宣傳之新版本，在萬冊以上，於是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否馬克思於此情形之下，也同意於僅翻印原書而止。

事實上在四十年代時，馬克思尙未完成其政治經濟批評之研究。於五十年代末，始成就該書。所以在“政治經濟批評”第一部（一八五九年）印行前之一切著作，有些地方是與一八五九年後發表的著作相異的，包含的表詞及全部句子，從後來的著作的觀點看來，有些是很含糊的或完全錯誤的。

現在也不需乎多說了，爲了解著者的精神發展之最後階段的邏輯基石之過去見地，爲一般閱讀大眾的普通本，還有牠正當的位置，在這種地方，著者同讀者都有牠不需爭辯的權利，要求不改正的翻印本，因爲這種要求，我就沒有想去甚至於修改原本一個字。

但是專門作為對勞動者宣傳之用的新版，這種情形就立異了。在這種情形，馬克思也要無條件的以他一八四九年後更成熟的思想修正以前的意見。為要達到上述目的，所以我決意以馬克思的精神，對於本版，在主要的幾點上，加以些微的改正及編輯。所以我首先要向讀者申明：這是一本小冊子，不是馬克思一八四九年寫的，但是是一本差不多是馬克思在一八九一年所要寫的。此外，原本還有許多舊版存在，我將於編馬克思全集時不加改動的將其編入刊行。

我所變更的全部不出一點。原本寫為勞動者出賣其“勞動”於資本家以獲取工錢時，新本改為勞動者所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關於這一改正，我將加一點說明：第一，對於勞動者，他們可以了解我們關於這點并非拘泥字義，這實是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要問題；其次，對於資產階級，他們可以信服無教育的勞動者是怎樣遠勝于社會上自負的“受過教育的階級”；勞動階級對於經濟學切近艱

深的理論倒能容易的了解，而受過教育的階級就盡其一生也不能鑽進這問題。

古典派經濟學只從產業的實踐上接受了工場主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及因勞動者的勞動付出工錢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只足供簿記的，價格計算的商業目的。但是素樸的轉入政治經濟學時，牠就惹起各種可驚的謬誤與混亂。

商品價格——所謂勞動的價格當然包括在內——因為各種情勢，時常變動漲落，這些情勢普通與商品生產自身沒有甚麼關係，所以，一般看來，價格好像僅是由偶然決定的，經濟學常常遇見這種事實。但是在經濟學取得科學性質的時候，牠的第一任務就在探求那藏在偶然性背後的法則，在外觀上好像是偶然性支配商品的價格，其實是這個法則支配偶然性。在商品價格的動搖或上落的運動中，新科學開始探求動搖所圍繞着發生的確定的中心點。一言以蔽之，從商品的“價格”出發，經濟學開始探求價格的支配法則——這就名爲商品

的“價值”，價格的動搖可由牠來說明，價格動搖的結果，可以得到着落。

古典派經濟學發現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於商品中的勞動即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他們以這個說明為滿足，就是我們也因為與我們的目的接近，與以承認。（可是為防止誤解起見，讀者必須注意，這個說明現在已完全不充足了。）以徹底的態度，分析勞動創造新價值的特殊性質，馬克思是第一人，他又發現商品生產似乎或者實際需要的勞動，不完全真在一切情況之下，都加上一分量相應於勞動消耗分量的價值。假如我們追隨李嘉圖一般經濟學家的意見，商品價值是由商品生產的必需勞動來決定，我們時常要想到馬克思的保留意見。要充分的達到說明的目的：則此中詳細就要求之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評”或“資本論”第一卷。

經濟學家適用勞動決定價值的新觀念到商品“勞動”自身，他們立刻從此一矛盾陷到另一矛盾。

勞動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呢？答：由體現於其中的必需的勞動。但是勞動者的勞動在一日，一週，一月，一年的時期中有幾多的勞動呢？自然是有一日的，一週的，一月的，一年的勞動。因為，假如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則我們只有以勞動的條件表示“勞動的價值”。不消說我們絕對不知道一小時勞動的價值，假如我們只知道牠是等於一小時勞動的價值。我們對於問題的解決沒有接近一毫髮，我們只在一處無聊地繞圈子。

古典派經濟學就不得不另想解決這問題的方法。他們就主張商品的價值等於商品的生產成本。那嗎現在我們要問甚麼是勞動的生產成本呢？如要回答這個問題，經濟學家不得不引長一點邏輯。他們不去探求“勞動”自身的生產成本（在事實上，這也是決不能發見的），他們只去研究“勞動者”的生產成本，這是一定能發見的。這種成本因時間與空間的差別而分歧，但是一定的社會條件，一定的地方，一定的生產部門，這種成本就也是一定的，

至少在狹小的限界之內是如此。我們現在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統治之下，佔人口大部分而且日益增加的階級只有替生產手段（工具，機械，原料，生活資料）的所有人勞動，而獲取工錢，才能生活。照這樣的生產方式，則勞動者的生產成本就是生活資料的總額，（或者以貨幣來表示，就是生活資料的價格）牠一般必要的是要足以維持勞動者勝任勞動，與在勞動者年老，病廢，死亡時使有新勞動者來補充——即是勞動階級以必要程度所需的生殖用費額。

爲辯論便利起見，假定生活資料的平均貨幣價格爲一日三馬克。勞動者遂於資本家雇主處每日收取三馬克。資本家即以此使勞動者勞動，假定爲每日十二小時，資本家遂開始他的計算：

假定一勞動者（譬如機械師）製造一架機械，於一日中完工。原料（必要預備形態的銅鐵之類）費銀二十馬克。蒸汽機之燃料消費，蒸汽機，輪盤及其他工具經勞動者使用後之損傷，以每日分

別計算假定爲一馬克。勞動者每日所收之工錢爲三馬克。這一架機械的成本，於是總爲二十四馬克。可是資本家計算他從僱客收得的平均價格是二十七馬克，——即是超過他投下的成本三馬克。

資本家所懷的這三馬克是從何處來的呢？照古典派經濟學說來，商品是按着牠的平均價值賣出去，即是商品按着相當於牠所含的必要勞動量的價格賣出去。則這件機械的平均價格（二十七馬克）就等於牠的價值，或者說等於牠所含的勞動量。但是二十七馬克中有二十一馬克是在機械師來勞動之前就已經存在着的價值，二十馬克是原料，一馬克是勞動時間內費去的燃料及生產過程中使用機械與工具，以致失掉一均勻部分的作業能力而減少了的價值。其餘的六馬克是附加到原料價值上的。可是照我們的經濟學家的假定，這六馬克是完全增加到勞動者所施於原料上的勞動。勞動者十二小時的勞動曾經創造了六馬克的新價值。勞動者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似乎就等於六馬

克。“甚麼是勞動的價值”的問題也就這樣似乎解決了。

“且慢！”我們的機械師要叫起來。“六馬克？怎麼的！我只收到三馬克呢。我的雇主固執的說我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僅值三馬克，而把我六馬克的要求一笑置之。那嗎，你這是怎麼計算的？”

在想去規定勞動價值的時候，因為以前我們踏入了一條躲閃的圓形路，現在所以我們就完全陷於不可解決的矛盾。我們已經探求勞動的價值，而發現許多我們所不取的結果。在勞動者，十二小時勞動的價值是三馬克，在資本家，就是六馬克，他只以三馬克以工錢的形式付給勞動者，而把其餘的三馬克收入自己的腰包。則現在看來勞動不是一個價值，而是兩個價值，而且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價值！

我們把以貨幣表現的價值約為勞動時間的時候，這個矛盾就變得更複雜。十二小時勞動的時間創造出六馬克的新價值，則六小時創造出三馬克，

但勞動者所付出的真實分量是十二小時的勞動。換言之，就是勞動者以十二小時的勞動收到等於六小時的生產。那嗎我們所得的結果就是一種循環的結論，或是勞動就有了兩種價值，或是這一價值倍於其他價值，或是十二等於六。兩者之任一個，結果都是全無意義的。

我們就竭盡全力，也不能從這個矛盾中跳出來，假如我們還是用“買賣勞動”，“勞動價值”這些語詞。這恰是經濟學家的命運。古典派經濟學的最後的分派，即李嘉圖派，其覆滅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解決這個矛盾。古典派經濟學無望的走入死路。而在死路上發見出路的是卡爾·馬克思。

一般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勞動”生產成本，不是勞動的成本，只是生活着的勞動者的費用。他們所想的勞動者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勞動者的勞動。馬克思說：“到勞動現實地開始的時候，這勞動就不屬於勞動者，所以他更不能出賣這勞動。”至多，他亦只能出賣他未來的勞動，即是他可以接

收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勞動業務的契約。這樣他並沒有出賣他的勞動(只是答應去完成這回事)，他只因為一定的付給，把他的勞動力的支配，以一定的時間(在行時間制的時候)，或以一定的勞動業務(在行包工制的時候)，讓渡給資本家；他租賃，或出賣他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是與勞動者的人格相融合的，而不能相分離的；所以勞動力的生產成本應當與勞動者個人的用費一致；經濟學家所稱為勞動的生產成本的，就是勞動者的生產成本，同時也就是勞動者的勞動力的生產成本。於是我們就可以由勞動的生產成本回到勞動力的價值，並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勞動力之買賣”章中所說的，能夠決定那為生產一定品質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總量。

勞動者既已把他的勞動力交給了資本家，即是說，為獲得以時間計或以件數計的雙方先已同意的工錢，而把他的勞動力的支配權移交給資本家了的時候，將要發生怎樣的事情呢？資本家就把

勞動者攜至作坊或工場，生產所需要的東西，如原料，助成材料（煤，染料等），工具，機械，都是預備好了的。於是勞動者開始勞動。假定每日的工錢，如前所擬的，爲三馬克，自然不問其付出的方式爲時間抑制包工制。我們再假定十二小時內勞動者以其勞動加在所消費的原料上——這就是六馬克的增加價值，這種增加價值，在資本家出賣這完成生產產品的時候，就實現出來。資本家於此六馬克中以三馬克支付勞動者，自己收進三馬克。現在，假如勞動者是於十二小時中生產六馬克的價值，自然就是六小時中生產三馬克的價值。結果，勞動者爲資本家做了六小時的工作之後，就償回了資本家所支付的相等於他的工錢的三馬克。六小時勞動之後，雙方賬目結算一下，你不差我一分，我也不欠你一文。

“對不起！”現在資本家卻要叫了。“我僱傭勞動者是僱傭一整天，十二小時。現在六小時只有半天。你還要繼續勞動六小時，這我們才是公平交

易。”事實上，勞動者必須仰賴這種“自由意志”結締的契約而生活，所以他必須履行費六小時勞動就可交換勞動生產物的全十二小時勞動的義務。

在包工制的情形，也是同樣的。假定勞動者於十二小時內生產某商品十二件。原料及機械之耗損共費兩馬克，一件商品賣價為兩馬克半。與上面同樣的情形，資本家每件只付給勞動者四分之一馬克，十二件，則共付給三馬克，勞動者之勞動時間為十二小時。資本家以十二件商品共得三十馬克；原料及機械消耗為二十四馬克；其餘六馬克，則以三馬克作工錢；另三馬克入於資本家的腰包。結果是與上面一樣的。前後兩次的情形，都是勞動者為自己勞動六小時（即是作為工錢代價），為資本家勞動六小時。

雖以最好的經濟學家，而以“勞動”的價值為他們的出發理由時，所感受的困難，在我們代以“勞動力”的價值為出發點時，則立刻消滅。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是一件商品，

——與其他的商品一樣，但依然是一種特殊商品。就因為牠有特殊的性質，牠是產生價值的一種力量，牠是價值的源泉，尤其是一種比包含在牠自身中的價值更大的價值的源泉。

事實上，現代的生產效率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人類勞動力在一日中所生產的價值，還大於牠所有的價值及所消耗的價值；而且又因為科學的發現，與新技術的發明，一日生產物超過一日勞動費用的剩餘，已次第增大；換言之，就是勞動者僅僅再生產等於其每日工銀之勞動日的那一部分，日益縮減；而勞動者以他的勞動，作成自由贈品，送給資本家，全不收得工錢的那一部分勞動日却延長了。

這是我們近代全社會的經濟制度；只有無產階級單獨的生產一切價值。因為價值不過是勞動的另一表現，體現於一定商品的社會必需勞動量就由這個表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示出來。但是由勞動者所生產的價值，并不形成勞動者的

財產。他們倒是使人能夠購買勞動階級的勞動力的原料，機械，生活資料之所有人的財產。在勞動階級創造的全體生產物的數量中，勞動階級只收回很小的一部分。

如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這別一部分，資本家階級所自己收用的，更糟的，還有必須分與地主階級的，每有一次的新發明，新發見，這一部分就更加增大；而入於勞動階級（以頭數計算）的一部分呢，就或者也增加一點，但是很慢的，很少的，或者簡直不增加，說不定有時候還要低落。

但是不斷的加緊衝來的發明與發現，前所未有的日益發展的人類勞動的生產力，終究必要發生一種衝突，我們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一定要因這衝突而沒落。一方面，有無從核算的財富與對購買者全無用處的過剩生產物。一方面有社會上的廣大羣衆，無產化而淪為工錢勞動者，以致不能獲得那些過剩生產物。社會就分成極少而極富的階級與無數赤貧的工錢勞動者階級，使這個社會

由牠自身的過剩上，窒息起來，於是大部分的社會成員，都很難於，或者簡直不能夠，戰勝貧乏，得到救護。

這樣的狀態，一天一天的矛盾，一天一天的無用。這個狀態，必需廢除，而且一定能夠廢除，成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現在的階級差別都要消滅，還要經過一個短期的，不一定很滿意的，但是實際上却是很有用的過渡時間——對於一切社會成員的那時所存在的龐大生產力，都加以有計劃的利用及更進的改善，同時以平等勞動的義務，而且同種程度的，經常增加的給與生活的享樂的資料，以開展及運用其一切肉體的智力的能力。這樣一個新社會是可能的。勞動者漸次的決心要使這個社會制度卒底於成，——大洋兩岸五月一日的曙光，就是這個社會的憑證。

一八九一年四月三十日費德里克·恩格斯序於倫敦。

二，甚麼是工錢？並且是如何決定的？

倘若我們詢問勞動者，“你們得好多工錢？”則有人要說，“我從雇主處得兩先令一天；”又有人要說，“我得半個克郎，”諸如此類。按照他們所從事的不同的職業，他們向各個的僱主手裏，領到不同的數目，無論做的是時間制，包工制，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可不顧其答語如何，大家都要承認一點，就是無論時間制，包工制，他們從雇主手裏得到的工錢，總是一筆貨幣。

這樣看來，好像雇主是以貨幣來購買他們的勞動。他們為貨幣，才售賣勞動給他。但這只是一種表面。實際上他們為貨幣而賣給雇主的，是他們的“勞動力”。雇主買勞動力，是買一天，一週，一月，等。他買了勞動力之後，就要勞動者在約束時間內去勞動，去使用此勞動力。雇主以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力的這筆款項，假定是兩先令，去買四磅糖或者相等值的其他用品。買四磅糖的這兩先令，就

是這四磅糖的價格。買十二小時勞動力的這兩先令，就是那十二小時勞動的價格。因此，勞動力就與糖一樣，不多不少，都是商品，不過前者用鐘來量，後者用秤來量罷了。

勞動者是把他們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來交換雇主的商品，即貨幣；這種交換是按照一定比例的——有幾多貨幣，交換幾久勞動力的使用，兩先令就交換得十二小時的紡績勞動。這兩先令豈不就是代表我用兩先令能夠買到的其他商品麼？實際上是如此，勞動者以自己的商品，勞動力，交換任何其他商品，而且是在一定的比例中交換的。雇主給他兩先令，是給了他兩先令的飯食，衣服，燃料等，來交換他的一日勞動。這兩先令因此是表示勞動力交換其他商品，即勞動力之“交換價值”的比例。任何商品的交換價值，用貨幣表示出來，就是價格。“工錢”，因此不過是勞動力的價格，即一種別處全無而惟人類血肉中有之的特種商品的價格之另一名稱。

任何勞動者的情形，均是如此，茲以紡織工人爲例。雇主供給勞動者以綿紗與織機。紡織工人即從事勞動，把綿紗織成布匹。雇主當即佔有此布匹，假定以二十先令賣出。紡織工人有沒有從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布匹中，即二十先令中獲得一部分作爲他的工錢呢？完全沒有。紡織工人在生產品出賣之前早就得了他的工錢。因此雇主并不是要以出售布匹的款項來付工錢，而是預先籌好了的。

綿紗與織機并不是紡織工人的生產品，因爲那是雇主供給的，也不是勞動者以其商品，即他的勞動去交換得來的商品。雇主也許把他的布匹賣不出去，也許就是賣出去了，還不足抵償他付出去的工錢，但也許同他付出去的工錢比較一下，他做了一次好生意。可是這些都與紡織工人，沒有關係。雇主把他致用的財產——他的資本的一部分，來購買紡織工人的勞動，這同他把財產的別一部分來購買原料（綿紗）與勞動工具（織機），是一樣的。有了原料，有了工具，并且計算到生產布匹所

必需的勞動之購買，他就以他所有的原料與工具，進行生產。這下自然就計及紡織工人了，但在生產物中，或說爲在生產物的價格中，他不過同織機自身一樣，是沒有“份”的。

工錢，因此不是勞動者所生產的商品之勞動者的應得部分，工錢是以前所生產的商品部分，而雇主現在用這一部分來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力的。

勞動力，因此，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工錢勞動者賣給資本的一種商品。他爲甚麼要賣呢？因爲要生活。

勞動力的消費，勞動，是勞動者的生命力的特殊表現。他賣這種能力與別人，是爲要爲他自己獲得維持生活的手段。因此，他的生命力，對於他，不過是保證他的存在的手段。他爲生活而勞動。勞動並不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寧肯說是他的生命的一種犧牲。那不過是賣給他人的一種商品。他的活動所生產的生產物，也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他

爲自己所生產的，並不是他紡織的綢緞，他建築的宮室，他陶冶的金銀。他所爲他自己生產的是他的“工錢”；綢緞，宮室，金銀，轉換成他的是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一件棉布襯衣，幾張零碎票幣，角樓上一席臥地，如是而已。勞動者怎麼的，十二小時的織造，紡績，鑿坑，迴轉輓轆，建築，抄剷，碎石，搬運等，到底幹的甚麼？難道這十二小時的織造，紡績，鑿坑，迴轉輓轆，建築，抄剷，碎石，搬運是他的生命的積極的表現嗎？恰恰相反。在他的活動停止，而從事於飲食，休息，睡眠的時間，這才是他的生命的開始。十二小時的勞動，如織造，紡績，鑿坑等，於他是全無意味的，僅不過可以取得一日三餐飯，公共處所一席地，一榻橫身處的報酬。倘若蠶子吐絲的目的，如尺蠖一樣，僅在延長牠的生命，則這剛好是一個工錢勞動者的化身。

勞動力不是常常是商品。勞動不是常常是工錢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並不是出賣他的勞動與奴隸所有人，而是連同其勞動力一次永遠的售與

他的主人。他是一種可以從這個所有人手中轉到那個所有人手中的商品。他“本身”是一種商品，他的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僅僅賣了他的勞動力的一部分。他並沒有從地主處受取工錢，還不如說是地主從他收穫了貢稅。農奴屬於土地，也屬於他繳納收穫的地主。他方面，“自由勞動者”是把自己零碎的出售。他今天明天的，把他的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的生命，拍賣給出高價的人——原料，生產工具，生活資料的所有人；即僱主。勞動者自身既不屬於任何所有人，也不屬於任何土地；但是他的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十五小時的日常生命，是屬於購買這些時間的人的。勞動者對於雇用他的僱主，只要願意，隨時可以脫離；僱主以為適當——或者是僱主不能從勞動者取得利潤，或者是勞動者不能滿足僱主所要求的高利潤，——也隨時可以解雇。但是勞動者的所得的唯一源泉是只有出賣其勞動力，他離開了“勞動力的購買者的整個階級”，即“資家階

級”，就要喪失其生存。他不屬於這個或那個特定的雇主，但是他却屬於資本家階級；而且，他必須覓定一個雇主；即是在資本家階級中，必須覓定購買自己的特定購買人。

在講到資本與工錢勞動的關係之前，對於決定工錢的一般關係，不妨先簡括的作一說明。

我們已經知道，工錢是一種特定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所以工錢也是由決定其他商品價格的同樣法則所決定的。

那嗎問題就是：

三， 商品的價格如何決定的？

商品價格的決定是在購者與售者間的競爭與供求的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分為三類。

在市場上，同樣的商品有許多售者供給。誰人的商品能夠使購者得到大利，則他必然把其他售者驅逐出市場之外，而自得最大的售出。因此售者就在出賣上與市場上大起競爭。每人都希望出售，

都盡力的希望出售得多，而且只要可能，都希望成爲唯一的出售者。因此大家都想以賤價排斥他人，售者間就生出一種競爭，這種競爭就要低減他們所投賣的商品的價格。

但是購者方面，也起競爭，這種競爭在購者方面就要提高市場中的商品價格。

最後，購者與售者間亦起競爭，一方想買最廉的貨物，一方想賣最貴的價錢。購者與售者間競爭的結果如何，視乎競爭之前兩者的形勢的關係，即是視乎購者方面的內部競爭與售者方面的內部競爭，孰爲較強而定。產業就有了在戰場上對峙的兩軍，而每軍自身的士卒又在自己陣營中，互相作戰。其部伍始終混亂的之一軍，則必然爲敵軍所敗。

假定市場上有一百捆棉花，同時購者是需要一千捆。這是求大於供的情形。購者間的競爭，因此將非常激烈；每一購者都竭力想買進百捆全部。本例并不是隨意的假定。在商業史上，我們已經經

驗過棉花歉收的時代，那時資本家的特殊公司，豈止要買一百捆棉花，簡直要買盡全世界的棉花。因此，這種情形之下，每個購者都願意出相當高價，把其他購者，逐出市場。售棉花者，看見彼此激劇的鬥爭的敵方隊伍，又確證百捆棉花之必能售出，就時刻當心，不自相搗亂，使棉價減低，同時敵方卻在逐漸把物價提高的過程中，互相競爭。於是，售者的軍隊中忽然宣告和平。他們對購者結成聯合戰線，泰然自若；倘若不是購者所能付出的款項與其熱心，尚有定限，則售者的欲望，殆無涯際。

於是，如果商品之供給，小於對商品之要求，則購者間起尖銳的競爭，而售者間全無競爭，或很少的競爭。結果，商品的價格有多少程度的騰貴。

定律似的，相反的情形也常常發生，就產生相反的結果。供過於求，則售者間起競爭；購者缺少，商品不得不減價求售。

但是價格的騰貴與下落是甚麼意義呢？高價格與低價格又是甚麼意義呢？一粒沙，用顯微鏡看來，是很高的；一座塔，從山上望去，就比較低了。倘若物價是為供求關係所決定，則供求關係的自身，又是如何決定的呢？

我們且回到起先遇見的那位實業家去。他一點也不躊躇，有如亞力山大二世以他九九相乘表來割斷形而上學的疑難一樣。他將告訴我們：“倘若我賣出去的商品的生產成本是一百鎊，而賣掉過後，我收得的是一百十鎊——言在一年度內——這就是我所謂普通的，正直的，公道的利潤。假如我賣得一百二十鎊，一百三十鎊，這就是高利潤了；假如我賣得二百鎊，則這就是異常的例外的利潤了。”那嗎我們的實業家用是的甚麼利潤“尺度”去計算的呢？他是用他的商品的“生產成本”去計算的。假如他把他的商品去交換得一分量生產成本較低的商品，這個交易就使他蒙損失了。假如收回得一分量生產成本較高的商品，則他就得了贏

餘。他計算他的利潤的高低，是以他的生產成本作為零度而依收支相償究竟在零度上下而定。

我們已經知道供求之間的變動比例怎樣地發生物價的漲落，時而高，時而低。假若因供給不足，或者要求異常的激增，某種商品價格顯著的騰貴起來，則其他商品的價格，必然跌落；因為，自然，某種商品的價格只是用貨幣來表示其他商品所能與之交換的比例。譬如一碼綢的價格由五先令漲到六先令，則銀價與綢價比較起來，銀價就低落了；同時別種商品就令還保留原價，但與綢比較時，牠們也是低落了。就是我們這下要把較多量的商品，才能交換得原量的綢。並且，一種商品價格的騰貴，會發生甚麼結果呢？多量的資本就流入這門特別繁榮的商業，一直要到利潤水平重來之時，或者，因為過量生產而引致綢生產品的價格低於生產成本之時，那資本趨向繁榮商業領域的移殖，才會停止。

相反的情形，倘若物價低於生產成本時，則資

本就從這門商品的生產中，脫離出來。除非這產業部門是過時了，而無人再過問了的，則資本必然繼續退去，直至這門商品的生產及其供給，縮減到與要求相應為止；這樣物價再漲到生產成本的水平；或者重新供少於求；即是物價重新高於生產成本；因為任何商品的市價，總是高於生產成本或低於生產成本的。

我們看見，資本是如何的常常從這產業領域移離出來，增殖到那產業領域，又從那產業領域移離出來，增殖到這產業領域。高價引致激劇的增殖，低價就引致激劇的移離。

我們還可以從別一觀點上，證明不僅供給受生產成本的決定，就是需求也受生產成本的決定，但是這與我們目前所討論的，無甚關係，且暫置不論。

我們已經看見供給與需求的變動怎樣地常常又使一種商品的價格復還到牠的生產成本。一種商品的正確價格常是或在牠的生產成本以上，或

在牠的生產成本以下，這也是真的；但是這種漲落又使彼此相互平衡了，所以在一定時期中，把商業狀況的漲落作一總結算，各種商品是照着牠們的生產成本相交換的，因此說牠們的生產成本決定牠們的價格。

“生產成本決定價格”不是照着一般經濟學家所說的意義去了解的，一般經濟學家說，各種商品的“平均價格”是等於生產成本；照他們看來，這是一條“定律”。高漲為低落所抵消，低落為高漲所抵補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他們把牠歸之於偶然。就以這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像一些其他的經濟學家一樣，把變動看作是定律，而把“生產成本規定價格”歸之於偶然，也未始不可。但是假如我們精密地觀察一下，就看見，正是這些變動——雖然牠們在其後面常常帶來一些最可怕的破壞，而且地震似地搖撼資產階級社會的，——正是這些變動，牠們在其行程中，以生產成本來決定價格。即在這種無秩序的運動的總和中去找牠的秩

序。在這種產業的無政府狀態的行程中，所有這些交替的運動，都好像是以競爭來把這一“過度額”(excess)去抵消那一過度額。

所以，我們可以推知，由某種商品的生產成本所決定的某種商品的生產價格，又由牠降落到這種成本以下的那個時期，或昇漲到這種成本以上的那個時期所抵補或抵消。自然，這不是適用於某一產業的一種單獨的特殊商品，而是僅僅適用於產業的全體部門。也不是適用於某一特殊製造業者，而是僅僅適用於全產業階級。

物價由生產成本來決定，猶之乎物價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是一樣的。因為生產成本可以分為兩種：第一，原料與工具，就是這些工業生產品在生產上曾經消耗一定量的勞動時間，所以就代表一定量的勞動時間；第二，實際勞動，這是由時間長度來計算的。

同樣的一般的規律，牠既然普遍的規定商品的價格，牠自然就規定工錢，即勞動的價格。

工錢的漲落，視乎供求之間的比例——即是視乎勞動力的購者（資本家）與勞動力的售者（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狀況而定。工錢的變動，一般是與商品價格的變動相適應的。在這變動中勞動價格是由牠的生產成本所決定，即為生產這種商品，即勞動力所必需之勞動時間所決定。

現在，甚麼是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呢？

就是生產一個勞動者與維持其為勞動者所必需的費用。

為訓練一種勞動所必需的時間愈短，勞動者的生產成本愈少，他的工錢，即他的勞動的價格也愈低。在有些產業部門中，不必需要甚麼學習的時期，而且勞動者的生活只要能維持其生存就夠了，則他的生產成本和維持成本，差不多也只限於為維持其生存的和適合其工作的種種商品的必需的費用。所以，他的勞動價格即是為維持其生存的起碼的必需品的價格所決定。

可是，這別有考慮的餘地。製造業者除計算其

生產成本并照此成本而決定生產品價格以外，他還加算機械的損耗。假如機械成本為二百鎊，而此機械於十年中用盡，則彼每年於物價上，加算二十鎊，以便於十年後此機械成為廢物時，另裝新機械。同樣，我們計算單純勞動力的生產成本時，就要計算勞動者的生殖費；這樣，勞動者種屬才能繁殖，才能以新勞動者替換那使用壞了的勞動者。所以要加算勞動者的損耗有如加算機械的損耗一樣。

簡單勞動力的生產成本，總計等於勞動者的生存與其生殖的成本，這種成本的價格決定他的工錢。我們言工錢時，我們意指最低的工錢而言。工錢的最低限數，與一般的商品價格由生產成本來決定相同，那不是指“特定的個人”，祇是指這一“種屬”（勞動階級全體）。個別的勞動者，有數百萬，沒有收足使他可以生存與生殖的工錢；但是勞動階級的工錢，以其全部變動，恰與其最低限數相符合。

現在我們根據像決定其他物價一般，來決定工錢的一般定律，我們可以更確切的考察我們的問題。

“資本包括原料，勞動工具，及用以生產新工具，與新生活資料的一切生活資料。資本的這一切要素都是由勞動創造的，是勞動的生產物，是蓄積的勞動。用為新生產手段的蓄積勞動就是資本。”

經濟學家如是說。

何為黑奴？黑色人種的人類生物，經濟學家的說明與這一說明，無異半斤八兩。

一個黑人是一個黑人。在一定條件之下，他才成爲一個奴隸。紡績機是一部紡棉花的機器。要在一定條件之下，牠才成爲資本。分離這些條件，則不成其爲資本，猶如金子不是貨幣，糖也不成爲糖的價格。在生產中，人類不只同自然發生關係，彼此也發生關係。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法，共同勞動，而且互相發生一定的關係與條件，他們才能生產。並且只有在這一定的關係與條件之下，才能確

定他們對於自然的關係，生產也才有可能。

生產者互相走入的這些社會關係，以及他們所據以交換其能力與參預生產的集體行動的條件，自然按照生產方法的性質而起差別。因為發明火器為作戰的武器，軍隊的內部組織就必然全部變動；又因為組織軍隊的與能集合起來成為軍隊的各個人的關係的變動，軍隊互相的關係，也同時起一種變動。

由於物質的生產方法，即生產力的變動與發展，私人生產其中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的生產關係，也隨着變化。這個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我們所稱為社會的社會關係，這即是一個有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有相當的明顯性質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些生產關係總和的例證，並且每個社會在人類的歷史發展上，皆標示一重要的階段。

現在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牠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條件。資

本所包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原料，不是一定的社會關係的結果嗎？牠們不是在某種社會條件之下所生產與蓄積的嗎？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某種社會條件下，牠們豈不是將被用來作新生產嗎？豈不是恰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牠把用為新生產的生產品轉化為資本嗎？

資本不只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原料，也不只物質生產品；牠還包括了那樣多的交換價值。因為牠所包括的一切生產品，都是商品。因此資本不僅是物質生產品的總和；牠還是商品，交換價值，“社會數量”總和。

假若我們以棉花代替羊毛，以米代替麥，以汽船代替鐵路，只要這棉花，米與汽船——資本的實體——與資本從前所體現其中的羊毛，麥，鐵路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同樣的價格，則資本仍無變化。資本的實體可以不斷地變化，至於資本自身則不經受絲毫變化。

雖然一切資本都是商品的即交換價值的總

和，但不是每種商品的即每種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

每種交換價值的總和，是一種交換價值，反之，每種交換價值，是一種交換價值的總和。例如，價值一千鎊的房屋，是一種一千鎊的交換價值。價值一便士的紙，是一便士的百分之百的交換價值的總和。可以相互交換的生產品，就是“商品”。商品之能交換的一定比例，構成牠們的“交換價值”，或者以貨幣來表示，就是牠們的“價格”。這些生產品的總和不能改變其為“商品”，其代表一種“交換價值”，其有一定的“價格”的這種定義。不管一棵樹是大是小，牠終是一棵樹。不管我們以鐵交換他種商品，或以翁司計，或以噸計，這在其性質之為一種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則沒有區別。按照牠的總和，牠是一種含有或多或少的價值，或高或低的價格的商品。

那嗎，商品的即交換價值的總和如何能成為資本呢？

由於交換直接的生活着的勞動力以維持自己及拓殖自己爲一獨立的社會權力——即社會的一部分的權力的原故。資本的前提，必須有一除勞動力而外身無長物之階級的存在。

那是過去的，蓄積的，實現了的勞動對於實際的，生活着的勞動的支配者，是牠把蓄積的勞動轉化爲資本。

資本并不是由生活着的勞動利用蓄積勞動爲新生產的手段的事實而成立。牠是由以生活着的勞動爲手段，而蓄積勞動才能維持及增加其交換價值的事實而成立。

發生於資本與工錢勞動間的交換那又是甚麼呢？

勞動者在交換其勞動力的時候收得生活資料；但是資本家在交換其生活資料時，收得——勞動，勞動者的生產能力，創造力，勞動者以此創造力不僅償補了他所消費的，而且給了蓄積勞動以較前所有還要大些的價值。勞動者從資本家收得

了先前所供備的生活資料的應得的一部分(A share of the previously provided means of subsistence)。他把這些生活資料做甚麼用了呢？用爲直接消費。但是當我一旦消費了我的生活資料的時候，牠們就消滅了，而且對我算是永遠失去了：所以我必須趁這些生活資料維持着我的生命的期間，生產新的生活資料，這樣，在牠們被消費着的期間，我才可以爲我的勞動供給新的價值來補償那消逝了的價值。但是勞動者所必須讓渡給資本以交換他所取得的生活資料的，正是這高貴的復生產力。所以對於他，這種高貴的復生產力算是完全損失去了。

我們來舉一個例吧。一個農夫每日給他的日工工人兩先令，爲這兩先令，那位日工工人整天在農夫的田中做工，因此，可以保證爲農夫得回四先令。農夫不僅收回了他們先給付日工工人的價值，而且加倍地收回了。他所付給日工工人的這兩先令，他算是投用或消費在一種有結果的生產的方

式。他以這兩先令所買得的，正是日工工人的勞動和力量，這種勞動和力量生產了兩倍此價值的收穫品，而把兩先令轉成四先令了。^註另一方面，日工工人以其生產力（這生產力的結果，他剛纔讓渡給農夫了）收得兩先令；他以這兩先令去交換生活資料；這所交換得的生活資料，他以或急或徐的速度去消費。這兩先令這樣算是在兩重的方式中消費了：對資本說是生產的，因為牠們曾交換得了生產四先令的勞動力；對勞動者說，是不生產的，因為牠們所交換的是生活資料，這生活資料是永遠消失了的，要想恢復牠的價值，只有與農夫重復這種交易。因此資本必須要有工錢勞動，工錢勞動必須要有資本；此為彼的存在的必要條件，彼為此的存在的必要條件；牠們要相互依賴才能存在。

棉業工場的勞動者只生產棉製品嗎？不然。他還生產資本。他生產對他的勞動施新支配的價值及由此支配而創造新價值的價值。

資本只有交換勞動，使工錢勞動存在，才能增

殖。工錢勞動也只有由增殖資本及加強支配工錢勞動的權力才能交換。所以，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勞動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產階級及他們的經濟學家，都主張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實際的，他們是一致呀！假如資本不雇用勞動者，則勞動者會要餓死。假如資本不掠奪勞動力，——因為要掠奪牠，所以必須要購買牠——則資本會要破滅。專用於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得愈速，產業進行得愈有成功的希望，資本家脹得愈飽，變得愈富，生意進行得愈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勞動者愈多，勞動者把他自己賣得也愈貴。

因此，勞動者保障其可以忍受的地位的必需條件是生產資本之加速的盡量發展。

但是生產資本之增殖的意義是甚麼呢？是蓄積勞動對生活着的勞動之權力的加大。是資產階級對勞動階級之支配的加大。只有工錢勞動在資本的統治中創造了牠自己的敵對者，牠自己的主

人的時候，僱傭手段，即所謂生活手段，才從牠的敵對者流回到牠；但條件只是牠把自己重新轉化為資本的一部分，因而牠成為了資本增加可賴以急劇進行的槓杆，這時候生活手段才能從牠的敵對者流回到牠。

因此資本的利益與勞動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意義不過是資本與工錢勞動是同一關係的兩方面。此制於彼，彼制於此，恰與高利貸者與借債者之互相有關，是一樣的。

工錢勞動者一直是工錢勞動者的時候，他的命運是懸於資本的。這就是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共同性的真切意義。

隨着資本的增加的，是工錢勞動總和與工錢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換言之，就是資本的支配擴張到愈多人數身上去。假定很順利的情形，隨着生產資本的增加，必然有勞動需要的增加。所以工錢，勞動的價格，也將高漲。

一所居屋不管是大還是小的，但是假若四圍

居屋都是一樣小，則牠可以滿足社會的要求。假定在小房子側旁建立巍峨的宮殿，宮殿就會把這房子縮成茅舍。這房子的小，立刻暗示出住者的權利的減少或者全然沒有了；可是因文明的進步，牠也可以造同鄰家一樣高的宮殿，但是假如鄰家又同程度的，或更上的，建造牠的宮殿，則這較小的房屋的住者，又覺得自己在這四壁之內更加不快意，不滿足了。

工錢總額的大大增進，是以生產資本的急速增加為前提。生產資本的急速增加，喚起財富，奢侈，社會慾望，社會享樂的一樣的急速增加。所以，雖然勞動者的享樂是增高了，但是同勞動者所不能得的資本家的增加的享樂比較起來，同一般社會的發展所達到的程度比較起來，勞動者所得的社會滿足還是很低的。我們的欲望及其滿足是以社會為根據的；所以我們要以牠們與社會的關係來測度牠們，不能以滿足牠們的對象來測度牠們。因為牠們的性質是社會的，所以也是相對的。

事實上，工錢并不完全由牠們所能交換得的商品總和來決定。牠們依賴着各種的關係。

勞動者以其勞動所最先收得的是一定額的貨幣。是不是工錢僅僅爲這貨幣價格所決定呢？

在十六世紀，因爲發現美洲比較豐富的而且容易採掘的礦山的結果，歐洲流通的金銀就增加起來。所以金銀的價值就隨他種商品的關係而下落。勞動者以其勞動所收得的銀貨的分量，依然同從前一樣。他們的勞動的貨幣價格雖然未變，但是他們的工錢是下落了，因爲他們以同等量的銀子，交換得較少量的其他商品。這是十六世紀促進資本增殖與資產階級勃興的事情之一件。

且更舉他例。一八四七年冬季，因爲荒歉的結果，必需的生活資料如糧食，肉類，牛油，乾酪等之價格，均非常增高。我們假定勞動者以其勞動力依然收得與以前同額的貨幣。這一來，他們的工錢沒有跌落嗎？自然是跌落了的。以同額的貨幣，他們只交換得較少的麵包，肉類等；他們的工錢的跌

落，並不是因爲銀的價值減低了，只是因爲生活資料的價值增高了。

最後，我們又假定勞動的貨幣價格與以前相同，只是因爲應用新機械，或者年時豐順或者其他原故的結果，一切農產物，工業品的價格都低減。以同量的貨幣，勞動者現在就能夠購取較多的商品，他們的工錢就算增加了，正是因爲他們的貨幣價值不會變動。

勞動的貨幣價格，即名義工錢的總額，因此並不與真實工錢，即事實上以工錢交換所得之商品總量，相一致。因此，假如我們說工錢的漲落，則勞動的貨幣價格，或名義工錢，並不是我們要着眼的惟一事件。

但是既不是名義工錢，即勞動者賣身與雇主所得的貨幣額，也不是真實工錢，即勞動者以該貨幣所能購得之商品分量，所能括盡此包含在工錢一詞中的一切關係。

但是工錢尤爲其對資本家之利得或利潤的關

係所決定。就是因為這種關係，我們又說“相對的”工錢。

真實工錢表現勞動價格與其他商品價格的關係；反之，相對工錢表現現存勞動所得着的由牠所創造的新價值的應得部分比之由蓄積勞動的資本所專用的那一部分的比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錢不是由勞動者所生產的商品中他所應得的部分。工錢是以前所生產的商品部分而僱主現在所用以來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力的。”但是這一部分工錢的總額，當資本家把由勞動者所創造的生產品出賣了之後，他必須要從價格中把牠取回來的，而且通常在價格中還為他包含着一部分利潤，這利潤部分即是在由他所先墊付的生產成本之上的超過額。在資本家方面，由勞動者所生產的商品的售賣價格，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補償所已支付的原料價格和已支付的機械或其他勞動工具的損耗；第二，補償所已支付的工錢；第三，在此兩部分之上的超過額，這即構成資本家的利潤。雖

然第一部分不過是收回了“以前存在”的價格，而那一部分，即補償勞動工錢以及構成利潤的超過額那一部分——很清楚的是取自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而且增加到原料上的新價值中的。在此意義上，我們爲“比較”的原故，可以把工錢與利潤都看作是勞動者的生產品的一部分。

真實工錢即使未變，或者甚至於提高了，而相對工資仍然低落。舉例來證明。假定一切生活資料的價格都低落了三分之二，而一日的工錢僅低落了三分之一，譬如說，從三先令落到二先令。雖然勞動者現在以二先令所買的商品分量比他以前以三先令所買的還要多一點，然而他的工錢比例到資本家所獲得的利益却減少了。資本家的利潤——譬如說是一個製造業者的——却由一先令加大了，因爲勞動者對於資本家所支付的這較小的交換價值，必須要生產出比他以前所生產的還要大些的交換價值。資本所得的部分比例着勞動所得的部分而提高了。社會的財富在資本與勞動之間

的分配就愈加一天一天地懸殊起來。資本家以同量的資本統治着更多量的勞動。資本家階級支配勞動階級的權力愈見擴大；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愈見低微，被壓迫到資本家的地位之下的更低微的地位。

在工錢與利潤的相互關係上，決定牠們的高漲與低落的一般法則是甚麼？

牠們是彼此以反比例的形式對立着的。資本的部分——利潤——是在勞動的部分——工錢——低落的同一比例中而高漲的；反之亦然。利潤的高漲恰可以工錢的低落來測量，而利潤的低落也恰可以工錢的高漲來測量。

或者有人要非難說，資本家可由把他的生產品與其他資本家做了大佔利益的交換而得着利潤，或者由開闢新市場的結果，或在舊市場中的銷路擴大的結果，因而他的貨物的需要提高了，也可由此得着利潤；或說，資本家用欺騙其他資本家的手段，不受工錢與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高低大小

的支配，也可以使利潤增加；或者說，資本家的利潤也可由勞動工具的改良與自然力的新應用等等方法提高起來。

但是仍須要承認，雖然獲得利潤的方法有所不同，結果總是一樣的。固然利潤不必由工錢低落的原故而高漲，但工錢總是由利潤高漲的原故而低落。資本家以同量的勞動獲得了較大數量的交換價值，於此並不必要對於勞動付給較高的價格；那就是說，比例起勞動為資本家所產生的純利潤來，資本家對於勞動只付給了更低微的價格。

此外，我們要記着，不管商品價格的變動如何，每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即此商品與其他商品交換的比例——是為商品的生產成本所決定。資本家階級間的相互欺騙的把戲，必然要相互抵消的。生產上機械的改良與新法地利用自然力，能在一定時間內，以同量的勞動與資本，生產出多量的交換價值。假如應用紡績機，在一小時內紡績兩倍於紡績機發明以前之棉紗——如以前紡五十

磅，則現在紡一百磅——，終究此一百磅在交換時也並不見得比以前的五十磅能獲得更多的商品，因為生產成本減少了一半，或者說因為同樣的生產成本，生產了兩倍的生產品。

最後，無論一國的或世界市場的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他們自身間的生產的純利潤以何比例而分配，但這些純利潤的總額，總是完完全全由直接勞動增加的蓄積勞動之總額。所以這個總額，是以勞動增殖資本的比例即利潤對工錢增高的比例，增加起來。

因此我們看見，就令我們自己囿於資本與工錢勞動之間的關係，資本的利益也是與工錢勞動的利益直接敵對的。

資本的急速增加是與利潤的急速增加相等的。只有勞動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工錢，以同樣的急速低落的時候，利潤才能急速的增加。

雖然真實工錢與名義工錢（勞動的貨幣價格）同時增高，只要不是與利潤同比例的增高，而相對

工錢還可以下落。例如，營業呈好況的時候，工錢漲百分之五，而利潤則漲百分之三十，相對工錢就不惟沒有增加，而且低落了。

因此，即令勞動者的收入是跟着資本的迅速的發展而增加，可是同時分裂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社會罅隙就更增大，資本高於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存，就更甚。

說勞動者的利益是在資本的迅速增加中，其意思不過如此：勞動者增加其主人的支配權愈迅速，他從其主人的棹子上所撈摸的麵包屑將愈豐富；能供以僱傭的及存在着的勞動者的數目愈大，依賴於資本的奴隸的數目也將愈大。

所以我們看見，就是對於勞動階級是最幸運的情勢，資本是在盡可能的迅速增加，無論這怎樣可以改善一點勞動者的物質生活，但是絕不能廢去勞動者的利益與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間之敵對。利潤與工錢是恰與從前相同的保着反比例的形勢。

資本迅疾增加的時候，工錢可以增高，但是資本的利潤增高得更快。勞動者的物質地位有了改善，但是他的社會地位卻更下落，劃分勞動者與資本家的社會罅隙也愈加擴大了。

最後，所謂工錢勞動的最順利的狀況，即是說生產資本的盡可能地迅速增加，其意思不過如此：勞動階級擴大那統治他們的敵對權力愈迅速，他們在其下勞動着為資產階級增進財富，為資本擴張支配力量，因而很滿足地為他們自己鍛製黃金的鎖鍊，資產階級即用以加在他們的頸上拖在牠（資產階級）的後面跑——的這種勞動條件將也愈優好。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與工錢的高漲是不是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主張一樣，兩者是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呢？我們很難相信，資本變得愈肥，牠的奴隸就吃得愈飽。資產階級太聰明了，算盤打得太細密了，所以不會注意到封建貴族的那種顯赫榮貴——牠的僕從的輝煌的虛飾華表。資產階級

的生產條件迫得牠不得不細密地打算盤。

我們現在對於生產資本的增加給與工錢的影響，作較深的研究。

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的一般增加，就發生勞動的多種的蓄積。資本家的數目就加多，範圍就擴大。資本總量的增加，就增加資本家間的競爭。私人資本的範圍的增加，就供給了率領有巨大武器的有力的勞動軍加入產業戰場之手段。

一個資本家只有把自己的貨物賤賣出去，把別人驅出戰場，才能獲得勝利。既要無損於己，又要賤價賣出，惟一的方法是更廉賤的生產，即是儘可能的增加勞動的生產力。但是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更詳密的分工及機械之普遍應用與不斷的改良。分工的勞動軍愈大，應用機械的規模愈大，相對的生產成本愈低，勞動的結果也愈豐富。因此，資本家間，對於增加分工，增加機械，保持無限大的掠奪率這種種競爭都起來了。

現在，假如有一資本家，增加分工，應用并且改良新機械，或更有利的更技術的使用自然力，他就發現了生產比他的競爭者以同量勞動（無論其為積蓄勞動或直接勞動）所生產的尤為多的商品之方法——例如他能生產一碼棉布的時間，其競爭者只能生產半碼——那嗎這個資本家這下就怎樣呢？

他可以照原前市價，賣出半碼；但這并不能把敵方驅出戰場而擴大自己的銷路。但是他要增加銷路的需要已經像他的生產一樣的比例增加起來了。他已經辦到的更有效的，費用更大的生產方法，使他能夠以賤價賣出他的商品，但是這種生產方法使他要把商品賣得愈多愈好，佔據的市場愈大愈好。所以我們的資本家就把其餘半碼棉布，以低於其競爭者之價格，發售出去。

可是，這資本家絕不將其全碼如其競爭者售其半碼之價，賤賣出去，雖然他的全生產并不比別人的半碼的生產成本，花費得多。因為，照此情形，

他將無有所獲，僅能收回其生產成本而已。他的收入的將來的增加，是由於他運用較大的資本，並不是由於他比別人更會運用此資本。此外，只要他把他的貨價，比他的競爭者，減低一很小的百分數，他就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只要廉價出售，他就把別人驅出市場，而且無論如何能從別人搶着一部分銷路。最後，我們要記得，視乎商品銷售的情況好與不好，市價總是高於生產成本或低於生產成本的。按照一碼布的市價高或低於以前的生產成本，應用新的而且更能生產的生產方法之資本家，所依以在他的實際生產成本以上出賣的百分率就有些不同了。

但是資本家絕無法永久握着他的特利。別的競爭的資本家，將以同等規模或更大規模採用同樣的機械，同樣的分工；這種採用一定要盛行起來，普遍起來，直到一碼布的價格的低落，不僅在舊的生產成本以下，簡直在新的生產成本以下為止。

這樣，資本家意識着他們自己比較地又在同樣的地位，即他們又站到適用新的生產方法之前的地位中去了；而且假若他們是由這些方法才能使他們以同樣的價格投賣兩倍於前的數量的生產品，那他們現在就不得不以比舊價格更低的價格去投賣兩倍數量的生產品。從新規模的生產出發，而舊的把戲又重新開始了。更精密的分工，更技巧的機械，分工與機械之掠奪更疾速的進展。此後，競爭引致對此結果的同樣的反動。

由此，我們看見，生產形式與生產方法是如何不斷的改進與革命；分工是如何必然的在其後面引致更精密的分工；採用機械是如何的引致更切要的採用機械；大規模的生產是如何的引致更大規模的生產。

這就是不斷的使資產階級的生產脫出牠的舊軌道，強制資本加強勞動的生產力（即以資本已經把牠加強了的這個原故）的一個定律——這一定律並不讓牠——資本——休息一會，只是耳語着

的說，“快向前進！”

這不是別的定律，這即那消除商業的週期動搖，而必然地使商品價格與牠的生產成本歸於一致的定律。

無論那位資本家所引致到商業戰場中的生產方法是怎樣的有力量，而競爭將要使這種生產方法成爲普遍的採用；及至這種採用到了很普遍的時候，他的資本的更大出息的唯一結果就是他現在必須“以同樣的價格”投賣比以前十倍，二十倍，一百倍多的數量。但是因爲他必須要賣却，或者，一千倍多的商品，以資抵補那由所賣更大數量生產產品而致的售賣價格的低減部分；因爲更大的投賣成爲必要了，——不僅對於獲得更大的利潤成爲必要，即對於收回生產成本也成爲必要，——生產工具，如我們所已看見的，總是一天一天昂貴的；——而且因爲更大的投賣成爲一種生死問題——不僅對於這一資本家是如此，即對於他的競爭者也是如此：——所以舊的競爭以更大更激烈

的強力繼續着，而以前所發現的生產方法也愈見有豐盈的結果。因此，更精密的分工，更新式的機器的使用，就起着新的開端，而以更大的速度進行着。

因此，無論所使用的生產方法的力量如何，競爭總是要把商品價格減落到生產成本，——而且好像被一種暴虐的法律，逼迫着更多量的生產品不斷地以更低的價值去投賣——競爭就是這樣總是盡其力之所及從資本攘奪其所生產的黃金之果。因此，資本家除了義務似地在同樣的時間中生產出比以前更大的數量，除了更困難地應用其資本於有利之途外，將無所施其技。雖然競爭以其“生產成本法則”不斷地窘迫他（資本家），而且把他鍛製來反對其敵對者的武器倒轉來反對他自己，而資本家仍不斷地企圖着以競爭制勝競爭，不斷地採用更精密的分工，不斷地以新機器代替舊機器，——新機器雖則裝置更加昂貴，而生產却更低廉，決不坐待競爭使舊機器變成廢物。

我們且注視此影響及全世界市場之熱狂的擾動，我們就可了解資本的增殖，積纒，集中，如何引致不斷的，極端的，且以加速度進展着的分工，與繼續的應用新機械及改良舊機械。

這種種情勢雖然不能從資本的增殖分開，但牠們又怎樣影響到工錢總額的決定呢？

分工的進步，可以使一個勞動者，做五個，十個，二十個勞動者的工作，所以就把勞動者間的競爭，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勞動者不僅同一個以低工錢出賣自己的勞動者競爭，而且要同一人做五人，十人，二十人之工作的勞動者競爭；資本所採用的與不斷的增進的分工，必然驅使勞動者入於這一種的相互競爭。

尤有進者，勞動自身是與分工的進步同比例的簡單化。勞動者的特殊熟練，失掉價值。牠成了一種劃一的，單調的生產力，沒有肉體的與智力的伸縮性。他的勞動成爲任何人都能担任的勞動。所以競爭者從各方面擁來壓迫他；此外我們必須記

着，商品的價格是由生產成本來決定，現在勞動者的技能既然簡單容易，學得此技能的生產成本自然就少，生產成本少，工錢也就跌落了。

所以，勞動之更加不充分不快意，恰同競爭之增加與工錢之低落有着同樣的比例。勞動者惟有盡其力之所及多勞動些：或每日多工作幾點鐘，或在同樣的時間內更加辛勤地勞動，總想盡可能地保持其工錢率。這樣，爲需要所迫，他自己就增進了分工的惡結果。所以結果是：他愈勞動，他所得的報酬愈少；這就是這個簡單的理由——他同他的工友們競爭，因而迫得他們也不得不同他競爭，也不得不像他一樣以最惡劣的條件出賣他們的勞動；因此，在最後的結果，他算是以勞動階級的分子的資格在同他自己競爭。

機械是有同樣的結果，不過其規模更爲特大。輻以不熟練勞動者代替熟練勞動者，女子代替男子，兒童代替成年者；在新採用機械的時候，更把手工勞動者成羣的投諸街隅；在機械發達，改進，

換置多於生產的機械的時候，又把勞動者人數大大的減少。以上，我們已大略說明資本家彼此的產業戰爭；這個戰爭有牠的特徵，就是募集產業軍者負，解除產業軍者勝。這般將軍們（即是這般資本家）互相競爭，視乎何人能解除產業士兵解除得多。

經濟學家幾番的向我們保證，說，為機械所驅出的冗餘勞動者，可以覓得新部門的職業。

他們卻沒有膽量直接主張被解雇的勞動者從事於新部門的勞動，事實高叫出來揭破這個謊語。他們僅僅主張，對於勞動階級的其他構成分子，例如準備加入死去的產業部門之新興的後代勞動者，將有新的生產方法發生出來。自然，這對於被棄的勞動者可以大為滿意。尊貴的資本家將不乏可供掠奪的血肉的新鮮供給，亦將讓死者去埋葬死者吧。這真是與其是對勞動者的，不如說是對資產階級自己的安慰。假如工錢勞動者全階級為機械所絕滅，資本將是如何的震恐，因為資本而無工

錢勞動，將要完全失掉其為資本的作用。

我們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所驅出而失掉了職業的人們，以及那些在同一路線期望得着職業的人們，都找着了一點新的職業。你們能夠想像這新的職業將能得着與他們所已失去的職業所曾得着的報酬那樣高麼？這個觀念正與經濟學的一切定律是直接矛盾的。我們已經看見，近代的產業形式總是傾向着以更簡單的更低級的職業代替較複雜的較高級的職業。

那嗎，一大羣的勞動者，他們既被機器逐出了產業部門之外，如何能在別種部門找着“避難所”時，而不以較低的地位，更劣的報價為滿足呢？

從事於製造機械的勞動者，曾被列為例外。到產業上機械的需要與使用加多的時候，機械的數量必然會增加起來，所以機械的製造及從事於機械製造的勞動者，亦就增加起來；而在從事於這一產業部門的勞動者，卻要熟練的勞動者，甚至是有教育的勞動者。

自一八四〇年以來，這個主張就在此時以前，也不過是半面真理，現在更連這外觀都失掉了。因為用在機械製造中的機械，與用在棉業製造中的機械是同樣的多了；從事於機械生產的勞動者，雖然對付着的是用在這一產業中的非常精細技巧的機器，而現在至多也只等於運用粗率的機械了。

但是為機械所解雇的男工的地位，或者要一個女工，三個童工才能運用。男工以前的工錢要足以供養一妻三子，這不是必需的嗎？工錢的最低限度要足以維持及生殖勞動者種屬，這不是必需的嗎？小資產者的辯解，現在又有甚麼意義呢？現在需要多於以前勞動者四倍的生命才能支持勞動者一家的生活。

總而言之：生產資本的增加愈迅速，分工與機械的應用就愈擴大。分工與機械的應用愈擴大，勞動者間的競爭就愈增加，勞動者的平均工錢就愈下落。

而且，勞動階級都是從社會上層集合來的，一

羣小製造業者小所有者從那裏墮落下來，自茲以往，他們除了伸自己的手接近勞動者的手外，更無其他較好的出路。由覓找工作的一些人們所伸出的手臂，像森林似的，這森林一天一天長得愈密；而手臂自身却一天一天變得愈瘦。

競爭的第一條件是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那即是說，對於這種競爭，第一必要條件是大製造業者，而不是小製造業者——那麼小製造業者之不能在這種競爭中生存是非常明白的事。

資本利息的低落是與資本總額的增加與擴大同其比例的，因此小資本家不復能依賴其利息以生活，只有加入工人的隊伍而增加無產階級的人數——這一切也是很明白的，不必再要解釋或例證。

最後，資本家們被這裏所舉述的一些原因所逼迫，不得不以繼續擴大的規模去利用更加龐大的生產手段，而且以此目的去運用“信用”制度的總彈力；可是另一方面，產業界的地震似的動搖也

同樣地比例着增加，在這種強烈的動搖中，產業界只有犧牲牠的財富的，生產物的，甚至於生產力的一部分於“冥府之神”(Gods of Hades)，才能保證牠自己的生存——一言以蔽之，恐慌(或危機)也以同樣的比例增加着。恐慌立即更加頻繁，更加劇烈；因為生產總額以同樣的比例增加着，因而擴張市場的要求也以同樣的比例增加着，而世界市場却不斷地縮小，其不曾受過掠奪而留待掠奪的市場一天一天的稀少；因為每經一度恐慌，都要在世界商業的領域中增加一個從前未經發現過的，或者從前只輕輕地受過掠奪的市場。但是資本不僅靠勞動而生存。像一個顯貴而野蠻的君王一樣，牠把牠的奴隸們的屍骸與在恐慌中破滅的勞動者的整個大犧牲都隨着牠拖進墳墓中去。這樣，我們看見，假若資本增加得迅速，在勞動者間的競爭就增加得更迅速，那就是說，職業與生活的手段就以更大速率的比例低落下去；然而工錢勞動的最順利的條件還是存於資本的迅速增加之中。

三

政治經濟批評導言

1. 生產一般
2. 生產對於分配, 交換, 消費之一般
關係
3.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4. 生產, 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與交通工具
在對於生產關係與交通工具的關係
以內的國家及財產的形式
法律關係
家族

政治經濟批評導言 (註一)

一. 生產一般

我們討論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的生產。社會內個人生產——或者恰當的說，為社會所決定的個人生產——就是我們研究的起點。形成斯密 (註二) 與李嘉圖 (註三) 之起點的獨自孤立的漁獵者，是屬於十八世紀的無意味的幻想。這些——魯濱孫一類的人，(註四) 他們完全不是——如文明史的學者所夢想的——僅僅成為反對過分的精巧的反動者，並且是回復到錯誤地了解自然。即如盧梭 (註五) 的“社會契約說”在這裏面一切離自然而獨立

的主體間之相互關係及聯繫是由契約規定的，差不多一點也不根據在類似的自然主義上面。一切這些都是多少有點像魯濱孫式的外表並且也僅是美術的外表。反之，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事實是先進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牠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發展起來的，而在十八世紀就向着自己成熟的道路上大踏步進行。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個人是不受自然關係等的束縛，而在以前的歷史時代，自然使個人成爲一定限制的人類集團之一部分。對於十八世紀的預言家，斯密司與李嘉圖依然立在他們的肩臂上，成爲封建社會形式的崩潰與十六世紀後發展的新生產力之聯合產物的十八世紀的個人，看來牠的存在是屬於過去的一個理想物，并非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

自從個人與自然合致，而相符他們的人性的觀念，他就不被認爲是歷史的產物，而認爲是自然的產物了。這個幻想直到現在的每個新時代中，都是特著的。貴族的司圖阿(註六)很堅決的站定反十

八世紀精神的歷史立場，逃過了這個觀念的簡單化。我們追溯的歷史更遠，則個人，以及這生產的個人，更不是獨立的而是附屬於較大的集團的：自然的聯繫一開始就把他和家庭以及在氏族內發展起來的家庭隨後和社會連接起來，這種各種不同的形式，是從血族之衝突與合併而長成的。只有在十八世紀，在“資產階級社會”，這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在個人之前，才成為私人目的的一個唯一手段，一個外界的必需物。但是這種單獨個人的觀念成為流行的時代，這是社會相互關係（一般的觀點）已經達於最高發展階段的時代。照字意上講，人是 *zoon politikon*（政治動物），不僅是社會動物，而且是只能在社會中才能發展成個人的動物。在社會外的單獨的個人生產，這種說法，其謬妄之甚，有如說不須個人的共同居住及互相談話，就會有語言的發展一樣。或者這種生產是有例外的可能，那就是一個文明人以遭遇而入於野蠻之邦，而且已經在自身中具有了社會力的動力。我們不需

乎在這上面多所饒舌了。這種觀點是可以完全不必解釋的，要是十八世紀的人們所了解的以及當時所有的意義是無稽的，那末巴士夏(註七)，卡勒(註八)，蒲魯東(註九)等就不再以很嚴重的方式移植於經濟學方面來了。

自然，蒲魯東及其他的人，他們不知道經濟關係的歷史根源，他們要解釋任何經濟關係的發生，頂方便的是用創造關於亞丹或蒲郎麥賽(註十)的神話的方法來解釋，這一類觀念是在預備的和完成的形式以內，隨後就被應用到實際方面來了。更沒有甚麼比這夢想的 *locus communis* 還厭氣無味的了。

所以我們講生產的時候，我們心裏總是想到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或生活在社會內的個人的生產。因此可以說，爲要講純正的生產，我們就必然要從事研究在生產的各個階段內歷史的發展進程，或者在開端我們就要講我們是說的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事實上成爲本書主要內容的近

代資本主義生產。但是一切的生產階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一些共同的定義。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體，但是是一個合理的抽象體，因為牠把這個共同形象簡單了，決定了，這樣免去我們的重複。此外這一般或共同的形象，是從一些非常錯綜之成物的比較來顯明的，並且在牠自己內部含有許多各不相同的定義。有些分子是屬於一切時代的，有些又是在少數時代有共通性的。有些是在最近代與在最古代都是相通的。沒有可以沒有牠們而可以想像的生產；可是，雖然最發展的語言與最不發展的語言，其法則與條件沒有甚麼共同之點，但是形成牠們的發展，是從一般的，共同的條件造成的。統理一般的生產的條件，必定要分別出來，這樣，相異的主要點，才不至於在主體的人類與客觀的自然之相同事實的一般統一性的觀點上，失去其自己的特質。比如，想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是永久性與調和性的近代一切經濟學的智慧，就在於他們忘記了這些特點。例如無論那一種生產，沒有生

產工具，雖然僅僅把一雙手當作工具用，生產是不可能的；無論那一種生產，沒有積蓄的勞動，即使這勞動是包含野蠻人由手的重複練習而積蓄集合來的唯一的智慧，生產是不可能的。資本同樣是生產工具，牠同樣是過去外界勞動的結果。恰切點說，資本是普遍的，永久的，自然的現象；這樣就可以相信，只有拋棄轉變“生產工具”與“蓄積勞動”爲資本的這種專門研究。所以卡勒認爲全部生產史簡直是爲政府方面的惡意所做成的偽造而已。

假如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某種特別生產部門或集體，如農業，牧畜，工業等。但是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工藝學。一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之生產的一般目的與生產的特別形式，其間關係，我們以後將隨處講到。

最後，擺在我們面前的，生產在其本身內不僅是一具體的形態。但是在生產各部門之較大集體或較小集體內的實際面目永遠是一些社會的有機構造，社會的本體。這真實行程與其科學的解釋之

間之關係，也不是本文的範圍所要論及的。所以我們必須分別生產一般，特殊的生產部門，與集體生產。

這是時式的，就是經濟學家在他們著作的開始，總是一篇題名為“生產”的導言（例如穆勒（註十一）），而講到一般的“生產條件”。

這個一般的導言部分，總是講到或認為是講到：

1. 那些條件，沒有牠們，生產是不可能的，即是生產的主要條件。可是，事實上有如我們將看見的，牠漸次的成爲幾個很簡單的定義，轉爲平易的贅言。

2. 那些條件，多少是促進生產的，如亞丹斯密司所討論的進步的與停頓的社會狀態。

因爲要使他所作成的一個簡單總述要有科學價值，所以必然要按各國之發展的時代來研究生產力的程度，這樣一個研究，也爲本書的範圍所不容許，而且因爲牠不屬於這裏所研究的範圍，則

與其相關的競爭，積蓄等，也就沒有論述了。這事件之公認的見解，對這事實給了一般的答覆，就是一個產業國當牠各方面看來都達到歷史頂點的時候，才是牠的生產達於頂點的時候，或者，人種，氣候，自然條件，如對海之距離，土地之肥瘠等都是比其他的國家更有利於的生產的。這又會落於贅言了，就是創造財富的便利，是有賴於牠的客觀的，主觀的兩者之分子的範圍。事實上，無論那一個民族的產業發展的高度，直到現在，其主要目的還不是謀利，而是在獲得的過程。因此，洋記（註十二）站在英國人之上。

但是實際上，經濟學家在一般的導言部分上說的完全不是這些。反之，他們是把生產來同分配作相反的判別（如穆勒），認定牠是獨立於歷史的永久法則，為的是要在這種便利的情形之下，把資產階級的關係推進到永久的抽象的自然的社會底法則裏面。一切容納了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就包括在這裏面。相反的，在分配之下，人類是照着這個

理論容許自己一切的生產。甚至，不依賴於用極嚴厲的方法衝破生產與分配的實際聯繫。這在開始就要明白，無論怎樣不同的形式，不應把分配應用到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關於這一點，也和生產一樣，能夠找出共同的情況，並且一切歷史的差異，在一般的人類法則裏面，也才能夠鎔合和消滅。例如，奴隸，農奴，工錢勞動者，他們都得到足以維持其為奴隸，農奴，工錢勞動者的生存之食物量。生存於貢物，租稅，地租，施舍，教費之上的國王，官吏，地主，僧正，祭司——他們都得到社會生產的某一部分，這社會生產是為不同於決定奴隸等所得到的分量之不同法則所決定的。一切經濟學家在這題目下安置的兩點，是：一，財產，二，由司法巡警等行政對財產之保護。對這兩點的反駁可大略述之於次：

1. 一切生產，是由於在一定社會形式之內的，或經過一定社會形式的個人，對自然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財產(占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

這已是贅言了。但是，這一點立刻跳到一定的財產形式如私有財產的時候，那就成爲可笑的了。（此外包括一個相反的形式，即無有財產這形式的存在。）歷史更指明公共財產（例如印度，斯拉夫，古代克勒特族等）是原始的形式，這在後來的時期中所謂公社財產還扮演重要的地位。在此種財產形式或彼種財產形式之下財富是否很勝利地成長了，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此地不能顧及到。但是不管那一種生產，或恰切地說，不管那一種社會，不能說在那裏沒有存在着任何財產的形式，這又是贅言了。不占有的占有，是一個主觀上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subjecto*）。

2. 財產等之保護。如果這些平淡無奇的東西向着牠們的真實含義去追求，那末，他們知道的比牠們的宣教師還多。每個生產形式都創造牠自己的法律關係，管理形式等。理解的遲鈍與觀念的貧乏，是包含在這裏的，即是以爲現象的本身之間有機地被聯繫起來，而成爲偶然的相互關係，而這相

互關係純粹是用合理的方法連接起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概念飛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面前，即是在近代的巡警之下，進行生產，比在拳棒法之下為好。他們忘記了拳棒法也是法，而強者的權利，是繼續存在於別的形式中，甚至在他們的“法治的國家”中。

當着適應一定的生產階段的社會關係僅在發生或當他已經消滅的時候，生產的破壞自然就發生，雖然其範圍與影響是各不相同的。

總結起來：這裏所有的的定義，即為思想所整理出的，就是一切的生產階段；可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是別的而是抽象的概念，用這種抽象體的幫助是不可以了解生產底一個實際歷史的階段。

二、生產對於分配，交換，消費之一般關係

在未更進分析生產之前，要先知道經濟學家

把來與生產并列的其他各種分部。第一個大前提，是如下所列的：在生產過程中，社會成員使自然的生產物供給人類的需要；分配就決定個人參加在這生產中的比例；交換供給他一定量的生產品，這一定量的生產品是他願意用在分配之下供給他的那一部分去交換來的；最後，生產品的消費，就成為使用與享用的目的，成為個人取用的目的。生產產出我們需要所要的東西；分配照着社會法則來分配牠們；交換是依據個人的慾望來更進的分配已經分配了的；最後，在消費中，生產物就脫離了社會的週轉，而成為在使用上伺候且滿足個人慾望的直接目的物。於是生產看起來是一個起點，而消費是一個終點；分配與交換就是中介；這後兩者含有兩個機要，就是認分配為社會所進行的行程，而交換是由個人所執行的行程。在生產中，人是為物所依附的，而在消費上，物又是為人所依附的了；在分配（註十三）上，社會取一般流行法則的形式之生產與消費間的一地位；在交換上，這就是由個人

之遭遇的交易所完成的了。

分配決定個人要收取的生產物之比例（量）；交換決定個人願意要而由分配來給他的部分之生產物。

於是，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形成一個完備的連結，生產是為一般的，分配與交換是為特別的，而消費是為個人的，一切都連結起來。這自然是一個連結，但那並不是很深固的連結。生產，照經濟學家以為是由普遍的自然法則所決定的，而分配是視乎社會的機會，所以分配能夠有一個對生產之多少的刺戟力；交換在這兩者間成為一個形式的(?)社會進程，而最後的消費行為，那不僅認為是最後的意望，而且認為是最後的目的，這就特定的出乎經濟學的範圍了，除非牠反應到那起點去，而且成為使這全部進程重新開始的原因。

政治經濟學的反對者——無論是從這一科學本身出來的，或在此科學以外的反對者——他們在粗野的破壞整體的某一部分上，或是同經濟學

家站在共通地位上，或是在他們之下，非難政治經濟學家，再沒有比這個責備更普通的了。非難政治經濟學把生產自身認為就是目的，太把外物排除的淨盡了。對於分配，也有同樣的話。這個責難自身是根據於那經濟概念，說是分配之存在與生產是平列的，自有其內容，自有其範圍。或者，他們被責難是這各種的分子，沒有待他們是一整個的連結。雖然這是教科書把這個分歧印象到生活，而不是這生活把分歧印象到教科書，而在這裏所公開的題目僅是概念之辯證的和協，而非實際狀態的了解。

A. 生產同時又是消費。消費有主觀的與客觀的兩種。在生產中發展自己能力的個人，自然是把能力用掉了，就是在生產行為上把牠們消費了，猶之乎後代人的再生產之自然行為把自己當做生活力的耗費一樣。其次，生產是生產工具的消費，這生產工具成爲使用而消耗了的，而一部分(如在燃燒之下)就燒化爲基本原素。原料的消費，也同樣

是真實的，原料已不保存其原有自然的形態了，而是同樣的被消費了。所以生產行爲，在一切的方面，都同時是消費的行爲。而一切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生產既直接與消費並同，消費也就直接與生產應合，這牠們就稱爲生產的消費。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可以在斯賓諾莎的命題肯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上找着牠的表現。但是決定生產力的消費之定義，不過是在從消費的本身分別出與生產并同的消費，反之，消費的本身則被認爲是消極的相反部分。我們且討論這消費的本身。

消費直接又是生產，猶之乎在自然界中，化學原子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人類在消費之某一形式的滋養過程中，再生長了自己的身體；但這對於以各種形式來進行人的生產的每種消費，都是同樣的真實，這是很顯然的。這就是消費的生產。但是經濟學家說，這種與消費并同的生產，是由破壞第一次生產物的結果之第二次生產。首

先，生產者把他自己變成物事，以後，物事又變成人。結果，這消費的生產——雖然牠是生產與消費之直接一致——主要的總異於原義的生產。生產與消費相應合，消費與生產相並同的這直接的統一性，並沒有干涉牠們直接的二體性。

這樣，生產同時是消費，消費同時也就是生產。每個又直接是牠自己的相反方面。但是同時在這二者之間完成牠們的聯繫運動。生產之成為消費的可能，是在創造再消費的物質，否則，那消費就沒有目的了。但是顛轉來消費之成為生產的可能，是在供給生產物以生產物之所由而生產的個人。生產物只有在消費上得到牠的最後的終結行程。一條鐵路沒有一個人乘，結果就是沒有使用，沒有消費，這鐵路就是似是而非的鐵路，不是真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然而他方面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生產不是沒有目的的。消費創造生產，有兩方面。

第一，生產物首先成為一消費的真實生產物，

例如衣服只有經過穿着的行為才成爲一件真實的衣服；一住屋而無住人，是不能算爲真住屋的，因此，一生產物之與一僅是自然物的分別，就這樣證明出來，生產物首先要成爲一消費的生產物。消費由於消滅生產物而結果牠的行程，因爲生產物是生產的結果，不僅是是活動之物質的合體，而且是爲活動之主體的唯一目的。

第二，消費由於爲創造新生產需要性才生產生產，即是供給形成生產之先備條件的，理想的，內在的，推動的原因。消費給生產以刺激，消費同樣創造了一個對象，這對象參加在生產中決定生產的對象。當生產作成消費的物質目的時，消費就供給生產以理想目的，如生產之意象，欲望，刺戟，意願等，這是很顯然的。牠在以牠主觀的形式內創造了生產的對象。沒有欲望，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又生產欲望。

在生產方面來講。

首先以牠的質，即牠的目的物，來供給消費。

(註十四)消費而沒有目的物，是不能算消費的，因為生產所工作的就在生產消費這方面。

其次，但是生產之供給於消費的不僅是那目的物。牠還給消費以牠的一定圍範，牠的性質，牠的終結。猶之乎消費把牠的終結行程作為是生產物來對生產物一樣，生產也把牠的終結行程置放與消費。因為目的並不簡單的是一般的目的，而是一定的目的，牠是以生產時所作效的一定的態度來消費的。飢餓者是飢餓者；但是以刀，叉來食精治饑饉以為滿足的飢餓者，與用手，爪，齒來食粗茶淡飯的飢餓者，是大有分別的。並不僅是消費的目的物不同，就是消費的方法也是為生產所生產的，這就是說，消費不僅是為客觀的生產所創造，也為主觀的生產所創造。所以生產是創造消費。

再次，生產不僅以物質來供給慾望，而且以慾望來供給物質。當消費從牠自然的不成熟與直向之第一階段出現的時候，——在這狀態中的綿延

性，其自身必然是依然保持其自然不成熟狀態之生產的結果——牠自己就如刺戟物一樣從目的物方面發出。消費所運用的牠的欲望，是由牠的生產物的重視所創造的。藝術的目的，以及任何生產物的目的，都是為愛美的公衆，創造一個理解上和智巧上的享樂。於是生產，不僅是為個人的目的物而生產，而且是為目的物的個人而生產。

所以生產之生產消費：首先，是供給消費以物質；其次是決定消費的方法；再其次創造一個使牠的生產物成為消費的目的物的消費者的欲望。這樣，牠就創造了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法，消費的刺戟。同樣，消費產生了生產者的能力使其為一對象(?)並且刺戟欲望。於是消費與生產之並同就好像是三位一體的東西。

首先，直接的一性：生產就是消費，消費也就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經濟學家通稱兩者都是生產的消費，不過分別出來稱前者為再生產，後者為生產的消費。一切問題在前者是講到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在後者是講到生產消費與非生產消費。

其次，每個看來都是他者的手段，由他者來使之實現，在這裏表示出牠們的互相依賴性：成爲一種就兩者看來都互相關連而不可少，然而兩者又都保持其外表的關係。

生產創造消費之外表目的物的物質；消費就創造內在的對象，及生產之目的的欲望。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這個情形在政治經濟學中以多種的形式指劃(?)出來。

再其次，生產不僅直接的是消費，而消費直接的是生產；也不是生產是消費的唯一手段，而消費是生產的意願，這卽是每個以牠的對象來供給別一個生產，是消費的外部對象；而消費，又是生產的理想對象。但是牠們當中的每個不僅直接的含有別的一個，並且不(?)僅經過牠的手段而存在，而且牠們當中每一個自己完成，創造別一個，創造自己和別一個一樣(?)。只有消費完結了生產行

爲，給生產物以終結的行爲，這就破壞了生產物，粉碎了生產物之獨立的物質的形態；由於重複到熟練程度的需要，而加強能力去生產，加強生產第一次行爲中的發展，結果，這不僅是生產物由此而成爲生產物的結束行爲，也是生產者由此而成爲生產者的結束行爲，這樣，完成生產行爲。他方面，生產創造消費，產生消費的一定方法，更進，創造消費的能力如慾望如動機。在這第三點中所述的最後的同一性，在政治經濟學中，講供求關係，目的與慾望的關係，自然慾望與社會創造的慾望的關係上，有很多的討論。

於是，一個黑格兒學派把生產與消費並同起來，這是最單純的事。這不只是社會主義的宣傳作家如此寫，就是經濟學家例如賽（註十五）亦如此寫；後者主張假如我們認國家爲一整體，或人類爲 *in abstracto*（抽象體）——則她的生產同時就是她的消費。司托契（註十六）證明賽的錯誤，他認爲一國家并不消費她的全部生產物，而同時創造了生

產手段,固定資本等。此外把社會觀察爲單一主體,其意卽是用複雜的觀點來觀察社會這不過是理論上的觀察而已。對於單一的主體,生產與消費是一個行爲的不同的方面。這裏所要注意的要點是,假如生產與消費認爲是單獨的個人或分離的個人之活動,則牠們無論如何,不過是一個進程的各方面,在這進程之下,生產是實際的出發點,而且也是佔主要地位的一點。在需要或慾望性質內的消費本身,成爲生產活動的內部分子;但是後者是現實的起點,而且也是佔主要地位的一點——行爲,在這行爲中全部進程又重新開始。個人生產一定的貨物,到頭來他自己再把他消費了,但是他之出現是爲生產的,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於是消費成爲生產的質素。

可是在社會上,生產者對於生產物的關係,一到生產物完成了的時候,是一個外面的關係,而生產物之對這個人的關係,是有賴於他對別的個人的關係。他并沒取得對牠的直接占有。就是生產物

的直接占有。要是他在社會內生產，那末，生產品的直接佔有不是他的目的，同樣也是正確的。在生產者與生產物之間，分配躡進來了，分配在社會法則幫助之下決定生產者在生產物世界中應獲得的部分；這就是說，分配躡進了生產與消費之間。

是不是分配形成一獨立的範圍，與生產並列，而且在生產之外呢？

B. 生產與分配。通讀經濟學上普通的論文，沒有一個人不為這每樣事都有兩重性這回事所擊動，例如在分配之下，就有地租，工錢，利息，利潤這些名目；在生產之下，我們又看見有生產的要素的土地，勞動與資本。講到資本，就立刻明白牠的兩重性，第一，牠是作為生產要素，第二，牠是收入的泉源；利息與利潤，是決定分配的某種形式的一個原子；所以牠們在生產中還形成了這樣的東西，自己決定那些形式在其中增加和增長資本，那些形式結果就是生產本身的原子。為分配的形式之利息與利潤，認定資本是生產的要素。牠們是為分配

的方法，分配方法的先決條件就是生產的代理者的資本。牠們同樣是資本之再生產的形式。

工錢同樣正確地表現自身為僱傭勞動，當其在另一項目之下應作如此觀察：勞動在一種情況中為資本之代理者的一定性質，其出現於另一種情況中就為分配之形式。假如勞動不曾決定為僱傭勞動，則牠之參加分配(註十七)的態度，其出現就不會是工錢，如在奴隸勞動制之下的情況是。最後，講分配形式之最發展的地租，牠由土地財產取得牠的生產物的一部分，這指明是如生產之代理者的大地產，(正確說來，是大規模的農村經濟)，而并非指明是土地，如工錢之不能為勞動的先決條件一樣。所以分配之關係與方法，僅僅是生產代理者之相反方面。在僱傭勞動的形式內來參加生產之個人得到生產物的他的部分，即是以工錢的形式，得到這生產結果的他的部分。分配之分部與組織，是由生產之分部與組織來決定的。分配自身就是生產的生產物，這并不僅是以物質商品才這

樣說，因為只有生產的結果才可以分配，而且就論形式也是如此，因為參加生產的一定態度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即參加分配發生其下的形式。因此，在生產以內說及土地，與在分配以內說及地租等事，這完全是一個幻想。

經濟學家如李嘉圖，據說他是很深切注意生產的，實際上把分配看為政治經濟學的唯一對象，因為他們本能的（註十八）把分配形式，認為是生產代理者在一定社會中覓得表現的最清爽的形式。

對於單純的個人，分配自然成為決定其在他所生產的生產範圍中的地位，於是而提早生產之社會的規律。其開始，個人並沒有資本，沒有地產。自他出世，就由分配之社會進程，命定來作工錢勞動者的。但是其被命定來作工錢勞動者的這一個條件，就是因為有為生產之獨立代理者的資本與地產之存在。

從整個社會的觀點看來，分配似乎是以另一形式，以及我們說為前期的經濟事實，在提早生產，

決定生產。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間分配土地，這樣就建立了地產之(一)種分配與形式，而且決定了生產的性質；又或，他再轉變被征服民族爲奴隸，於是使奴隸勞動爲生產的基本。又或，一個國家，因爲革命，分裂大的莊田爲小的土地，由這個新的分配，就加進生產一個新的性質。又或，立法永保大家族的土地所有權，或分配勞動爲世襲的特權，而且在階級上固定起來。

在這一切情況中，牠們都是歷史的，牠們看來似乎不是爲生產所組織與決定的分配，而剛好相反，是由分配所組織與決定的生產。

在最淺易的分配概念中，後者之出現是生產物的分配，而再進到及宛如獨立的生產之範圍。但是在分配是生產物的分配這意義之先，第一，是生產的工具的分配，其次，何者爲同一關係之實際語意，分配按照各種生產中的社會成員的分配，（個人服從於一定的生產關係）。生產物的分配，主要的是這個分配的結果，那是與生產的進程一致的，

而且決定生產的各個組織。要把生產同包含在生產中的分配來分裂開，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反之，我們知生產物分配的性質，這時我們就給了本來形成生產質素之另一分配的性質。李嘉圖，認為他是把生產分析為近代社會所組織的，而且他是par excellence（最優的）生產經濟學家，因為這些理由，他宣言近代經濟學的本有的前題，不是生產而是分配。我們這裏有另一個這些經濟學家之無味的證據，他們把生產認為永久的真理，而斷送分配區域中的歷史。

在那一種關係裏面對於生產是決定牠的分配，這對於生產本身顯然是一個問題。如果說，生產是有賴於一定的生產工具之分配，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在生產之先，而且成爲生產之先備條件；那末，這個答案可以這樣講，生產在事實上是自己的先備條件及一般條件，這些條件形成自己的因子。這開始看來就有自然的根源。這些生產進程，牠們從自然的變爲歷史的，而且假如在某一

時代，牠們爲生產之自然的先備條件，那末在另一時代，牠們就成爲牠的歷史結果。在生產自身的範圍中，牠們是經常變革的。例如，機器的使用，改變了一個生產工具的分配與生產物的分配，而且近代大規模的土地所有權，都是近代工商業的結果，因爲在農業上也應用了機器。

一切這些問題，可以由最後的一例來解決牠們自己：一般的歷史條件是如何影響這個生產，而生產在歷史進程中又擔負的甚麼地位？這是顯然的，這個問題，只能在有關於生產之討論與分析上，才能提出。

然而，在這問題之提出的煩瑣形式中，牠們是可以簡單的答覆的。在一切的征服情形中，可以有三條出路。侵略民族可以把牠自己的生產方法加之於被侵略民族（如十九世紀時英國之對愛爾蘭，以及部分的對印度）；或者，那可以讓任何事物都保有原狀，以貢物來滿足自己（如土耳其與羅馬）；或者，這兩個系統互相影響而成爲某種新的，

一個綜合(這是德國侵略之一部分結果)。在這一切侵略上,這生產方法,或為侵略者的,或為被侵略者的,或兩者之合並而生的結果,決定這用來行使作用的新的分配。雖然後者現在出現為生產的新時代之先備條件,而在牠自身,是生產的生產物,不僅是屬於一般歷史的生產之生產物,而且是關於一定歷史時代的生產之生產物。如蒙古對俄國之蹂躪,其行為是依據於他們的生產制度,這個大而無限綿延之豐富的牧場,是主要的條件。日耳曼蠻族,其農業由奴隸之助力而進行,這是他們傳統的生產制度,而且他習於鄉村的寂居生活,能夠很容易的利用這同樣的條件征服羅馬各部,因為發生在那裏的地產集中,已經完全消滅了那陳舊的農業制度。有一個盛行的傳習,就是在某時期中,劫掠成為唯一的生活泉源。但是因為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以被劫掠的東西,就是要有生產(註十九)。而且就是劫掠的方法,也為生產的方法所決定。例如有很發達的仲介投機商人的民族是不能

像游牧民族一樣來劫掠的。

在奴隸制度上，生產工具是直接被劫掠的。但是在他的利益中，他被劫掠的這國的生產，必定是組織起來採用奴隸勞動，或（如在南美等處）應當創造適合奴隸勞動的生產形式。

法律在一定家族上可以永保生產工具，如土地之存在。這些法律只有在那個時候才取得經濟的重要性，即當着大土地制度是與流行於社會中的生產制度相融和的時候，例如在英國就是這種情況。在法國農業是以小規模進行的，雖然有大的莊田，所以後者結果是為革命所破滅了。但是立法如何想去永保這土地之分毫的析裂呢？就令有這些法律，土地私有又重新集中起來了。在鞏固分配條件之內，法律的影響，及其在生產上的勢力，是要由各個地方來決定的。

C. 交換與流通。流通僅是交換的一定的方面，或者可以說是在全部交換上。因為交換是生產與其依賴者的分配與消費之間之中介分子，而後

者又僅是生產的助成者，交換也主要的是生產的助成部分。

第一，這很顯然的，發生在生產範圍中的交換之能力與活動，直接是墮入後者的範圍，而形成牠的主要分子之一。第二，生產物之交換，是同樣的真實，因為牠是完成一定生產物的手段，即規定來直接到消費的。對於這個範圍，交換成爲包括在生產中的一幕。第三，所謂貿易者與貿易者（註二十）間的交換，是由生產所決定的牠的組織來行使的，而自身是生產力的種子。交換對於生產是獨立的與相等的關係，僅僅是在最後的階段上，即當着生產物直接交換來作消費的時候。但是第一，沒有一個不分工的交換，無論牠是自然的，或者是歷史條件的結果。第二，私人的交換，指證這個私人生產的存在；第三，交換的加強，以及其範圍與性質，都爲生產之發展與組織的程度所決定。例如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於是交換之出現，在牠全部看來，都直接的爲

生產所包括或決定。

這我們所達到的結果，就是不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牠們是并同的，而是牠們是一個整體的許多分子，一個單位的不同方面。生產所統治的在這名詞的反對方面，不僅是生產自己，而且有其牠的分子。這個進程，經常的以之重新開始。就是交換與消費不能成爲統治分子，這是很顯然的。同樣也可假設到生產物的分配方面。但是在分配爲生產代理者的一意義上，分配自身就僅是一生產的分子了。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消費，分配，交換的這些形式，以及這各分子的互相關係。自然，生產在牠的一方面的形式上，是爲其牠的分子所影響的，例如因交換範圍的市場之擴張，生產就發展爲大量生產，而且分裂爲更大的範圍。

因爲分配的變革，生產也會進行一個變革，例如在資本集中的情況上，城市與鄉村的人口之分配的變遷上，這等等。最後，消費的要求，也是影響生產的。各個分子間都發生互相的內部作用。這在

每個有機體，都是如此的。

三，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來考查一特定國家的時候，我們首先考查牠的人口，進而依照牠階級的分劃，城市，鄉村或近海的居住，各種產業部門的職業，來分析牠；於是研究牠的輸出，輸入，每年的生產與消費，物價等。這看來好像是正確的進行，開始於牠們所有的條件之真實的具體的方面；在政治經濟學的條件上，是要以人口為起點的，因為牠形成全部社會生產的基礎與主人。然而，再進一層的來考查，就發現是錯誤的了。人口是一個抽象物，假如我們離去了牠所包含的階級。而且這階級也是一句空話，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們所根據的分子，如工錢勞動，資本等。在他們方面，這些又指證出交換，分工，物價等。比如，資本要是沒有僱傭勞動，沒有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就不能成其為資本。所以假如我從人口出發，我就會得到一

個全部錯亂的觀念，只有用部分的定義的方法，我在分析才達到了更簡單的觀念；從概念內已知的具體現象，達於更空泛的抽象，那時我們得不着最簡單的定義。並且當着我就是在還原的路上旅行時，那時再也不會走到人口方面來，但是這時候已不是一個整個的錯亂觀念，而是一個有許多概念及關係的豐富的集體。前一種方法是政治經濟學在過去把牠採為起點的一個方法。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把生活集體的人口，民族，國家，聯合國家等，作為起點，但是牠們永遠是用這樣來結束的，即是用分析的方法做出一些一定的抽象的，一般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只要這些分散的分子一由抽象理論來多少的建立起來的時候，經濟系統就開始從簡單的概念，如分工，要求，交換價值，而進到國家，國際交換，世界市場。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的正確方法。具體的是具體的，因為那是許多不同目的的客觀物之集體，即相異分子之統一體。在我們的思想中，所以那看來

是一個綜合(synthesis)的進程,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起點,雖然在實際上牠是一個起點,同樣是觀察與概念的起點。由前一方法,這個純粹概念是入於抽象的定義,由後一方法,這抽象定義在理性的經過上,仍然回到具體物象的再生產。所以黑格爾之入於錯誤,是因為把真象認為自同的,自吸的,率性進行的思想之結果,而由抽象進到具體的方法,僅不過是一個思想的路程,由這路程才在我們心中,把握着具體,才再生出具體,如其為具體者。可是這不是具體本身發生的過程。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這就指明是人口之存在,人口在一定條件上,是與生產相連接的;這又指明是家族、血族,國家等之一定形式的存在。再沒有其他的存在了,除了一個已經決定的具體與生活集體之抽象的一方面關係之外。

反之,為一範疇的交換價值就引致一個洪水前期的存在。而且因為我們的哲學意識是這樣規定的,只有牠所相信的人的意像,在牠看來,才是

真實的人，於是牠所相信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牠誤會這些範疇對於生產真實行為的運動，（不幸的（？）是生產僅能從外面得到牠的動力，）牠的結果是世界；這是真的——這裏我們又是陷於贅言了——因為這具體的集體在思想的集體，思想的具體性的性質以內，事實上是思想與理解的產物；這個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是一個外於觀察與直觀之自發的概念的產物，而是一個觀察與直觀之精神的結果的產物。整體，——在頭腦內牠是能思想的整體——是能思想的頭腦的產物，頭腦以唯一捷便的方法在頭腦內部佔有整個宇宙，——這方法與宗教的，藝術的，實際的，精神的世界佔有的方法不同。真實的主體永遠停留在頭腦以外，牠的存在不是甚麼獨立的，並且就直到現在，頭腦對於真實的主體也只限於推理的和理論上的。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之下，這主體即是社會，應當把牠視為我們所從出發的前題。

但是，獨立歷史的或自然存在的簡單範疇，是

不是沒有先於更具體的麼？Ca, depend（這是獨立底）。例如，在他的法律哲學中，黑格爾正確的從所有權出發，以之為最簡單的個人的法律關係。但是無論那種所有權不存在於家庭或存在於統治與屈服的關係之前的，牠們固然是“更具體的關係”，所以更正確的說，家族或血族的存在，牠們只有佔有（posses）而無私有（own）。因此這個簡單的範疇，出現為原始的家族與血族的社會對於財產的關係。更早期的社會，這個範疇出現為發達的有機組織之簡單關係，但是這由之而引出所有權關係的具體實物，是總歸指證了的。一個人可以想到一個未開化的野蠻人，是佔有一些東西的。但是當時佔有是沒有法律關係的。要是說家族是所有之歷史進化的結果，這不是真實的事。而剛好相反，後者（所有）常是指明這“法則之更具體的範疇”的存在。可是在這中間留着一部分真理即是說簡單的範疇是那些條件的表示，在那些條件中，這不大發展的具體性可以實現到更多方面的關係或更

多方面的聯繫的確定，用那些條件的觀念的表示來役使具體的範疇，在那時具體性得到充分發展，就保持簡單的範疇為從屬的關係。

貨幣可以在資本，或銀行，或工錢勞動存在之前存在，而且歷史上實際的存在了。從這一方面，可以說，簡單的範疇可以認為是沒有發展的全體之主要關係，牠們在歷史上已經較之更發展的全體表現於更具體的範疇之先存在了。所以由最簡單到複雜的抽象思想的法則，與歷史的實際進程是相應和的。

在他方面，可以這樣說，這裏有高度發展的，但是在歷史上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高度發展的經濟形式，如協作，最進步的分工等，然而沒有貨幣的存在，例如祕魯。

在斯拉夫族公社，亦然，貨幣以及因而存在的交換，在分散的公社中，或者完全沒有出現，或者盡了不重要的作用，不過只在牠們的邊境上因互相的交通而有所出現；一般的講來，把交換認為

是在這個或那個公社中的成員間的原始的構成分子，這是錯誤的。最初交換在不同公社相互關係內出現，較之在這個或那個公社中的分子之關係間為多。進一步說，雖然貨幣在各種關係內就擔負了牠的任務，可是牠在古代出現為主要的成份，只是在一方面發展的國家，貿易國家，甚至在最文化的古國如希臘羅馬，牠得到牠的充分發展，——這個發展成為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先備條件——也只在這兩國崩潰的時期。於是這種簡單的範疇，在歷史上在最進步的社會關係之下，達到牠的頂點。就是牠沒有方法貫入(?)一切經濟關係以內，例如在羅馬帝國，在牠最發展的時期，租稅及以物代價是成為基礎的。事實上，貨幣經濟之充分發展只能在軍隊中是如此講，牠并莫有統及全勞動系統。

於是，雖然這簡單範疇在歷史上可以在更具體的之前存在，然而牠只能在複雜的(?)社會形式中，得到牠內部的，外部的全部發展，在當時更具體的範疇是在較低發展的社會形式中，得到牠充

分的發展。

勞動是一個極簡單的範疇。勞動觀念在這個勞動一般的意義上是又很古舊的了。可是經濟學上的“勞動”，卻是一個近代的範疇，有如創出這簡單抽象的關係一樣。比如貨幣制度在貨幣內很客觀的還把財富視為一個物體（註二十一）。比較這個觀點，這是一大進步，當其工業或商業制度把財富的泉源從對象轉變為主觀的活動，為工商業勞動的時候，可是這種活動本身和產生貨幣一樣是有限制的。重農派的體系看來還進步一點，就是牠把一定的勞動形式，即農業，認為是財富的泉源，而財富自身不在貨幣的假面具之中，不過認牠是一般的生產物，如勞動的一般結果一樣。可是，為具體的活動所限制的生產物依然是自然生產物。農業是生產的，土地生產更為卓越（*par excellence*）。把一切生產財富的活動的一定性推翻，把勞動放在這個地位上，既不是工業，也不是農業，商業，或這個那個，這是亞丹斯密的絕大的進步。對於創造財

富的活動的抽象的一般的了解，同樣就有了決定財富的生產一般，或勞動一般的了解，但是這已經和過去物質的勞動一般之了解一樣。這個轉變是如何艱難與偉大，證實亞丹斯密又從這條路上漸漸的退回到重農派體系上面。現在可以看見雖然這個總計僅僅為這最簡單關係找得抽象表現，很早以前，不論社會的形式如何，人就互相的入於這最簡單關係以為生產者了。從這一方面就是真的。從另一方面，就不是真的。

照無論那一種一定形式的勞動關係來假定勞動的實際形式之發展的集體性，從牠們當中沒有一個是更能統治的，這是沒有分別的。所以最普遍的抽象，只能在最高具體發展的條件中才發生，在發生此抽象的地方，“一個”同時就是“多個”，或為“全部的原子”。那時牠們只有在自己的特定形式中，中止思想的表現。在一方面，這種勞動的抽象體就是各種勞動過程之具體集體的結果。對於一定勞動之無分別的關係，是適應於一個社會形

式的，在這種形式之下，無論那一種勞動，對於牠們都是偶然的，並且沒有區別的。這裏一般勞動，不僅在範疇以內，而且在真實以內，變成一般的創造財富的方法，並且喪失自己同一定的個人的聯繫，這種事件的狀況，已經覺得牠的最高發展在最近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美國中。因此，這裏抽象的範疇“勞動”，“勞動一般”，勞動 Sans Phrase，這是近代經濟科學的出發點，首先就成為實際的真理。這樣，近代政治經濟學以之為起點的最簡單抽象，對於一切社會形式表現得很早而更實際的關係；在這個抽象內，實際上成為真理，即在於牠們成為近代社會的範疇。但是可以這樣說，在美國內是歷史上的產物——即對於一定勞動之無區別關係——其在俄國即為天賦的素質。但是第一，牠有很大的區別：野蠻人有能力適用於一切呢，還是文明人有能力適用於一切？此外，俄國人對於某特定勞動的關係之這種無區別性，實際上是使傳統的習慣適合於一定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外來的

影響把牠們從通常的習慣方面拋擲出來。

勞動的這個例子，很有力的證明就是最抽象的範疇，除去其適應於一切時代的適應性（這只因為是牠們的抽象性），牠們在這種抽象的一定性中是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且就是對於這些條件及在這些條件之內，牠們佔有全部的意義。

資產階級社會是生產之最高發展的與多方面的歷史組織。表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及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的範疇同時更洞察一切過去社會形式的制度和生產關係，牠就是從過去社會形式之廢墟與要素上建立起來的。一部分繼續牽連着不易克服的殘餘，一部分前所有的僅是提示，而現在是發展為完全的意義了。人的解剖是猿的解剖的鎖鑰。但是高級動物之對低級動物的提示，只有在這種場合以內，假如這高級組織的動物是已經知道了，這才能夠了解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是古代經濟的鎖鑰，亦然。可是那些經濟學家的方法并

不是甚麼真的，他們漠視一切歷史的分異，而只看見資產階級形式爲一切的社會形式。一個人在知道了地租性質之後，他就會瞭然於人頭稅，什一稅等的性質。但是不能說牠們是一樣的。

所以，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對立分子之發展結果的一個形式，那末一些屬於前社會形式的關係在這裏面是常常看見的，但是在一種畸形的狀態，或者是從前牠們自己的遺跡，如公有財產。所以如果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在自身內包含了對於其他一切社會形式的真理這是真實的話，那末這個說法必須認爲是 *cum grano salis*。牠們可以包括這些於一發展的，或畸形的，或諷刺畫的形式內，就一切場合言，是包含於生存變化的形式中。所謂歷史發展就是講到這個的最後分析，即是後來的形式，牠觀察先前的形式爲走向牠自己的一個階段，而且永遠是了解牠的一方面，因爲牠是很少有的，只有在一定條件之下，那才能夠自我批評的；自然，我們在這裏並沒有講這一類歷史時代，

牠之出現於自己的同時代是崩潰的時代。基督教之能達到客觀的了解過去的神學，只有當牠到一定限度的自我批評，即所謂 *dynamei* 的時候。同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來了解封建的，古代的，東方的各社會的時候，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評就開始了。因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並沒有純粹(?)把資產階級制度合致於過去的這個神話，依然在發動戰爭來反對牠的封建制度的批評，殆相同於基督教對異教的批評，或新教對加特力教的批評。

研究經濟的範疇，與在每個歷史科學，社會科學中一樣，必定要記着，實際上如此，所以我們心中也要如此，這個主題，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中是一定了的，這個範疇所以就表現實際的形式，生存着的條件，而且常常祇是這一定社會的這一主體的個別方面；所以政治經濟學的本源之為一科學，並不是從認政治經濟學為科學那時候起。這種思考應有這樣的態度，因為這一科學要立即給對象

的分類以明確的指示。

例如，從地租寫起，從土地財產寫起，這看來是再自然沒有了，因為必然要從自然寫起，這是一切生產，一切存在的泉源，而且還要從多少是決定的社會生產的第一形態，即農業寫起。但是那也就是再錯誤沒有了。每一個社會形態，有一定的生產部門，牠優越於其餘的生產部門，所以牠的條件決定一切落後的地方及影響。

這是普遍的光，一切其他的顏色沉溺在這普遍的光裏就改變牠們的特性。這是一個特別的以太 (ether)，決定出現在牠裏面的各種東西的特殊重心。

我們且舉游牧民族為例（從事漁獵的民族是開始實際發展的出發點）。在他們那裏可以看到一定形式的農業。土地私有權零散地為這些所決定。牠是集體的，而且多少保存這個形式，依這些民族所有之範圍而定；例如土地私有權之在斯拉夫人中。民族有定居的農業的地方——定居狀態是一

大進步——農業是統治的產業，如像在古代社會，在封建社會，甚至製造工業及其組織，以及關於牠的財產形式，都多少帶有土地私有權現行制度之特質；於是社會就或者完全依賴農業，例如古代羅馬，或者如在中世紀的城市組織中一樣，摹仿流行於國內的積累的關係。資本，還不成其為純粹貨幣資本時，在傳統工具形式中，在中世紀也有這土地私有權的性質。

反之，在資產階級社會內，農業愈加變成爲僅僅是一個產業部門，而且完全爲資本所統治。地租更是一樣。在一切土地私有權是流行形態之社會形式中，自然關係統治着。在資本統治的社會，那流行分子就是爲社會所歷史的創造的。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完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是統治資產階級社會之一切經濟勢力的。牠應當成爲起點與終點，而且要在土地私有權發展之前，先被發展。在每個分別的考察過後，必然要分析牠們的相互關係。

把經濟範疇照這樣來排列，就是依其歷史經過之決定分子的次序，這必然是不適用而且錯誤的。反之他們的連接次序，要受牠們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之互相所受的關係，及恰反於所見之自然次序或歷史發展的次序之關係的決定。我們感興趣的，并非經濟關係在各種社會形式的歷史接續中所占的地位。在歷史過程中僅是個朦朧(?)概念之“觀念的”(蒲魯東)接續的次序，我們也是很少興趣的。我們所有興趣的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有機的關係。

這個尖銳的劃界線(抽象的一定性)，牠很顯然的分別古代的貿易民族如 Phoenicians 及 Carthaginians，是農業民族佔優勢。資本之為貿易資本或貨幣資本，其出現是抽象的。即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之主體分子的地方。Lombardians 同 Jews 在中在紀的農業民族中占同樣的地位。

更進一步來證明這個事實，就是同一範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中發生不同的作用，我們可敘述

如次：資產階級社會最近形態之一的股份公司，這在公司開始之時，牠就是大的核准獨占貿易公司的形式。

不可見的形成於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心中，而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依然部分的繼續保留着的國民財富的觀念，僅不過為國家而生產的財富的觀念，不過國家之權力依賴財富而已。然而那是無意識的偽善的形式，財富在其中宣稱自己及自己的生產是近代國家的目的，把國家認為僅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研究的次序大要的可如下所述：第一項，一般抽象的定義，多少可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但在如上所陳的意義中。第二項，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組織及成為主要階級之基礎的範疇。資本，僱傭勞動，土地；牠們相互的關係；城市與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及牠們間之交換；流通，借貸（私人的）。第三項，資產階級社會統一在國家形式內；其對於該社會自身之關係；“非生產的”階級；租稅；公債；社會

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第四項，國際的生產組織；國際的分工；國際的交換；輸入，輸出，匯兌率。第五項，國際市場與恐慌。

四， 生產，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與交通工具
在對於生產關係與交通工具
的關係以內底國家及財產的形式
式
法律關係
家族

有關於此諸點之記錄，敘述於此，切勿略去
(註二十二)。

1. 戰爭在和平之先，得到完全的發展；那嗎一定的經濟現象，如工錢勞動，機械等，在較早於資產階級社會的時期，經過戰事與在武裝中，是如何發展的。生產力同交通工具間的關係，尤其顯然

的，是在戰爭中作成的。

2. 歷史上先前的心理方法對於實際方法之關係；即所謂文化史殆爲一宗教與國家之歷史。

在這方面可以說在寫歷史的時候，是有各種不同的方法。所謂客觀的寫法。主觀的（道德及其他的）。哲學的。

3. 第二階段的與第三階段的。一般的生產，是已經被移植了；不是原先的生產關係。這裏要講國際關係的作用。

4. 對於這個觀察之唯物性的反對。牠對自然唯物論的關係。

5. 生產力（生產手段）與生產關係之辯證的概念，辯證的範圍是要決定的，牠並沒有廢去實在的分歧。

6. 例如物質生產的發展與藝術的其間的不平均關係。一般的，進步的概念，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中，並沒有的。如藝術等問題方面，要了解這不平衡，并不如何重要與艱難，有如實際社會關係之

不平衡的那樣，例如美國教育與歐洲教育的關係。可是實在的難點，在這裏要討論的，是把生產關係之不平(?)的發展認為是法律關係的這點。例如羅馬民法（對於刑法，公法的關係較少）與近代生產的關係。

7. 這種意見是發展之必然結果，可是法律的承認是偶然的。Varia, (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在歷史中不常是出現為世界史的結果。

8. 自然，出發點跟着就採取了自然的條件，主觀的和客觀的，血族的，種族的等等。

相對的講，藝術的顯著，即一定時期藝術的燦爛，並沒有與一般社會發展站在直接關係上，也沒有同後者的物質基礎及其組織之骨幹上，站在直接關係上。例如希臘與近代國家之比較，或與莎士比亞之比較。相對地講，有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那要承認藝術在牠自己的形成世界歷史時期的全盛形式中，被創造出來，僅僅祇有在固有的思想內開始藝術的創作；因此，在藝術的王國中，藝術之

一定的重要形式，只有在比較低級的藝術發展的階段才有可能。如果在藝術的王國中，在藝術之不同形式的互相關係中有其地位的話，如果我們假定藝術的範圍對於社會一般發展之關係是整個的，那末這種情境至少是應當產生的。只有把這些矛盾一般的表現出來，是很困難的。他們特殊化了，牠們就要被解釋出來。我們且舉例如希臘藝術對我們這時代的藝術的關係，莎士比亞時代的藝術對我們這時代藝術的關係。這是很顯然一個事實，希臘神話並不僅是希臘藝術的兵工廠，而且是藝術的發源地。在摩托機械，鐵道，蒸汽機，電報的時代，要形成希臘幻想與希臘藝術之自然的與社會關係的觀察難道是可能的嗎？難道把Vulcan (註二十三) 和 Robert 公司；Jupiter (註二十四) 和發光體；Hermes (註二十五) 和借貸 Mobilier 放在一塊嗎？一切神話在幻想中，在幻想的幫助之下，來屈服和形成自然力，牠才可以得勢。一到在後者的上面有了實際的統治的時候，牠就消滅了。在 Printing

的Hovsesquare (註二十六) 的有效性之下, Goddess美Fame將成爲甚麼? 希臘藝術的前題是希臘神話材存在, 即自然甚至社會形式, 都在一個無意識的自學形式之昭著的幻想中生長出來。這就是牠的的料。可是, 不是任何神話, 也不是任何自然(包括然下之一切事物, 社會自然在內)之無意識的藝術的作品都如此。埃及的神話絕對不會是發生希臘藝術的耕地或胎孕。但是無論如何牠總算是一個神話。這樣的社會的發展, 牠排除對自然之任何神話的解釋及任何神話的態度, 牠需要藝術家脫離神話的幻想, 希臘藝術是不會發生在這種社會內的。

從另一方面來觀察: Achilles (註二十七) 同火藥與子彈一齊是可能的嗎? 或 Iliad (註二十八) 同印刷及印刷機是適合的嗎? 難道不消滅物語, 詩歌, 神曲, 而敘事詩的實在而必要的前提和定期刊物的傳說能夠在一塊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了解希臘藝術與史詩和一定的社會發展形式的聯繫。困難是在於要了解牠們

依然繼續供給我們以藝術的享受，而且在一定的思想以內，保有着標準的與很難達到的形式之意義。

一個人再不會變爲小孩子，這不是笑話。但是難道他沒有享受小孩子的天真爛漫性嗎？難道他不應當傾向於在較高的階段上去再生產牠的真理嗎？難道在小孩子的天性內，在每個時代內，不去復生其本有的性質在他的永久藝術的真理內嗎？爲甚麼人類社會的兒童期，牠發展了最美麗的，不應當對我們佔有一個永久的魔力，有如一個永去不復返的階段呢？有教養差池的兒童，有成就很早的兒童。許多古代國家就是屬於這個範疇的。希臘是模範的兒童。牠的藝術對於我們所有的誘惑並不與藝術所從出的未發展的社會制度之主要性質相衝突。反之，藝術是牠的產物，並且不斷地與這不成熟的社會關係相聯繫，在這社會關係內藝術發生了，而且祇能在這中間發生，永遠不會再發生第二次的。

(註一)這個導言是第一次由考斯基在1938年三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分載於“新時代”週刊的，他有下列的說明：

“本文是在馬思克的遺稿中發現出來的。這不過是作為他的大著作的導言之論說的大綱，那是寫了許多年辰而綱領在他心中是很清楚的。這個草稿注明是1857年八月二十三日。因為是觀念，僅僅寫成初稿的句子，我所介紹在這裏的是變動了格調與改正了字句的。因為僅僅付印原稿是不聰明的一件事。不是原稿上一切字都對的。

“對於改正的必要，是莫有疑感的，我沒有在原稿上有所塗抹，而只是在旁面註明那些錯誤。我不能決定我可以改正一個正確的字句時，我在牠的後面，總加上一個問號(?)其他的改正，都特別註明。在其他的觀點上，這是原稿的正確的覆印，他的初稿不全的文字對於我們是太痛苦的來了解這馬克思而入於墳墓的思想寶庫了，假如馬克思不早離人世，而還能夠給我們以他的觀念，一直到他從每個可信的觀點上，再考驗了牠們與給牠們以不可改易的文字之後，這個寶庫是足夠後代人的研究的了。然而雖然這是初稿性質，其給我們的新的觀點，也非常豐富了。”——英譯本註；

(註二) 斯密司(Smith, Adam 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開創者。

(註三) 李嘉圖(Ricardo 1772—1823)英國經濟學家。

(註四)魯濱孫 (Robinson) 爲小說魯濱孫游記之主人公, 漂流於一孤島上, 獨自度其生活, 言經濟者多以之爲個人獨立經濟生活之模範。

(註五)盧梭 (Rousseau 1712—1778) 法國哲學家, 教育家, 其名著爲“民約論”(中國嚴又陵有譯文), “愛彌兒”兩書。

(註六)司圖阿(Steuart)。

(註七)巴士夏(Bastiat)。

(註八)卡勒(Carley)。

(註九)蒲魯東(Proudhon)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 其名句爲: “財產是盜賊”。

(註十)蒲耶麥賽(Prometheus)。

(註十一)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3—1873), 英國哲學家, 經濟學家。

(註十二) 洋記 (Yankees) 指美國人。

(註十三) 分配, 按原稿作人 (Person)。——英譯本註。

(註十四) 消費, 按原稿作生產 (Production)。——英譯本註。

(註十五) 賽 (Say)。

(註十六) 司托契 (Storch)。

(註十七) 分配, 按原稿作生產 (Production)。——英譯本註;

(註十八)“本能的”(Instinctive) 德文原稿作“構成的”(Instruktiv), 疑是Instinktiv(英文 Instinctive) 之誤——英譯者註。

(註十九)參看資本論(紐約Humboldt版)第三十四頁附註一:“巴士夏是真滑稽的,他幻想古代希臘羅馬是以劫掠為生的。但是人民劫掠了這樣久的年代,但是一定要東西來被劫掠才行;劫掠物,一定經常的繼續生產出來”。——考斯基註。

(註二十)馬克思顯然在心中有一句亞丹斯密可在“原富”第二卷第二章中說的話,他說一國的流通,包括兩個顯明的部分:貿易者與貿易者間的流通,貿易者與消費者間的流通。貿易者在這裏不主要是指一個商人或店主,並且指一生產者——考斯基註。

(註二十一)這裏在原稿上有兩個字不大明白,好像是“Ausser sich”(Outside of itself)——考斯基註。

(註二十二)以下八節為馬克思之“註記”(Note),極為簡略,我在翻譯上非加說明,不能明顯,茲附德文於下,以便讀者(中文本排德文不便,未照英譯本辦法——氓)——英譯本註。

(註二十三)Valcan, 火神,擬與希臘火神(Hepheastus)為一,并譯之為Venus之夫。

(註二十四)Jupiter, 古時意大利之天神,與希臘之Zeus相同。

(註二十五) Hermes, 爲Olympian之神, 爲 Zeus 與 Maia 之子。

(註二十六) 倫敦“泰晤士”(Times) 報館所在地。

(註二十七) Achilles, 荷馬敘事詩之篇名。

(註二十八) Iliad, 荷馬敘事詩之篇名。

四

資本積蓄的歷史傾向

資本積蓄的歷史傾向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節)

資本的原始積蓄，即資本的歷史的起源，究竟達到甚麼結果呢？因為牠不是由奴隸，農奴成爲工錢勞動者的直接轉化（僅是一個外表的變遷），牠的意義不過是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那就是說消滅了根據於勞動所有者的勞動之私有財產。

與社會財產或集團財產相對立的私有財產，其存在只限於勞動工具與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財產的性質，要看這私人是勞動者或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這許多的暗影，

最初看來，好像是從私有財產顯映出來的，其實僅僅是存在於兩極端間的各種中間狀態的反映。

勞動者生產工具之私有，是小工業的基礎；而小工業又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與自由個性之發達的必要條件。自然，這種生產方法，在奴隸制度中，在農奴制度中，及其他附屬關係中，都可以看見的。但是牠要在勞動者是運用自己的勞動工具的自由私有者這個地方，就是只有在農民執有自己的耕地的時候，手工工人執有為一個專門職業者所用的工具的時候，才能夠興旺，才能夠發揮盡致，才能夠獲得牠適當的模範的形態。

這種生產方法，必須先要有一種土地的分散，與生產工具的分散執有。正如牠拒絕把生產機關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所以牠就拒絕合作，生產過程中的分工，自然力的社會統制與支配，以及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牠對於生產與社會祇適宜於狹隘的範圍，這範圍是自然生長的結果。想永續這種範圍的存在，那簡直就是拍蓋爾 (Pecqueur) 所說

的，是“永續普遍的凡庸主義的施行”。發展到某一程度，這種生產方法就將影響其自身之崩潰的物質條件引入世界。於是在社會的胸腹中，就孕育了新的力量與情感，牠們就要覺得這種生產方法是一個桎梏。牠必定要被破壞的；牠是被破壞了。牠的這種被破壞，即私人的分散的生產機關，轉形為社會的集中的生產機關，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形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從土地，從生活資料，從勞動工具上，剝奪廣大的人民羣衆，——這種對民衆之恐怖的，酷刻的剝奪——就成為資本史之序幕。這個序幕中包含了許多連續的暴力手段，這我們已經考察過的，就是這劃時代的資本之原始的蓄積。用殘酷的蠻行來完成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削；而且在極醜，極惡，極賤，極劣的慾念的衝動之下。自食其力的私有財產，即可以認為是根於孤立的，個人的，獨立的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之結合的私有財產，即被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所驅逐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以剝奪別人的勞動而存在，這勞動，在表

面的意義上是自由的。

及到這種轉形過程，從頭到底把舊社會充分的分解了；及到勞動者已經變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是資本了；及到資本家生產方法能夠站穩自己的足跟了——這下勞動的更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成為社會利用的（即共同利用的）生產機關之更轉化，就取新的形式，而這種生產機關是暗示私有者之更進的被剝奪。現在所被剝奪的，就並不是自營的勞動者，而是榨取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種剝奪的完成，是由於資本家生產的內在法則，即資本集中的作用。一個資本家，總是要擠下許多他同流的資本家。繼續不斷的這樣的集中，就是說少數資本家剝奪多數資本家，勞動進程的合作形式，就發展到一個從所未有的限度；於是我們就看見一種立意應用科學來增進技術的生長的趨勢；土地是更有方法的來耕種；勞動工具是取一種合力才能使用的形式；生產機關是由聯合使用，

社會化勞動，來經濟化了。全世界人民都墮入世界市場的網羅，所以資本制度愈見趨於取國際性。於是大資本家（他們橫領，獨占這一切轉化行程的利益）的人數就是經常的減少，而相應而生的就是廣大羣衆的貧困，壓迫，奴役，墮落，榨取的增加；同時卻有勞動階級的反抗之堅決的強度——這一階級的人數是日益增加的，並且爲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機械進程所紀律化，統一化，組織化。這生產方法是與資本家獨占相依爲命的，現在牠反成爲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機關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證明牠們不再適合於牠們的資本家外殼的一點。外殼爆裂了。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葬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緊接資本家生產方法的資本家剝奪方法，結果爲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是根據於私人勞動的個人私有財產之第一次的否定。但是在自然律的剝奪性中，資本家生產又作出了牠自己的否定。這就是否定的否定。這第二次否定並沒有重建起私

有財產。但是在資本家時代的獲得物的基礎上，重建了個人財產。這獲得物就是合作，土地公有，勞動自己生產出的生產機關的公有。

根據於個人勞動的分散的私有財產，轉化為資本家財產，比起資本家私有財產（事實上這已經根據於社會的生產方法）轉化為社會財產，這自然是一個更長期的過程，更殘酷，更困難的過程。前者，我們是講的少數獨占者對民衆的剝奪，後者，我們是講的民衆對少數獨占者的剝奪。

五
蒲 魯 東

蒲 魯 東

(摘自“神聖家庭”第四章第四節之
“批評的註釋”之第一，第二兩分節中)

在每種政治經濟學中，批判的首先的步驟是必然地要牽及到所要辯論的那一種科學的種種假定，所以蒲魯東的“甚麼是財產？”(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這部書，正是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去批判政治經濟學的一部書。因為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構成本書的興趣的主題，我們在這裏就不必去研究書中的從法律的立場去批判法律的那一部分。所以蒲魯東的書，科學地說來，是被政治經濟學的批評派，甚至為蒲魯東所相信的政治經濟

學的批評派所超越了。這個批判的工作只有由蒲魯東自己才可使之成爲可能，正因爲蒲魯東的批判有重農學派對重商學派的批判，亞丹斯密對重農學派的批判，李嘉圖對亞丹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葉聖西門等等的勞績做其批判的前例。

政治經濟學的一切發展都是以私有財產做大前題的。這個根本的假定是被牠視爲一種不能攻擊的事實，無須再要證明的（天經地義的）事實，而且對於這種事實，如塞伊（M. Say）所坦白地承認的一樣，牠（政治經濟學）也只有機會時偶然地提說一下而已。

現在蒲魯東把私有財產——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拿來作一個批判的檢閱，這個批判的檢閱真是第一決定的，嚴刻的，而同時又是科學的分析。這成就了他所作的偉大的科學的進步，一個革了政治經濟學的命的進步，首先使政治經濟學有成爲一種真正科學的可能的進步。

蒲魯東的“甚麼是財產？”這部書對於近代的

政治經濟學的重大意義，正如西逸氏 (Siéyès) 的“甚麼是第三階級？”(Qu'est ce que le tiers état?) 那本小冊子對於近代的政治學的重大意義一樣。

假若蒲魯東不把私有財產的各種範疇，例如，工錢，貿易，價值，價格，貨幣，等等，看作只是這樣的一些範疇，而把政治經濟學的這些範疇用作反對政治經濟學的武器，這却是完全合於他的立場的，如上文所敘述的與歷史所證明的一樣。

政治經濟學承認私有財產的關係爲人性的，合理的關係，這對於牠的根本假定——私有財產——就立下永久的矛盾，這一個矛盾，恰似神學的矛盾一樣，神學常常對宗教的觀念給以“人間的”解釋，因而就常常違反牠的根本假定——宗教之“天堂的”性質。因此，在政治經濟學中，工錢，在開始時，好像是勞動之在生產物中的比例的應得部分。工錢與資本的利潤是最友愛的顯明的人類關係存在着的，是互爲扶助而存在着的。結果呢，牠顯露出來，牠們是站立在最敵對的，顛倒的，彼此

相向的關係中的。在開始，價值儼然是由商品的生產成本及其社會效用，在一種合理的原則上決定的。結果呢，牠顯露出來，價值是一種純粹的偶然決定，這種偶然決定與生產成本或社會效用全然不必有甚麼關係。工錢的數量開始是自由勞動者與自由資本家之間的自由契約決定的。結果呢，牠顯露出來，勞動者是被逼迫着讓他的工錢數量去由人家決定，正如資本家被逼迫着要把工錢數量儘可能地定低一樣。“強制”代替了締約雙方的“自由”。這同樣的觀察也可適用到商業及政治經濟學的一切其他關係。政治經濟學者有時也偶然覺察到這些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就形成了他們的相互爭辯的主要內容。可是，當他們充分地意識着這些矛盾時，他們只對於私有財產的某一部分的表現去加以攻擊，如說“工錢的贗造者”(Falsifier of wages)，說工錢自身是合理的(即是照他們對於工錢所構成的觀念，工錢就是合理的，下同)；或“價值的贗造者”，說價值自身是合理的；或“商

業的贗造者”，說商業自身是合理的。因此，亞丹斯密偶然地攻擊過資本家，特拉塞(Destutt de Tracy)偶然地攻擊過錢商(Money-Changers)，西司芒底(Simonde de Sismondi)偶然地攻擊過工場制度，李嘉圖偶然地攻擊過土地私有，而且差不多一切政治經濟學者都這樣攻擊過把財產看作僅是消費貨財的非產業的資本家(Non-Industrial Capitalists)。

所以，有時候，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的現象(Economic Conditions)蒙上一種人道的假象(Human Semblance)，那就是說，當他們要攻擊一種特殊的虛妄的時候；但是在另一時候(這種情形最多了)，他們又以極嚴格的經濟的意義來解釋這些經濟現象，特與人道現象相區別。他們不自覺地在這種矛盾當中搖擺着。

現在蒲魯東斷然把這種“不自覺”給了一個最後的結束。他認真地觀察那曾被給予經濟現象的人道假象，而又把牠拿來與經濟現象的非人道的

現實 (Unhuman reality of economic conditions) 尖銳地對立着。他莊重地接受政治經濟學者所加於經濟現象的人道的華彩，而又把牠與經濟現象的非人道的現實嚴刻地相比較。他要求把這些在空幻中的現象放在現實中來。換句話說，應該把由這些現象所形成的一切觀念放棄了，而承認牠們的真實的非人道性。所以，在私有財產的最普遍的方面把牠很清楚地表現為是“經濟關係的贗造者” (Falsifer of economic relations)，而不是像許多其他政治經濟學者一樣，只部分地攻擊這一種的或那一種的私有財產，——在這一點上，蒲魯東是很一致的。凡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去批判政治經濟學之所能完成的，他都完成了。

自今以前的一切政治經濟學是以私有財產運動所誇張着為國家創造的財富做牠的出發點，為的是要達到牠的擁護私有財產的結論。

蒲魯東是從相反的方面出發的，這相反的方面，在政治經濟學中被詭辯地，似是而非地掩蓋住

了，就是說，他從爲私有財產運動所創生的窮困出發，爲的是要達到他的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對於私有財產的第一個批判，自然是爲一種把牠的本質體現在最顯著的最紛擾的形式中的現象，體現在直接違反人類情感的形式中的現象——即窮困的現象，所激動的。

蒲魯東的批評家們不能否認蒲魯東也覺察到了窮困這事實與財產這事實之間的內在的聯繫，因爲他曾主張由這個聯繫去消滅財產，以便消滅窮困。蒲魯東所成就者，還多於此。他曾詳細地證明資本的運動如何創造出貧困。他方面，蒲魯東的批評者沒有入於這樣的瑣碎。他們只覺察到窮困與私有財產是對立的：這是很顯然的事。

無產階級與財富是兩個“反”(Antitheses)。牠們這樣構成了一個整體；二者皆是私有財產世界的表現。所要考量的問題是二者在此“反”中所佔的特殊地位。把牠們說爲是一個整體的兩面，不是一個充分的解釋。私有財產之爲私有財產，之爲財

富，不得不保持牠自己的存在，且隨之要保持其“反”的存在，即要保持無產階級的存在。自滿自足的私有財產，是這個“反”的積極的一面。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即以其為無產階級之故，不得不要取消其自身。且隨之要取消私有財產——牠的關係的“反”(Conditioned Antitheses)，即是這個關係的“反”才使牠成為無產階級。

牠就是這個“反”的消極的一面，是“不安靜”的內在源泉，分解了的與正在分解的無產階級。

佔有階級與無產階級代表同一人類的“自我疎離”(Self-Estrangement)。但是佔有階級感覺得十分滿意於這種“自我疎離”，因為牠知道牠自己的權力即寄住在這種疎離中，而且即在那裏，佔有了人類存在的形態；無產階級感覺到牠自己是被這個疎離破壞了，而且即在這個疎離中看到自己的微弱與“非人類存在”的現實。

所以，在此“反”中，私有財產的所有者是保守的黨，而無產者是破壞的黨。維持這個“反”的行動

是由前者出發，破壞這個“反”的行動是由後者出發。私有財產，從其民族的（或國家的），經濟的運動的觀點看來，自然是要繼續不斷地被驅迫着走向牠的死滅，但是僅僅被一種不自覺的發展所驅迫着，這種不自覺的發展是不受牠的支配的，是反對牠的意志而存在着的，而且是被事物的自然所限制着的；——那就是說，僅僅被創出了所以為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意識着自己的物質的精神的貧困的貧困，意識着自己的腐化的腐化了的人性因而與之相奮鬥……即被這種種所驅迫着走向牠的死滅。

無產階級完成了那私有財產由創生了無產階所懸而未決的“懸案”，正如牠完成了那工錢勞動由創造了無關於己的富裕及其自己的不幸的命運所懸而未決的“懸案”一樣。假若無產階級勝利了，牠不是由此勝利而遂成為“社會的絕對的一面”（Absolute side of society），因為牠僅僅由取消牠自己及牠的敵對者才能勝利。無產階級及其“關係

的敵對者”(Conditioned opposite)——私有財產，
就這樣被消滅了。

六

法蘭西唯物論

法蘭西唯物論

(“神聖家庭”第六章第三節D項)

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啓蒙運動，尤其是法蘭西唯物論，不僅是一個對既成的政治組織，對既成的宗教與神學之鬥爭，而且相等的是——一個對一切形而上學，尤其是對笛卡兒(註一)麥爾伯蘭基(註二)，斯賓諾莎(註三)，李布尼(註四)的形而上學之公開直切的鬥爭。形而上學在哲學當前，恰如第一次決定立起來反對黑格爾(註五)的費爾巴黑(註六)之以莊嚴的哲學，來反對沉醉的冥想一樣。被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啓蒙運動，尤其是法蘭西唯物論所驅出

的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於十九世紀時，在德國哲學上，尤其是在冥想的德國哲學上，經受一個勝利的，鉅大的恢復。

在黑格爾以誠實的態度，把牠同一切後來的形而上學與德國的唯心論合併起來，並且建立一個形而上學的世界的王國之後，對冥想的形而上學及一切形而上學之攻擊，又與十八世紀時對神學之攻擊有同樣的意義。形而上學結果屈服於唯物論，唯物論現在因為思想的工作而成爲完備的，並且與人文主義是合致的。

法國，英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表在實際的範圍中合致於人文主義的唯物論，恰如費爾巴黑，在理論的範圍中，代表牠一樣。

法蘭西的唯物論有兩種趨勢，一種的根源是從笛卡兒來的，另一種是從洛克（註七）來的。後者在法國文化上是很標著的一個分子，而且直接轉入社會主義。前者，即所謂機械唯物論，是被吸收入法國的自然科學中。直接從笛卡兒來的法蘭西唯

物論，在我們不過是像看待法蘭西牛頓（註八）派及一般的法蘭西自然科學一例看待。

只有這是須要說明的。笛卡兒在他的物理學中，以自創力附屬於物質，而就想像機械運動是牠的活力行爲。他把他的物理學完全從形而上學中分離出來。在他的物理學中，物質是唯一的實體，唯一的存在與知覺的基礎。

機械的法蘭西唯物論，吸收了笛卡兒的物理學，而拒絕他的形而上學。他的學生在職業上都是反形而上學者，即是說他們都是物理學者。

這一學派由李魯易博士（註九）開始，至卡白尼博士（註十）達於頂點，而以納梅泰博士（註十一）爲中心。還在笛卡兒生存時，李魯易就把笛卡兒派的動物機構說引到人類靈魂上來，並且說明靈魂是肉體之一種形態，觀念是一種機械的運動，與十八世紀時納梅泰的解釋一樣。李魯易甚至相信笛卡兒是隱諱了他的真意的。笛卡兒卻抗議這個說法。十八世紀之末，卡白尼在一著作名“物理與人類

道德之比較”(註十二)上完成了笛卡兒派的物唯物論。

笛卡兒派唯物論之在法蘭西的存在，一直到現刻。牠在機械的自然科學中得到很大的成功。

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尤其是在法國為笛卡兒所代表的形而上學，從牠出生那時候起，就有了牠的敵對者的唯物論。這位敵對者之人物的出現於笛卡兒之前的是伽桑狄(註十三)，這位伊壁鳩魯派唯物論之復興者。法，英唯物論總是與德謨額利圖(註十四)及伊壁鳩魯(註十五)維持親切關係的。

笛卡兒派形而上學又在英國的唯物論者霍布士(註十六)遇見敵對者。伽桑狄同霍布士死後很久，當他們在法國各學派中成為官場的勢力時，那時候他們方戰勝他們的反對者。

福耳特爾(註十七)曾經說過，十八世紀時法國人對於哲蘇派(註十八)與吉生派(註十九)之爭辯的冷淡，與其說是因為哲學的，勿寧說是因為羅(Law)

的財政投機。所以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之被顛覆，可以由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學說來解釋的，只因爲這種理論運動，由那時法國生活的實際形式，自身就可以說明了。因爲這種生活直接趨於目前，趨於人世的享樂同利益，趨於塵俗的世界。反神學，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理論，是必然要相應於牠反神學，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實際。在實際上，形而上學是失掉了一切信用的。這裏，我們簡單的指證出這個理論運動的經過。

十七世紀的時候，形而上學已經滲入了實證的，人世的內容（如笛卡兒，李布尼等）。牠是在數學，物理學及其他好像是屬於牠的一定科學中去找發現，但是在十八世紀開始時，這種假象就破壞完了。實證的科學都從牠分離出來，並且開闢了自己的領域。全形而上學王國中所包括的，不過是幻想的人物與冥渺的事情，而真實的人物與塵世的事情便開始集中一切利益於自己的身上。形而上學就淡而無味了。十七世紀法國最後的大形而上

學家們，麥爾白蘭基與阿諾(註二十)死的那年，就是愛爾法修(註二十一)與康的亞克(註二十二)出世的那一年。

理論的破壞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的信用的，及一般的一切形而上學的人，是皮爾·貝爾(註二十三)。他的武器是懷疑論，這是由形而上學自身的魔術公式鍛製出來的。他把笛卡兒派的形而上學作為他直接的出發點。恰同費爾巴黑一樣，為反抗冥想的神學，被逼而去反抗冥想的哲學，因為他在冥想中看見了神學的最後支持者，因為他不得不強制神學家由虛偽的科學退回到未成熟的，討人厭的信仰，所以對宗教的懷疑，使貝爾更懷疑到支持這種信仰的形而上學。結果，他把形而上學的整個歷史進化，都加以批評。他成為形而上學的歷史家，以便寫形而上學的滅亡史。此外，他指證斯賓諾莎與李布尼的錯誤。

貝爾不僅是由形而上學之懷疑的分解，準備了在法國接受唯物論與健全的普通科學之哲學的

道路。他宣布無神社會不久就要會存在的，因為一個公然的無神論者的社會是能存在的，因為無神論者能夠是一個誠實的人，因為人之墮落，非由於無神論，乃是由於迷信與偶像。

照一個法國著作家的說話，貝爾是“在十七世紀的意義上的最後的形而上學家，在十八世紀的意義上的最先的哲學家”。

在對十七世紀的神學，形而上學之消極的駁斥上，一個積極的，反形而上學的系統，是必然需要的。這就得有一本著作，牠將系統化那時代的實際活動，再給這種活動以理論的根據。洛克的論文“人類智識之起源”（註二十四）好像是由海峽那邊召請來的。牠很熱烈的受人敬禮，像是被期待的上賓。

那嗎可以問：洛克或者是斯賓諾莎的門人了？我們要答覆的。唯物論是英國的土生子。她的繁瑣哲學家斯各托（註二十五）已經問了“究竟物質能不能思維呢？”

爲要作出這個奇蹟，他在上帝的全知全能的掩護下，即是說他把神學自身，來解釋唯物論。而且，他是個唯名論者。唯名論（註二十六）在英國唯物論中是主要的成分，猶之乎牠一般的是唯物論的最初表現。

英國唯物論及一切近代實驗科學之真實的祖先是倍根（註二十七）。他認自然科學爲真實的科學，認物理學爲自然科學的主要部分。安那薩哥拉斯（註二十八）及其種子論，德謨頡利圖及其原子論，常常被引用來作爲是他的權威。據他的學說，感覺是沒有錯誤的，而且是一切智識的泉源。一切科學都是根據於經驗，而且成立於把由感覺所得的材料置之於合理的研究方法。演繹，分析，比較，觀察，試驗，都是這個合理方法的主要工具。在內含於物質中的許多性質中，運動是首先的，最初的，並不僅是一種機械的，數學的運動形式，而且甚至其爲一種刺激，一種活力精神，一種努力，有如一種物質的痛楚（qual 這個字用布墨（註二十九）的說

法),一樣。

在倍根,以其為經驗學派的第一個創始者,唯物論依然以巧妙的態度,把多方面發展的種子,都藏匿在自身之內。一方面,物質在其中浸浴着的感覺的有詩意的魔力,誘惑着人的全人格。他方面,格言的公式的學說,又集附著神學的矛盾。

更向前發展,唯物論就成為單方面的了。霍布士就是系統化倍根的唯物論的人。根據於知覺的智識,失掉了詩意的美麗,成為數學家的抽象經驗。物理的運動是被機械的運動,數學的運動所犧牲了;幾何學認為是主要科學。唯物論就附上憤世觀。因為要克服這在牠自己立場之憤世的,沒有血肉的唯心論,唯物論必然要毀棄自己的血肉而成為一個苦行者。牠再現為一個智識的實體,但是牠又發展那一切智識的嚴酷的統一性。

霍布士,以其為倍根的繼承者,他辯究假如是感覺就會使人有一切的智識,那嗎概念,觀念,不過是多少把感覺形式剝去了的物質世界的幽靈。

一切哲學所能爲者，不過是替這些幽靈命名而已。一個名目，就可應用於幾個幽靈。甚至於還要有名目的名目了。可是，這就暗示一種命題的矛盾，假如我們一方面說一切的觀念都在感覺世界中有其根源，他方面又說一個字比一個字更有價值；並說除了可以由我們的感覺所知的各個實體之外，還有一般性質的實體之存在。說一個非物質的本體比說一個非物質的肉體，還要同樣的荒謬。肉體，實體，本體，不過是同一實在 (Reality) 之許多不同的名詞。人們不能把思想從能思的物質分離開來。那就是一切變化的基礎。“無限”這個字，除非牠的意義是指着我們那完成一個繼續不斷的進程的思想之能力，那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物質的事物才是可覺的，可知的；上帝的存在，何從知道呢？

我自己的存在是很確定的。每個人的感情都是有始有終的機械運動。刺戟的對象就是所謂善 (good) 的。人是要受這同一自然律之支配。力量與自由是一致的。

霍布士系統化了倍根，可是沒有把後者的基本原則，即從感覺世界來的一切智識與觀念的起源，給以確定的基礎。

洛克才在他論及人類智識上建立起倍根與霍布士的原理。

恰如霍布士之動搖倍根唯物論的有神論偏見一樣，郭林斯(註三十)，達瓦爾(註三十一)，考瓦德(註三十二)，哈提勒(註三十三)，蒲萊士勒(註三十四)諸人，打毀了依然阻害洛克感覺說的帶神學意味的最後障礙。至少，對於唯物論者，有神論不過是除脫宗教的一種適當而便利的方法而已。

我們已經注意到，在如何有幸的一個時候，洛克的著作傳入法蘭西。洛克已經建立起 *bon sens* (健全感覺)的哲學，健全常識的哲學，就是用迂迴的言詞來表示，再沒有其他哲學家更能有這樣根據於健全的人類感覺之智識。

洛克的直接的學生及法蘭西的洛克之解釋者的康的亞克，乘勢就把洛克的知覺說轉向於十七

世紀的形而上學上。他力爭法國已經正確的斥屏了後者，認為是幻想與神學偏見之粗俗產物。

他發表了對笛卡兒，斯賓諾莎，李布尼，麥爾白蘭基諸人的體系的駁論。他在他的“人類智識起源論文集”（註三十五）上，發展了洛克的觀念，而且力言不唯是靈魂，就是感覺，不唯是形成觀念的藝術，就是感覺容受性的組織，都是經驗與習慣的主體。結果，人的全部發展都有賴於教育及外界的環境。康的亞克在法國各派中只有為折衷哲學所斥黜。

英法兩國的唯物論的分別就是兩國國民性的分別。法國人以智慧，血肉，雄辯賦予英國的唯物論。他們把文雅來貫注牠，給牠以現在還缺乏的氣質。他們文明化了牠。

其在愛爾法修，他也是把洛克作為他的出發點的，唯物論就接受牠本有的法國性。他立刻把牠應用到社會生活上。（愛爾法修：“人類”）（註三十六）感覺性質，唯我主義，享樂主義，光明的自我利益，

這都是一切德道的基礎。

人類智識的自然性，理性進步與工業進步的調協，人類之自然善性，教育之全能，這就是他的體系的主要內容。

納梅泰的著作，就表示笛卡兒的與英國的唯物論之聯合。納梅泰盡量的利用笛卡兒的物理學。他的“人類機械”（註三十七）一書，完全是以笛卡兒的動物機械說為範本的一種著作。在何爾巴哈（註三十八）的“自然系統”（註三十九）一書中，專門講物理學的一部分，也包含英法唯物論兩者之綜合，猶之乎專門講道德的一部分，是主要的根據於愛爾法修的道德說一樣。魯賓勒（註四十），（其著作為：“自然”（註四十一）），法國唯物論者之最與形而上學接近的一位，他公開的建築他自己於李布尼之上。

關於佛勒（註四十二），呂必（註四十三），底戴洛（註四十四）等，我們不須乎再把他們比重農主義者還要講得多了，現在我們顯示由笛卡兒，斯賓諾莎，

麥爾白蘭基，李布尼的物理學而來的法國唯物論之兩種來源。這種對立，只有由德國人在他們自己與冥想的形而上學發生衝突之後，才能發現。

· 猶之乎笛卡兒派的唯物論之分入於自然科學一樣，所以法國唯論之另一趨勢就直接轉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人類的本來的善與相等的智識力，經驗，習慣與教育的全能，外界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工業之絕對重要性，享樂之正當等，我們不須要甚麼特殊的尖銳性，來感覺這些東西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必要關係。

假如人從知覺世界來接受他的一切印象與形成他的一切概念，也從知覺世界來轉化他的經驗，則結果經驗世界就應該這樣的來組織，才能供給一個豐富的真正人類經驗。假如光明的自我利益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則個人的私人利益就應該與人類的利益一致。假如人在唯物論的意義上不是自由的，就是說，不因為他消極的力量來避除這樣

那樣，而是因為他積極的力量來主張他真正的個性，才是自由的，那末人類不要懲罰私人的犯罪，只要破壞那犯罪的反社會的生育處，而且供給每人有他或她的個性表現的足夠的社會範圍就行了。假如人是由環境來形成的，那嗎他只有在社會中發展他的真性，並且他的天性的力量之估計，也不能由單獨的個人的力量來估計，而是要由社會的力量來估計。

這種語句，以及同樣的語句，可以在早期法蘭西唯物論者的著作中，一字一字的看見的。現在我們不必批評他們。唯物的社會主義的趨向之重要性是墨德菲力（註四十五）（洛克早年的英國門人之一）的替罪惡的辯護。他說犯罪在現代社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很有用的。可是，這對於現代社會並不曾證明是對的。

法國唯物論的學說形成傅立葉（註四十六）的出發點。巴比夫（註四十七）的追隨者是粗率而不文明的唯物論者，但是就是最發展的共產主義也是直

接從法國的唯物論生長出來的。

後者，以愛爾法修給他的形式，依然回到母國，英國去。根據愛爾法修的道德說，邊沁（註四十八）建立起他的光明的自我利益的系統，猶之乎歐文（註四十九）從邊沁的系統出發，建立英國的共產主義一樣。法國人考貝（註五十）流放到英國時，為他在那裏所發現的共產主義的觀念所刺戟，回到法國就變成最有名的，雖然是最淺薄的共產主義的代表。

（註一）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法國哲學家，二元論者。

（註二）麥爾伯蘭基（Malebranche 1638—1715）法國笛卡兒派哲學家。

（註三）斯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荷蘭哲學家。

（註四）李布尼（Leibnitz 1646—1716）德意志近代哲學的第一人。

（註五）費爾巴黑（Feuerbach 1804—1892）德意志哲學家，

黑格爾哲學之繼承者。

(註六) 黑格爾 (Hegel 1770—1831) 十九世紀德意志偉大的哲學家，辯證法的創始者。

(註七) 洛克 (Locke 1632—1704) 英國偉大的經驗派哲學家。

(註八) 牛頓 (Newton 1642—1727) 英國數理學家，地心吸力的發明者。

(註九) 李魯易 (Dr. Leroy)。

(註十) 卡白尼 (Dr. Cabanis 1757—1808) 法國醫學家兼哲學家。

(註十一) 納梅泰 (Dr. Lamettrie 1709—1751) 法國醫學家，唯物論派哲學家。

(註十二) “物理與人類道德之比較” (Rapport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註十三) 伽桑狄 (Gassendi 1592—1654) 法國哲學家。

(註十四) 德謨頤利圖 (Democritus 460—357 A. C.) 希臘哲學家，原子論完成者。

(註十五) 伊壁鳩魯 (Epicurus 341—270 A. C.) 希臘哲學家。

(註十六) 霍布士 (Hobbes 1588—1679) 英國哲學家，機械的唯物論者。

(註十七) 福耳特雷 (Voltaire 1694—1778) 法國文學家。

(註十八) 哲蘇派 (Jesuit), 1543年 Ignatius Loyola 所創之教派, 其組織名稱爲耶蘇會 (Society of Jesus)。

(註十九) 吉生派 (Jansenism), 比利時 Flanders 省 Ypres 地方羅馬天主教 Cornelius Jansen 所創之教義, 主要在反對上述哲蘇派之教義。

(註二十) 阿諾 (Arnauld)。

(註二十一) 愛爾森修 (Helvetius 1715—1771) 法國倫理學家。

(註二十二) 康的亞克 (Condillac 1715—1780) 法國哲學家, 上兩人皆學宗洛克者。

(註二十三) 皮爾·貝爾 (Pierre Bayle 1647—1706) 法國哲學家。初宗笛卡兒, 後轉爲懷疑論者。

(註二十四) “人類智識之起源” (Origi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註二十五) 斯各托 (Duns Scotus)。

(註二十六) 唯名論 (Nominalism) 主張只有一個個體是實在的, 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一種名目。

(註二十七) 培根 (Bacon 1561—1626) 英國哲學家, 近代經驗哲學的創設者。

(註二十八) 安那薩馬拉斯 (Anaxagoras 500—246 A. C.)

希臘自然學派哲學家。

(註二十九) 布墨 (Jacob Bohme 1575—1624) 德國哲學家。

(註三十) 郭林斯 (Collins)。

(註三十一) 達瓦爾 (Dorwall)。

(註三十二) 考瓦得 (Coward)。

(註三十三) 哈提勒 (Hartley 1705—1757) 英國哲學家。

(註三十四) 蒲萊士勒 (Priestley)。

(註三十五) “人類智識起源論文集” (L'essai sur l'origiⁿn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註三十六) “人類” (de l'homme)。

(註三十七) “人類機械” (l'homme machine)。

(註三十八) 何爾巴哈 (Holbach)。

(註三十九) “自然系統” (Systeme de la nature)。

(註四十) 魯賓勒 (Robinet)。

(註四十一) “自然” (de la nature)。

(註四十二) 佛勒 (Volney)。

(註四十三) 呂必 (Dupuis)。

(註四十四) 底戴洛 (Diderot 1713—1784) 法國哲學家，詩人。

(註四十五) 曼德非力 (Mandeville 1670—1733) 英國倫理

學家。

(註四十六) 傅立葉 (Fourier 1772—1837) 法國空想派社會主義者。

(註四十七) 巴比夫 (Babeaf)。

(註四十八) 邊沁 (Bentham 1748—1832) 英國功利派倫理學家。

(註四十九) 歐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英國空想派社會主義者。

(註五十) 考貝 (Cabet)。

七

中國革命與歐洲

中國革命與歐洲

一個探求支配人類運動原理的玄學家，慣稱兩端相接的法則，為支配自然界的奧衍的原則。他以為俗諺所謂“兩極相遇”，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偉大而有力的真理。這個原理，哲學家用之，可以執簡馭繁，如同天文學家用Kepler的法則或牛頓的偉大發見(引力律)一樣。

兩極相遇，是不是那樣一個普遍的原則，我們且不必論，但這個原則的顯明的表現，是可以從中國革命之將影響於所謂文明世界的結果上看

出來的。說歐洲人民的未來暴動與其爲共和自由及政府經濟的未來運動，其關係於現所經歷於此之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抑且遠勝於俄羅斯的威脅，以及從而發生全歐戰爭的可能性，這似乎是奇妄的推論；但是並沒有甚麼奇妄，只需詳細考察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瞭了。

不管甚麼是牠的社會原因，不管甚麼是牠的宗教，朝代，民族的形式，總之牠產生了慢性的變亂，過去存在於中國的已有十年，現在匯合起來，成爲一個可驚的革命。牠的暴發的機會，毫無問題的是那強制輸入名爲鴉片的麻醉毒物於中國之英國大砲所賜與的。在英國砲火之前，滿洲皇帝的權威，掃地無餘了；天朝永在的迷信，完全打破了；封鎖的門戶及未曾與所謂文明世界接觸的孤立，驟被侵入了；東西交通的開發，從此以後，在加利佛尼亞州與澳洲的黃金引誘之下，很快的進行。同時這個帝國的金錢，——牠的生命膏血——開始流

入於大英帝國的東印度了。

1830年以前，中外貿易的差額，中國方面還站在有利的地位。銀貨不斷的由印度，大不列顛，北美合衆國輸入於中國。1833年以後，尤其是1840年以後，則銀貨由中國到印度的輸出，幾乎耗竭了這個天朝上國。於是中國皇帝嚴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是所得到的答覆，是對於牠的法度給以更強烈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經濟結果以外，有關於鴉片秘密買賣的賄賂風行，完全腐化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的綱紀。假如把皇帝看成全國父親，皇帝的臣僕就看成是對於各該屬縣邑的維持親屬關係者。但此維繫國家全局之唯一的道德綱紀的父權，逐漸爲默許鴉片密運因而自飽私囊的官吏之腐敗所蝕毀了。這種情形，在發生變亂的南方各省，數見不鮮，鴉片遂適如其分的獲得了宰制中國的主權，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僕，也已喪失其所有的主權了。這似乎是歷史在牠把中國全民族從其傳統的昏曠中拯救出來以前，先使他們沉醉一回

似的。

英國棉織物的輸入，從前幾乎沒有，英國毛織物的輸入，也只有少許。至1833年以後，二者之輸入於中國，是很快的增加，此時為東印度公司轉移對華貿易獨占為私人商業的時期。至於此等物品之大規模的輸入中國，乃在1840年以後，此時為其他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國家（美國），各在中國獲得一份貿易的時期。這外國機製品的輸入，其影響於本地的產業，猶之乎牠從前影響於小亞細亞，波斯，印度一樣。在外國競爭之下，中國國內的許多紡織者，都遭遇很大的犧牲，而社會生活，也隨着外貨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1840年的不幸戰爭（鴉片戰爭）以後，賠款必須付給英國。那鉅額的，不生長的，消費的鴉片，隨着鴉片貿易而生的貴金屬的流出，外國競爭對本地製造品的不利的影響，公共行政情形的腐敗，產生了兩件事：更加重舊稅，又增設新稅。這樣，在1853年一月五日內北京發出的皇帝上諭裏面，我

們可以知道有頒給武昌，漢陽等處以及南方各省督撫的上諭，命令他們減輕或延緩人民的納稅，尤其是無論如何不准有逾額的苛取。上諭上說，假如不這樣，則“貧苦人民，將何以堪？”又說，“則當舉國艱憂之時，如此，吾民或能免於苛吏誅求之禍矣。”這樣的辭令和這樣的寬假，我們猶憶在1848年時，曾從奧地利聽見過，那是日耳曼的中國。

所有這些匯合起來，從中國的財政、道德、產業及政治構造而躍動的崩潰之動因，在1840年的英國砲火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個砲火，打落了滿清皇帝的威靈，強迫這天朝上國來與遠鄰之邦相接觸。老大中國所要保持的原狀是完全的孤立，必須依着英國的媒介，才強制的終結了這個孤立。分解是必然隨之而起的，猶如謹藏在封固的棺材中的木乃伊一樣，不論何時，一經與空氣接觸，就要立即分解的。現在英國已經造成了中國的革命，問題是那中國革命如何的遲早要反響及於英國，經英國以及於歐洲，這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1850年以後，讀者常被喚起注意及於英國製造品之不平行之發展。在那最可驚的繁榮中間，不難指出逼近於產業危機的那顯明的徵兆。雖然有加里佛尼亞州同澳洲，雖然有未曾前聞的浩大的移民出境，假如無任何特殊事變，在一個相當時期，遲早總有一天，市場的擴張，不能與英國製造品的擴張一致。這種矛盾，必然要造成一個新危機，其確定殆與過去所曾經歷者完全相同。但是假如大市場之一，忽然縮變狹小，那危機之到來，還要因之而加速。目前中國的變亂，完全有及於英國的這個影響。開闢新市場或擴大舊市場之必要，是英國減低茶稅的主要原因之一，期於以增加茶的輸入，來謀對華增加製造品的輸出。現在每年由英國輸出到中國的價值，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享有的貿易獨占權廢止以前，總額只600,000鎊，1836年，達1,326,388鎊，1844年增至2,394,827鎊，至1852年，則約達於3,000,000鎊了。至於由中國輸入於英國的茶之總量，在1793年，尚不出16,167,331兩；但

在1845年，則達於50,714,657兩；1846年，則達於57,584,561兩；現在（1851—1852）已超過60,000,000兩以上了。

上季的茶收穫額，超過前年（1850）不下2,000,000兩，已經為上海的輸出表所明示了。這個超過，可以由兩個理由來說明：一方面是1851年終的市場狀況，較為低落，剩餘下來的多量的過剩物品，移入於1852年的輸出；另一方面是那變更茶輸入的立法的近頃的報告，傳到了中國，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極貴的價錢，上了預備市場。但是關於來季的收穫，則情形大異了。這可以從倫敦某大茶莊的通信中，摘錄下列的語句來證明：

“在上海，危機已達於極點。金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銀貨的缺乏，至於使英船對於中國應付的出港船鈔，一點也不能夠付出。因此阿爾可克（Alcock）對於這應行交付中國官吏的船鈔，同意於以東印度公司的票據或其他認可的担保品為質。設若着眼於商業的最

近的將來，則金貨的缺乏，乃為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此種空虛，適值於金貨使用的最需要的時會，以致影響於深入內地的絲茶購買者的購買，蓋此等購買，須以正在騰漲的金銀塊為付價，而那些絲茶生產者遂得以盡其操縱之能事。

“歷年此季，開始收買新茶，習以為常。可是現時除去保障人身與財產的方法而外，甚麼也談不到。一切交易都已停頓……設若在四五月中不能應用那些保護茶葉的方法，則這包含一切良種在內的紅茶，綠茶之早期的收穫，將同為在復活節尚未成熟的小麥的一樣的損耗。”

現在保護茶葉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國的艦隊駐在中國海中，可以給與的。可是因為他們的干涉，這卻很容易產生一種糾紛的情形，如像切斷產茶內地與輸茶海港間的一切交易。如此，則於現在的收穫，是可以預期一個價格的騰起的（投

機已經在倫敦開始了)。這於次季的收穫，也可以同樣的確定是一個大缺乏。而且，中國人也同革命震動的時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樣，雖然準備將他們手中那一切笨重的物品，賣與外國人，而又如東方人在大變動的恐怖中所作的那樣，要把所得的置之埋藏。故於絲茶的取價，除硬貨的錢幣外，其他多不願收受，於是乎英國可以預期牠的主要消費品之一的價格的騰漲，金銀貨的流出，出售牠的綿毛織品的一個重要市場的縮小，即是那威脅商業社會沉靜精神的事物的樂天詛咒家的“經濟學派”，也不能不作如下的語句了：

“我們不要自信覓得一個爲我們輸出品去到的中國市場，其廣大一如往昔。我們對於中國的輸出貿易，將遭蒙損害，滿切斯特及格蘭斯哥的生產，將有一個減少的要求，這是可能的。”

切勿忘記像茶那樣一種必需的物品，像中國那樣一個廣大市場的縮小，將適合於一個西歐的

歉收，從而發生麥穀和其他農產品價格的騰貴，於是縮小了製造品的市場。因為每一種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的騰貴，依一個相當的對於製造品的需要的減低，相為抵消，以保內外的平衡。近來大不列顛各處，時聞關於收穫減色的歎聲，“經濟學派”關於此問題以為：

“在英倫的南方，不僅有些土地尚未耕種，並且許多已耕種的田畝，也呈出險象，或則穀實的發育不良。預定種麥子的卑濕的土地，正在發生損害的徵候，已極為明顯。種甜菜的時期現在可以說是已經空誤了，種植得很少。而那預備種燕麥的農時，看看也快要過去，為這樣一種重要收穫的任何充分的預備，也沒有佈置妥當。燕麥的種植被雨雪妨害的不小。很少有及時下種的燕麥，遲種的又很少有豐富收穫的可能。在許多區域內，飼養的羊羣的損失，其價值亦不在小。”

穀以外的農產品價格，比去年增高百分之二

十至三十，甚且有百分之五十者。歐洲大陸，穀價較英倫尤高，而在比利時及荷蘭，小麥高漲一倍，麥及其他穀物之漲價，與此相同。

在這種情形之下，因為普通商業範圍的大部分，已為英國的商業所蕩盡，我們很可以穩妥的卜知中國革命將擲其火星於現在產業制度積載過多的地雷上，而引致此長期準備的總危機的爆發。緊接這個廣布於海外的總危機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中國送來騷亂於兩方世界，而兩方列強方由英，法，美的戰艦載着所謂“秩序”到上海與南京去。這是一個偉壯的奇觀。這些將要援助那動搖的滿洲帝統的秩序的販客的列強，忘記了對於外人的仇視，并驅逐外人出此帝國，從前只是中國之地理的，人種的，位置的單純結果，而自滿洲鞑靼征服此邦以後，纔成為政治制度了嗎？在十七世紀末，那互相競爭與中國通商的歐洲各國間的紛爭軋轢，給了滿洲所行的排外政策一個很大的助力，是明顯無疑的事實。此外，這個新朝，因恐外人或

將左袒那被征服於韃靼的中國人民的上半世紀間在大多數華人間存在的不平，而促其採行排外政策也更烈。根於這些顧慮，當時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許與華人交通。外人只准經由一個離北京及產業地地方甚遠的都市的廣州，與英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於與行商交易。行商是政府特許公開的從事外國貿易的商人，爲的是使其餘的人民，得以避免與那可憎的遠人的接觸。無論如何，西方各國的政府對於中國的干涉，此時只能使中國的革命更加猛烈，更加延長商業的停滯而已。

同時關於印度有須注意的，是那個世紀的英國政府，足有牠的歲入之七分之一，是靠售賣鴉片於中國人民。同時印度人的大部分，又靠着印度鴉片的出產，以需求英國的製造品。中國人民對於吸吃鴉片的非難，並不減於德國人之禁絕淡巴菘。但是因爲這位新皇帝知道贊助罌粟的種植，及在中國自己境內的種植之預備，很顯然的將立刻與印度的鴉片種植業，印度的歲入，以及印度斯坦的

財源，以絕大的打擊。此種打擊，雖不能立刻即為與此有關的利害所感覺，但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必將顯其效用，必將加厚而且延長此普遍的財政危機。這個危機的命運，我們已經在上文卜定的了。

自從十八世紀以後，在歐洲的激烈的革命，沒有不先朕兆以商業，財政之危機者。證之於1789年革命及1848年革命，此理殆全符合。這是實在的，不僅我們每天看見那些統治的權力者與其人民間，國家與社會間，各階級間，其矛盾之尖銳的徵兆，日益加甚，便是各強國間現存的矛盾，亦似乎將要達到圖窮匕見的程度，最後談判的機運，亦且若隱若現了。在歐洲各國的都城中，每日都有關於普遍大戰的飛書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復消滅了，似乎又有半星期的平和的保證了。雖然我們的確知道，歐洲列強間的衝突可以達到無論如何的極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顯出無論如何的危迫，由於此國彼國的多少狂熱的黨派，可以企圖無論如何

的運動，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與人民的憤慨，都一樣的被那繁榮的呼吸銷沉下去了。戰爭與革命，都一樣不能令歐洲爭鬪起來，除非牠是一個普遍的商業，財產之危機的結果。這個危機的信號，與尋常一樣，必要發自英國，他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關係，是不必需的，就以英國工廠有未曾前聞的擴張，英國的公開政黨全然瓦解，法國的全部國家機關，變成了廣大的詐騙投機買賣的商行，奧地利的財政瀕於破產，到處都是招人民仇恨的層層疊疊的錯誤，反動列強間的利益衝突和那曾經一度顯露於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羅斯迷夢這等等事實看來，在這樣一個時候，那個危機，必然產生。

八

六月的日子

六月的日子

1848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哥隆 (Cologne)

巴黎工人已經爲一種優勢所擊散了，擊散了，并不是消滅了；他們是失敗了，然而他們的反對者也真正的被制服了。獸力的暫時勝利，是由二月革命的一切失望與幻想的消失所買來的，是由一切舊共和黨的清算所買來的，是由法國人民之分爲所有者與勞動者的兩個國家的分歧所買來的。從此以後，三色的共和國就只能有一色了，失敗者的色，鮮血的色。牠已經變爲一個紅色共和國。

沒有一個成名了的共和主義者，也沒有一個

國家主義者團體中的人，或改良派團體中的人，是站在民衆方面的！民衆除了暴動自身而外，既沒有甚麼領袖，又沒有甚麼金錢，而其抵抗資產階級的聯合勢力和軍隊所支持的時期，比法國從來充分握有軍事力量的任何朝代所能抵抗資產階級的時期都要久些。驅逐人民的最後幻想，完全斷絕過去的關係，法國暴動者之習然的熱心擁護者——資產階級青年，專藝學校中的學生，戴三角帽者——這時要出來左袒壓迫者，這是必然的。巴黎大學醫科學生拒絕醫治受傷的平民，這是必然的。科學並不是爲援助平民而存在的，也不是爲援助那不爲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或馬拉提(Marrast)先生來劈一槍，但爲自己奮鬥以致干犯不名譽的不可言的罪惡之人而存在的。

二月革命之最後的官式遺跡的執行委員會，其銷失也，有如一個霧中幽靈。拉馬丁(Lamartine)的火球自己轉形成了可汾雅克(Cavaignac——當時的著名反動軍官——譯者)的戰爭烽火了。

兩個對立階級（其中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友愛，這個友愛在二月時都用龐大的字塗寫在巴黎市的牆壁上，塗寫在監獄與兵營上，——牠的真實的，乾脆的，散文的表現，就是內戰，就是最酷烈形式的內戰，資本與勞動相鬥爭的內戰。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這種友愛從巴黎的每個窗口上燃燒起來，其時資產階級的巴黎被照耀的透明，而無產階級的巴黎是在燃燒着，流血着，悲號着。

友愛所持續的時間只是在資產階級的利益還能夠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調協的時候。1793年老革命傳統的狂士；請求資產階級對人民給與利益，被准許以一個時間的宣教，被允可在需要他們來麻醉無產階級入於昏睡狀態的時候同他們妥協，這樣的社會主義組織者；要維持除去戴王冠者一人之外的全部舊資產階級制度的共和主義者；不願脫去他們的制服，而僅欲改換牠的剪裁樣式的代議士，——這些就是二月革命時的人民之聯盟者！但是人民本能地所深惡痛恨的，不是路易菲利

蒲，而是一個階級的統治，資本皇帝。可是豪俠一如往昔，他們幻想着他們已經毀滅了他們自己的敵人，實則他們所毀滅的僅是他們的敵人的敵人，他們的共同的敵人。

二月革命是一個合宜的革命，大家都喝彩的革命，因為在其中爆裂出來反對君主專制的反對者並沒有發展，而是在和諧的互相借比的憨睡着；因為形成牠的真正背影的社會鬥爭只在空氣裏有了一個存在，一個字句的存在。六月革命是一個不合宜的革命，可憎惡的革命，因為其中實際代替了空言，因為在牠移去王冠之燦爛的喬裝時，共和國的建立亮開了這怪物的頭顱。

“秩序”是幾佐(Guizot, 當時一位共和主義者——譯者)的口號。波蘭人爲俄國擊碎了的時候，幾佐派的舍巴斯提阿尼(Sebastiani)說是“秩序統治華沙”(Warsaw 波蘭首都——譯者)。可汾雅克叫出“秩序!”這是法國國民會議與共和派資產階級的狺狺的回聲。“秩序!”震響了他的葡萄彈;有

如牠打下了無產階級。

自1789年來爲法國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無數革命，沒有一個對這秩序有一次打擊，因爲這些革命對於階級統治，勞動者的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的秩序，都是保存着原狀，絲毫未曾動過，——而只是屢次改變這種統治與奴隸狀態的政治形式。但是“六月”對資產階級的秩序是下了手的。所以，六月算是可詛咒的了！

在臨時政府之下，很適當的事，不，很重要的事，——既是權術的，又是合宜的，是要告訴心胸廣大的工人們（他們，有如無數的官場布告所說，“曾以三個月的貧困給共和國全權處置”）說，二月革命是爲的他們的利益，或者說“尤其”是爲他們的利益。但是在國民會議之後，一個更散文的調子使牠自己被聽到了。一切現在所必要的是，有如特賴提先生（Trelat）所說的，要把勞動抓轉去回到舊的狀況下，總之一句話，勞動者在二月間的作戰，是使他們自己陷入一個產業的危機！

國民會議的任務是要使“二月”成爲好像不曾有過這回事一樣，無論如何對工人方面尤其如此，因爲他們是要被強制的抓回舊的狀況去。但是會議發現了這是超過了牠的力量的一個任務，因爲會議並不能更比國王成功些假若牠向一個普遍的產業恐慌說道，“就這樣吧，不要再向前了！”就是國民會議，殘酷地熱望着想處置那討厭的二月的冗語，也未能想出那在舊關係的基礎之上可以實行的唯一策略。牠強徵從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巴黎工人到軍隊中去，或者把他們投擲於大路之上：牠命令外國人離開巴黎，把他們流放到沙龍(Sologne)，甚至於不給他們在這放逐中日常生活的費用；牠臨時保證成年的巴黎人在一種以軍事形式組織的工場(Workshops)中有着“僅足自存”的生活，但所附的條件是，他們不要參與公共會議，這個所附的條件就是叫他們放棄了做共和國民的權利。情感的修詞在二月革命後是不夠的，立法的禽獸行爲在五月十五日後也是不夠的。這個事必定

要實際的決定下來。“暴徒，你弄出這二月革命來是爲你們自己嗎，還是爲我們？”資產階級這樣提出這個問題，那只有由葡萄彈及營壘來答覆（六月）。

然而，有如六月二十五日一位人民代表說的，國民會議是被震駭得發呆了。牠是震駭昏了，當其問題與答案以鮮血洒濕巴黎街道的時候；代表們也震駭昏了，有些是因爲他們的幻想沖入火藥的烟氣中，有些是因爲他們不了解怎麼樣人民能夠敢於防衛他們的最切身的利益。在他們的眼光中，除開俄國的盧布，英國的金鎊，波勒旁（拿破侖第三——譯者）的鷹幣，皇室的蓮幣，或者是其他的符咒，再也沒有甚麼能夠解釋那樣奇怪的一個現象！可是國民會議中的兩派都感到在他們與人民間劃有一道很深的界線，任何一派都不敢吼出一聲利於人民的呼叫。

及到這一陣“昏迷”過去之後，一陣“狂怒”又起而代之；大多數人對於可憐的烏託邦者與僞善

者表示激烈的輕蔑，以爲他們繼續講說甚麼友愛是犯了時代的錯誤。重要的事是我們不要再聽這樣的詞句了，不要再聽他們所懷蓄在他們的含糊的胸懷中的幻想了！當保皇黨而且是勇武的熱心家 La Rochejaquelin 嘲罵那民衆高叫“Vae victis”（可詛咒的勝利者）的不名譽的事情的時候，會議的大多數人正迷戀於聖維托（St. Vitus）的跳舞，好像爲毒蜘蛛所螫了的一樣。他們叫着“可詛咒的工人”以便遮掩：只有他們（不是別人）才是真正的勝利者；或者他們自己死亡，否則，就是共和國死亡。那就是爲甚麼他們是那樣癡癡地叫着“共和國萬歲！”

因爲這個深淵浩闊在我們的足下，我們就被引到迷途了嗎？以爲國家形式的鬥爭是沒有意義或價值的這個幻想，我們能屈從牠嗎？

只有衰弱而怯懦者才來討論這個問題。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中自發的漲起來的衝突，必然要鬥爭到一種悲慘的結局，牠們不能自然地消滅

去。最優的國家形式是一個其中社會對立不被看輕的，是一個不強制的，即是說不是人造的，而且也不是外表的桎梏起來的。最優的國家形式是一個矛盾有自由表現的保證而這樣來得到解決的。

我們要問：“對於民衆的熱狂之犧牲，你將無淚乎，無歎乎，無同情之語乎？對於國防軍，志願軍，共和軍，防線之損失，你將無所關心乎？”

國家將要關顧這些人的寡妻，孤子。他們將受命令的獎勵，牠們將受壯烈的追悼，機關報紙將宣告他們不死的紀念，反動的戰士們將要從東到西的頌揚他們。

但是平民們，夾困在飢寒中，爲報紙所咒罵，外科醫生也不管他們，一切“老實”的人們都污蔑他們是盜匪，是放火者，是殺人者，他們的妻子之日陷困苦，殆從所未有，後死者中之最好的也都是竄徙流亡——民主主義的報紙不是都充分的有資格以光榮來表彰他們的憂愁的顏面嗎？

九

1848年革命與無產階級

1848年革命與無產階級

(演說詞)

“人民新聞”(People's Paper)創立四週年紀念時，瓊司(Ernest Jones)宴請報館之編輯，職員，特約撰稿人，及英，德，法著名民主主義者之在倫敦者。宴後，主席瓊司以“歐洲無產階級”為題，請馬克思博士演說。時1856年四月十四日。

所謂1848年革命，不過是歐洲社會的外殼之可憐的突然遭遇，小裂痕，小漏洞罷了。可是，牠們究竟揭發了這個深淵。在外表似乎是堅實的皮面

之下，牠們洩露了流質的大洋，只需要擴張來把堅崖的大陸敲成爲碎片。喧嘩的，混亂的，他們宣布了無產者的解放，卽是十九世紀的祕密，與乎那世紀的革命的祕密。那是真的，社會革命並不是在1848年所發明的新奇事件。蒸汽，電汽，自動紡織機，其爲革命，比公民巴伯司（Barbés）納斯柏爾（Raspail），布浪葵（Blanqui），還要更帶危險性呢！雖然我們居處其中的氛圍氣，壓在每人身上都有二萬磅重的力量，但是你們覺得嗎？在1848年前感到革命的氛圍氣，從各方面向牠包圍，並且向牠壓迫的，無過於歐洲社會了。這是我們十九世紀的最大特質的一件事，一件沒有任何部分的人敢於否認的事。一方面，在生活中開始了產業的，科學的力量，以前的人類社會時代，從來沒有預料到的。他方面，這裏存在了崩潰的徵兆，其悲慘的程度，超過以前羅馬帝國的時代。在我們現代，好像任何事物都孕育着矛盾一樣。機械，有縮短同擴大人力的一種奇異力量，但我們又看見餓死了，過勞了

牠。好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符籙，新奇的財富泉源轉變成貧乏的泉源。藝術的勝利看來是由人格的損失而換來的。在這人類主宰自然的同一步調，人又變成他人的或他自己之醜惡的奴隸。甚至純粹的科學生活看來也不能夠有光明了，而只在無識的黑暗背境上了。一切我們的發明與進步，似乎結果都是把智慧的生活，贈送給物質勢力，把人類的生活，欺騙入物質勢力。這種一方面是近代產業與科學，他方面是近代貧困與死亡的對立，我們這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對立，顯然是壓倒一世而無可辯解的事實。有些人是感慨無窮，有些人是想解脫近代的藝術，以解脫近代的衝突。他們又或都懸想這樣顯著的一個產業進步，要需要同樣顯著的一個政治退步來完成牠。在我們方面，我們不會誤取這個繼續顯出這一切矛盾的聰慧精神的形式。我們知道，假如這個新成的社會勢力是運用的滿意時，他們就只需為新成的人所主宰，——這新成的人就是勞動者。他們之為近代的發明，也同機

械本身一樣。在中等階級，貴族，退化的可憐預言家的形象中，我們承認我們的老朋友 Robin Goodfellow，這個老鼯鼠，牠在地上打洞打得很快，這是有價值的先驅——革命。英國勞動階級是近代產業的長子。那末，一定的，他們不是贊助由產業所生出的社會革命的最後的人，這個革命，意即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解放，這個革命之普遍，將如資本統治與工錢奴役之普遍然。我知道英國勞動階級自十八世紀以來所經歷之英勇的鬥爭，這些鬥爭並不因中等階級的歷史家把牠們藏匿於黑暗中而減少其光榮。爲要報復統治階級之惡行，德國在中世紀時有一個祕密法庭，Vehmgericht。假如看見一處屋子上記有紅色十字，人們就知道這屋主爲Vehm黨人所處決了。歐洲一切的房屋現在都記上這個神祕的紅色十字了。歷史是裁判人，牠的執行人是無產者。

